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楊千鶴〈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形象塑造
與主角惠英之自我呈現

楊千鶴「花咲く季節」における少女像の構築
と主人公惠英の自己形成

Images of girls constructed and the main
actress' s self-presentation of Chian-Ho
Yang' s *Hanasaku Kisetsu*

指導教師：蕭幸君 助理教授

研究生：曾靖方

107年6月

楊千鶴〈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形象塑造

與主角惠英之自我呈現

楊千鶴「花咲く季節」における少女像の構築

と主人公惠英の自己形成

Images of girls constructed and the main actress'

s self-presentation of Chian-Ho Yang's

Hanasaku Kiseki

研究生：曾靖方

指導教授：蕭幸君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碩士論文題目：

楊千鶴「花咲く季節」における少女像の構築
と主人公惠英の自己形成

楊千鶴〈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形象塑造
與主角惠英之自我呈現

Images of girls constructed and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Chian-Ho Yang' s *Hanasaku*
Kisetsu

研究生：曾靖方

指導教授：葉 琴 君 (簽章)

審查教授：葉 琴 君 (簽章)

李 文 茹 (簽章)

楊 麗 君 (簽章)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107年6月

致謝

透過這篇論文探究楊千鶴這位偉大女性出生的年代，時常聯想起我那與楊千鶴同年，卻是出生於環境貧乏雲林縣褒忠鄉的祖母—陳銀女士，以這篇論文向走過那些年代的祂們，致上敬意。

晚了 TAKO 和 TAKERU 半年才搞好論文，受他倆的各方意見與幫助，曾問了他們謝詞怎麼寫？他倆表示感謝不完索性不寫(不要亂爆料，聽完我也詞窮一番。但自論文審核通過，和蕭老師一起到東京外國語大學發表這篇論文時，受到好多旁人的幫助，歷經了三年也曾想放棄燒書(?過，那時心中就擬定這天來臨務必想撰寫個謝詞。於是就以這稱不上敬意的一番雜談，身為心靈少女的我在面對現實之際來感傷一下。

2011 年底在熊大交換留學後匆忙的決定要讀研究所，沒想到隔年 9 月懵懂地就進了東海日文系的碩士班，但論文真正進入狀況似乎是 2015 年初了，這篇論文和自身重疊的部分實在太多，在逃避和自省的過程中，受到蕭老師的耐心的督導下，真的迎向完結的此刻，一切想來那些難熬的日子已經很遙遠，首先要謝謝我的指導老師提供我頻繁討論的撰寫環境與督導，除了學術上的指導，心靈上的照料，拉著我一路到終點，每次的咪聽大家論文的吐槽外也添了不少各方宅的話題，我想在未來，可能很少有這如此放開做自己的環境了。

以及感謝種子派的 TAKO、TAKERU 還有雖然晚了前面兩位半年但一起努力到畢業的怡秀。純ちゃん、武田さん還有 sho 研的夥伴們。在最後半年衝刺拚發表的期間，一起趕稿、研究室各種わいわいハッピー，各種自我療癒！除了論文以外大家總有聊不完 diss 社會的議題(?，總讓我聯想到論文提到的友情與自我意識的部分，開始撰寫論文的這幾年，在東海這裡找到了許多歸屬感，在未來即將失去這種環境拘束下，希望我們都還是一樣很要好喔！

還有謝謝一平在我即將放棄前拉我一把。謝謝迷妹的慶加、小翎、TAKA、小碗、小護士、妙妙、使然，在宅圈的陪伴還不時替我著急，一起在日本作夢的日子也讓我想起了論文中提到少女憧憬的部分呢。

在另一個方面，要謝謝 K 氏幾年來的包容，未來希望你都能一切順心安好。還有貓貓論文加油，希望有天我能幫上什麼忙呢。

最後的最後，謝謝小鳳和泰山。記得泰山一直把我這隻野馬當作驕傲，還好沒辜負泰山開學日親自接送註冊的期待，呼。還有小鳳一直以來的支持和包容，反而有些愧疚

了，希望有天能帶妳去看演唱會唷！以及先祖妣陳銀女士，常責怪自己不能早點讓妳放心，論文雖花了較長的時間但反而得以最後陪伴妳的時光，一切都很感謝，有時間我會去雲林看看妳。還有在台中某個地方努力生活的 wati，謝謝溫柔的你在那段時間的照顧。還有靖君、靖恩、屁孩、寶爺臭弟(?)，謝謝我的家人們的陪伴。果然用這些文字也無法表達全部的謝意呢。

2018 年 8 月

摘要

本論以楊千鶴 1942 年發表於《台灣文學》的〈花開時節〉作為分析對象，以日本「少女」的研究視野切入探討。解析主角惠英的「友愛情誼」與「感傷情懷」此兩項自我呈現，發現了惠英的少女自我認同呈現了以「友愛情誼」維持自我意識，卻是以「感傷情懷」來反思與辯證自身的少女生存姿態，相當矛盾之呈現樣貌。

透過探究楊千鶴的創作立場與出生的時代背景、少女思潮影響、女子教育中的少女規範發現，少女的自我發展受限於結婚話題、成為賢妻良母。然而在 1920 年後女子教育環境與社會風氣逐漸重視女性人格，以及主角惠英實際受作中作安德烈莫洛亞《結婚、友情、幸福》大迫倫子《娘時代》之特徵與思潮影響，其萌發了自我意識與「友愛情懷」連結。「友愛情懷」作為少女自我意識的歸屬；參考與作者楊千鶴的關聯性發現，「感傷情懷」作為少女區隔結婚現實的機能作用；並透過重複運作「友愛情誼」與「感傷情懷」下，維持在「自我憧憬」之少女幻想之中。

本論作為〈花開時節〉的「少女」研究之視論，探討〈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形象塑造與主角惠英的自我呈現，以提供日治時期女性形象研究全新的視野。

關鍵字：花開時節 日治時期 少女 形象塑造 自我呈現 友情 感傷

要旨

本論は楊千鶴が1942年に《台湾文学》に発表された〈花咲く季節〉を研究対象とし、日本の「少女」研究視野を取り入れて分析した作品論である。作品に表れた少女特徴である「友愛」「センチメンタル」を分析したところ、彼女は「友愛」という特徴で自己意識を高め、その一方で「センチメンタル」という特徴で自己反省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自分の少女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維持する様子を発見したが、実に矛盾なる自己形成である。

そこで、本論は作者である楊千鶴の創作立場と当時代の少女文化の影響、そして、台湾女子教育におけるの少女規範を考察したところ、少女の自己形成は結婚の話題、または良妻賢母というイメージに束縛されることを気づいた。ところが、1920年以降の女子教育の環境では女性の人格を重視する傾向があり、また、主人公恵英はアンドレ・モローアの作品『結婚・友情・幸福』と大迫倫子の『娘時代』この二作の中の人物像や思想に影響を受け、彼女の自己意識は「友愛」に強く結ばれることを気づいた。結論として、主人公恵英が本作品に現れた特徴機能とは何かについて分析を行った。「友愛」といった機能は少女の自己意識の帰属場所であり、作者である楊千鶴の自伝『人生のプリズム』を参考したところ、「センチメンタル」といった機能は結婚という現実を区別し、逃げ場とした役割を果たした。そして、この二つの役割を繰り返し、理想自己を追求する幻想に包まれる機能を果たした。

本論は「花咲く季節」における「少女」という研究視野を取り入れた試論であり、その少女像の構築と主人公の自己形成を分析し、日本統治期の女性像の研究分野に新たな視野を貢献した。

キーワード:花咲く季節 少女 イメージ構築 自己形成 友情 センチメンタル

目錄

摘要.....	i
目錄.....	iii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動機.....	1
1-2 前行文獻回顧.....	5
1-2-1 前行文獻之考察範疇.....	5
1-2-2 日治時期文學作品中「女學生」與「待家女性」形象及〈花開時節〉之相關研究.....	6
1-3 研究方法—日本「少女」研究概要.....	11
1-4 研究架構.....	16
1-5 研究假設.....	17
1-6 研究目的.....	18
第二章 〈花開時節〉的創作背景探討.....	19
2-1 作者楊千鶴之創作立場—女性書寫與自我呈現.....	19
2-2 〈花開時節〉的少女書寫初步分析.....	22
2-2-1 〈花開時節〉中少女曖昧的生存姿態與「感傷情懷」.....	24
2-2-2 〈花開時節〉中少女的自我意識與「友愛情誼」.....	27
2-3 1921年至1942年的台灣社會背景與〈花開時節〉.....	28
2-3-1 惠英的家庭地位、朱映訂婚場景的聘禮文化.....	30
2-3-2 〈花開時節〉的女子教育背景—自我發展由家庭空間轉移至女學校環境.....	32
2-4 日本少女文化思潮影響.....	34
2-4-1 少女文化發展簡史.....	35
2-4-2 少女小說的特徵.....	37

2-4-2-1 被愛姿態的「少女」	37
2-4-2-2 「友愛情誼」－強制性異性愛制度的補足	39
2-4-3 「少女」與〈花開時節〉	40
2-5 〈花開時節〉中少女的自我發展	41
第三章 〈花開時節〉中的內化要素之影響	43
3-1 教育中「少女」規範	45
3-1-1 渡部周子的少女規範論	45
3-1-2 台灣女子教育中的少女規範試論	50
3-2 作中作之影響－《結婚、友情、幸福》《娘時代》	54
3-2-1 《結婚、友情、幸福》中的友情呈現	55
3-2-1-1 友情的誕生與自我意識的鞏固	55
3-2-1-2 友情與結婚的關係性	59
3-2-2 《娘時代》少女的特徵描寫	60
3-2-2-1 少女性格描繪－冒險、自我、好奇心	61
3-2-2-2 藝術氣息與追求夢想	62
3-2-3 作中作之影響總結	63
3-3 〈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內化規範與形象塑造	64
第四章 〈花開時節〉主角惠英的自我建構與自我呈現	67
4-1 少女雜誌所提示的自我發展	67
4-2 惠英與楊千鶴之關聯性	70
4-2-1 楊千鶴的自我意識	70
4-2-2 楊千鶴的少女相關之具體事例	72
4-3 主角惠英的自我意識	75
4-3-1 環境說明與少女角色	75
4-3-2 故事脈絡下主角惠英的自我意識變化	78
4-3-2-1 婚事衝突	79
4-3-2-2 拜訪結婚的友人與主角就職	81

4-3-2-3	送別旅行.....	84
4-3-2-4	朱映的婚禮與主角離職.....	86
4-3-2-5	結局－各少女角色的最終呈現：楊千鶴的創作意圖.....	88
4-4	惠英的少女自我建構.....	89
4-5	主角惠英的少女自我呈現－感傷情懷：友愛情誼：自我憧憬.....	91
4-5-1	友愛情誼之機能－鞏固自我意識、少女自我的歸屬.....	92
4-5-2	感傷情懷之機能－區隔結婚之現實、創造少女的自我世界.....	93
4-5-3	惠英的自我憧憬－「感傷情懷」與「友愛情誼」特徵之運作目的..	93
第五章	結論.....	95
5-1	〈花開時節〉作為少女形象研究－賢妻良母化問題探討.....	95
5-2	研究課題與展望.....	96
參考文獻	98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花開時節〉¹為日治時期的女作家楊千鶴於 1942 年發表於《台灣文學》²的短篇小說，全文分為七小節並以主角惠英的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描述劇情展演。故事圍繞在惠英與友人朱映與翠苑的友情與結婚的話題進展，同時惠英對於女性自我價值與婚姻之間的游移抱持著相當的疑慮。在過去學者³曾以待家新女性、知識女性、女學生等來評論〈花開時節〉中的女性形象，而惠英也被論為處於新舊世代夾層半新還舊的女性形象，但正當筆者嘗試以更多方的視角來檢視〈花開時節〉其中的女性形象，卻發現難以一個明確的女性形象來評論惠英，惠英對未來成為賢妻良母感到不安，在脈絡中惠英嘗試理解友人婚後的樣貌，又或是嘗試就職的自我突破，然而最終仍然為自身價值抱持著疑慮。而筆者發現惠英呈現的女性形象與賢妻良母形象具有衝突性，並且，惠英的身分既不屬於妻或母，故事描繪她裡處於畢業後留處家中的過渡期，她不屬於女學生或職業女性等身分。在結局，她的友人們分別選擇了結婚與追求洋裁的抉擇，卻僅有惠英未做出抉擇，依舊維持在迷惘的少女姿態，因此引起筆者的興趣，若以「少女」如此的女性形象視野來探究〈花開時節〉是否具有可行價值。

而當筆者在閱讀〈花開時節〉過程中察覺，其故事背景與少女角色特徵相當接近日本學者⁴所探討的「少女」形象，除了主角在文中常以少女(日:おとめ)⁵

¹楊千鶴，中文版：〈花開時節〉《日據以來臺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邱貴芬(編)，女書文化，2001，頁 66-93。日文版：《花開時節》，南天書局，2001，頁 4-36。執筆參考版本以中文為主。

²台灣文學：據張文環〈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以及池田敏雄發表的後記提及，相較於財力與背景雄厚的西川滿為中心多數日本人創辦的《文藝台灣》，其內容多是以西川滿個人興趣取向顯現異國風情的作風，對此本是《文藝台灣》編輯一員的張文環對西川滿的獨裁作風感到不滿而分裂另起創辦《台灣文學》，並由台灣人為中心於 1941 年 5 月所創刊，其中多是處理台灣風土民情為主，刊登作品偏向質樸純厚的寫實風格且具濃烈的「鄉土」色彩，《台灣文學》中的作品也在戰時體制當中反應出台灣人的立場，並於 1944 年受外部的《文藝台灣》打壓停刊。

³舉例學者如：沈乃慧，〈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的女性議題(上)〉，《文學臺灣》第 15-16 期，1995.7，頁 284-304。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南天書局，1997.12，頁 55-56。鄭鳳晴《日據時期新女性的再現分析：以媒體記事與小說創作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丁鳳珍《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邱雅芳《聖戰與聖女：以皇民化文學作品的女性形象為中心》，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1。

⁴舉例學者如：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勁草書房，2007。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青弓社，2013。本田和子，《女学生の系譜：彩色さ

自稱，另外，在〈花開時節〉裡出現的女性形象特質與故事背景特徵，總括能分類出兩項特徵與日本該時代的「少女」形象相似。其第一項特徵為「感傷情懷」的故事背景與角色呈現，第二項特徵為呈現於惠英的類似「友愛情誼」的情感與行為表現。以下提出日本學者針對此兩項特徵的見解。在以下「少女」（括號）使用於強調日本雜誌媒體中呈現的形象影響，除此以外的少女（未括號）用來表示作中的角色或是未婚女性的稱謂方式。

第一項特徵「感傷情懷」的故事背景，根據今田⁶（2007）的研究提及，在近代日本所發售以少女為消費群對象的少女雜誌中呈現的「少女」集體表象，其核心本質為「清純主義」與「藝術主義」⁷，閱讀少女雜誌的少女們能夠藉由自身的少女特質（少女らしさ）來認同自己的少女的身分，而在1937年進入中國抗日戰爭後因戰情言論管制嚴謹，在少女雜誌的編輯管控與改革下，「少女」所具備的核心本質遭受抨擊而出現了形象轉換，而後「少女」的核心本質由「清純主義」轉向悲觀的「感傷主義」⁸，因此，在該時期日本的少女雜誌中的「少女」集體表象（形象）具備著悲觀且感傷的特徵。

第二項特徵，關於主角惠英類似「友愛情誼」的情感與行為表現，根據久米⁹（2013）的研究提及，自明治末期開始刊載流行於少女雜誌中的少女友愛小說，其中的圖像以及故事內容除了家人或老人小孩此外，未出現與主角少女角色配對成為婚戀對象的男性角色。少女友愛小說會出現這樣的特徵必須歸咎於該時代背景，父權體制支配的社會壓力下隔離了未婚少女與異性接觸和談戀愛的權力。因此，少女小說反映出了日本的父權社會體制排除了少女的異性愛之特徵，所以與異性隔離的少女在少女雜誌中呈現的戀愛的方式轉向為少女同性之間的配對關係，進而衍生出明治大正時期的少女友愛小說，如《少女世界》¹⁰《少女之友》¹¹

れる明治・増補版》，長弓社，2012。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新泉社，2007。大塚英志，《少女雜誌論》，東京書籍，1991。

⁵楊千鶴〈花開時節〉，舉例如「在優雅，美麗之中，少女應持有一縷凜然之風。」（頁69）「那本書將我們這群未婚少女內心裡含糊不清、莫可名狀的煩惱寫出來，我們頗覺心有戚戚焉。」（頁77）

⁶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勁草書房，2007，頁8。

⁷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第五章少女ネットワーク3「核としての清純主義・芸術主義」，頁157。

⁸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第五章少女ネットワーク5-2センチメンタリズム，頁169。

⁹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青弓社，2013，頁181。

¹⁰《少年世界》由巖谷小波主筆1895年1月創刊，1933年休刊。

等少女雜誌出現的少女互相仰慕的投稿與耽美愛戀的投稿小說¹²，其最大的特徵在於少女間的互相仰慕，實際上現實中的少女們也能藉由小說創作、投稿少女雜誌中的專欄，透過文字上的互相仰慕來模仿異性戀關係的情愛表現。

在上述筆者整理，該時代日本的少女雜誌和少女小說中呈現的兩項「少女」形象特徵與〈花開時節〉作品背景相似。在以下，筆者試著實際提出〈花開時節〉作品中類似的具體內容作為事例。

首先是「感傷情懷」的故事背景的類似特徵，以下舉出四項事例。

第一，〈花開時節〉以畢業時節作為開端，感懷留念最後的學生生涯，告別少女時代後便邁入婚姻生活而感到惜情與憧憬，而在音樂老師的緬懷之詞後班上的同學接連的哭了起來，少女們深刻感受畢業時刻即將來臨而更加珍惜（P.66）。第二，畢業後惠英與友人如往常地相聚，惠英以該時代風行日本的《娘時代》¹³一書引述身為未婚少女莫可名狀心情，試問該如何面對所剩無幾的少女歲月（P.77）。第三，惠英翻閱自己「學院」（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畢業一年來的日記，內容盡是不受家人重視而傷心落淚，感嘆自己毫無成長，為了填補空虛而決定找工作（P.80）；第四，另外在友人朱映的訂婚場景中，好友被套上婚戒惠英卻不禁感到感傷，無法理解友人婚嫁的喜悅（P.83）。最後為了歡送即將結婚的朱映好友三人最後的出遊，在八里的海邊場景迎著海風描述友情的薄弱，感受著感傷的情愫（P.89）。

在以上〈花開時節〉中故事內容舉例，其中惠英敘述自己的少女身分時皆以感傷的情懷來進行第一人稱的描述，依據文脈下的理解，惠英認為少女時光的消逝與好友即將邁入婚姻的分別而感傷。因此以上的四項舉例下我們能確實的理解〈花開時節〉中，少女的身分與「感傷情懷」有著相當的關連性。

次來，是惠英「友愛情誼」的情緒表現之類似特徵，〈花開時節〉與日本的少女友愛小說相同的，在故事中並未出現與惠英配對的婚戀異性對象，以下，舉出作中三項實際的「友愛情誼」之事例。

¹¹ 《少女の友》為實業日本社於1908年創刊，1955年休刊。

¹² 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頁178，少女友愛小説の發生。

¹³ 大迫倫子，《娘時代》，鈺脈社，1998。此書為1998年鈺脈社重新出版。

第一，惠英在故事開端引用莫洛亞《結婚、友情、幸福》¹⁴中「婚姻美滿成功的話即會扼殺少女之間的友情」之內容來試問友情與婚姻之間的關係，並且嘗試的在離開學校環境後以執著與朱映與翠苑之間的友情（P.66）。第二，同是在朱映的訂婚場景中，除了上述的感傷情緒，惠英對於朱映因婚嫁命運被決定卻洋溢著幸福表情而感到疑惑（P.83）。第三，同為海邊場景，惠英藉著感傷的情愫質疑友情遭結婚所催敗（P.89）。

以上，少女雜誌中的「友愛小說」雖是強調排除異性愛，少女之間的配對關係，實際上與〈花開時節〉中的友情描寫有些差異，然而惠英在文中多次以友情與婚姻來比較試問，她與其他即將邁入婚姻的同儕不同，相當執著於友情，並抗拒相親事宜，對於友人婚嫁之事心中抱持著不解與疑慮，因此我們能藉上述特徵內容理解惠英的情感寄託部分確實對友情有著相當的執著。

藉著以上舉例的「感傷情懷」與「友愛情誼」兩大項特徵與對照，我們能理解，該時代日本的「少女」形象與〈花開時節〉中的女性形象相當接近，因此筆者認為〈花開時節〉具備了「少女」研究視野的可行性，而上述的兩大項「少女」類似特徵也與文中惠英所呈現的自我迷失現象有關連，以下為本文引用。

女人的一生從懵懵無知的初生嬰兒時期開始，經過幼年時代，然後便是一個學校接一個學校念下去，尚且無暇喘口氣的時候，又緊接著被催促要出嫁，然後在生兒育女之中轉眼就衰老而死。（中略）果真每一位已結了婚的同學，她們都是心甘情願、同意出嫁的嗎？（中略）我渴望能靜一靜，有喘息的時間與空間，來瞭解我自己。（P.75）

如同惠英在文內設問為自身女性價值感到疑慮的同時，其中也散發出相當的感傷情愫，當同學的結婚喜訊傳來時惠英雖擔憂自己最終會成為無法出嫁的碩果僅存，她卻仍在內心反駁認為自己是在「尋找自我」，在故事脈絡裡試圖和友人一同拜訪已婚好友探究所謂的婚後生活，另外也是上述提及的惠英也藉由就職來尋求疑慮的出口，最後仍然以「自我迷失」的理由結束了短暫的就職。

以上，可藉由探究惠英在故事中呈現的「感傷情懷」觀看她的生存姿態。惠英的感傷情懷分別來自於身分的「告別」與「未完成」，她告別了女學生的身分，以及好友們陸續步入婚姻代表「告別」了少女的身分，而惠英維持在未打算結婚，

¹⁴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新潮社，1950。

不抉擇進入婚姻，以及就職卻沒有獲得明確成就的「未完成」狀態。惠英的少女身份處於女學生之後與結婚前的間隙之中，就如同結婚的來臨必須告別少女身分而感傷，而這份「感傷情懷」與惠英的少女自我認同有相當的密切關聯。另外，由社會背景等外界壓力來看，〈花開時節〉中使得惠英困惑於自我價值的主因可歸咎該年代女性仍不適就職，必須等待婚嫁的傳統思維，而當惠英的友人陸續邁入婚姻的過程，她似乎產生了遺落感進而出現執著友情(友愛情誼)的情感表現。

因此在這般推論下能理解，〈花開時節〉中的呈現的兩項類似日本「少女」形象特徵—「感傷情懷」「友愛情誼」—與惠英的自我迷失呈現環環相扣的。如同筆者發現無法明確定位〈花開時節〉的女性形象之疑問點，惠英也是如此，她沒辦法以一個明確的身分來說明自己而呈現出自我迷失的狀態¹⁵，因此若能以「少女」這般女性形象來檢視惠英的自我認同，藉著「少女」分析視野釐清故事中錯綜複雜的「婚姻」、「友愛」、「感傷」等呈現間的關係性，以及惠英的少女的自我認同發展之過程與塑造，在女性形象研究範疇裡具有研究意義或價值。

1-2 前行文獻回顧

1-2-1 前行文獻之考察範疇

日治時期相關的女性形象分析研究舉例如有影像、音樂、平面媒體以及文學創作等各類範疇，而本論為以〈花開時節〉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作為軸心的作品論，前行文獻之考察範疇設定為日治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關研究。因此筆者涉略的相關前行研究以日治時期文學作品之相關的女性形象分析為搜索主旨，考量目前的前行研究中並沒有以少女作為切入點的研究，而在〈花開時節〉中的提供可得知惠英為畢業於女子高等教育—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的前女學生身份，故事脈絡中曾一度求職最後仍然為無業的待家狀態，因此優先參考日治時期相關女性形象研究中出現的「女學生」「待家女性」的形象探討，作為本論的相關前行文獻參照對象，並理解這些相關前行文獻探討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走向，以何種視角關注文學作品中的「女學生」以及「待家女性」。再來並詳細探究〈花開時節〉中的女性形象相關評論，理解〈花開時節〉中女性形象目前的研究定位，進一步

¹⁵ 這裡所指的自我迷失，意指惠英未做抉擇於結婚或是就職獲得終生職業的樣貌，這樣的樣貌亦是少女的自我認同之特徵。

深入探討以「少女」形象研究〈花開時節〉的價值與研究貢獻何在。

1-2-2 日治時期文學作品中「女學生」與「待家女性」形象及〈花開時節〉之相關研究

鄭鳳晴¹⁶（2008）研究關注的「新女性」的形象與本論欲探討的「少女」形象有相當的重疊，其研究綜合彙整了日治時期中媒體記事與小說創作中的「新女性」形象概要，鄭所界定的「新女性」一詞為曾接受新式教育的台灣女性，並以官方立場的《台灣日日新報》，探討其平面媒體所期待的女性形象，再透過民間立場的《台灣民報》，理解女性回憶錄中實際層面的「新女性」，最後探討該時代的文學創作中再呈現的「新女性」形象，並理解其文化價值與意涵。

參照鄭的研究成果，可概要理解日治時期「新女性」相關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議題，自 1922 年第一篇新女性相關小說〈她要往何處去〉中出現了鼓勵女學生追求婚戀自主議題，而後受到世界社會風氣影響後，在 1930 年代後議題如兩性與家庭和諧，1940 年代因戰時體制而回歸保守主題的階段性議題，其中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敘事差異也為她關注的重點。鄭鳳晴的研究集結了日治時期中媒體雜誌至小說、以及男性作家視角與女性作家視角多重面向的女性形象。另外也提及了「女學生」與「待家女性」為題材的作品其敘事模式和手法通常以婚戀話題為主軸，女性在該時代處於弱勢，她們在受新式教育的過程中啟發自我主見，作品的特徵也具有濃厚的反抗意識，因聘金文化的婚姻買賣舊俗使女性往往不允許就職而待家，因此「女學生」與「待家女性」為題材的作品關注的話題多是女性接受新知識的啟蒙，而〈花開時節〉的相關評論也被歸類於其中。

丁鳳珍¹⁷（1996）研究探討日治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以殖民者、資本家、封建父權體制的社會背景作為思索焦點，探討台灣日治時期特有的「性別、階級、種族」多重社會權力結構，關注其女性作家的出身與創作背景，如何書寫建構出女性角色的女性意識，其中如有描述女性角色的不幸以及男性視角的無能為力¹⁸，以及其中女性角色的掙扎與奮鬥。丁的研究替日治時期男女作家之作品

¹⁶鄭鳳晴《日據時期新女性的再現分析：以媒體記事與小說創作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¹⁷丁鳳珍《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¹⁸舉例作品如楊華〈薄命〉、呂赫若〈月夜〉〈廟庭〉、翁鬧〈殘雪〉、楊逵〈水牛〉等。

的女性角色所被賦予的意識添上註解與說明。概要俯瞰日治時期的女性描寫的作品小說整體，而資產階級層面的女性描寫主要在於批判父權結構欺壓女性一面；勞動階級層面的女性角色描寫其用意在於批判資產階級對勞動階級的剝削，次要為種族壓迫與性別制裁。女性角色的悲慘遭遇成為了知識分子感傷情緒的發洩對象，其中針對〈花開時節〉的評論，仍是論述主角處於殖民社會與父權家庭中徬徨無助，其女性角色身處於「半新還舊」的尷尬處境。

邱雅芳¹⁹（2001）的研究以1937年至1945年戰敗的日本統治末期期間的皇民化文學為研究對象，以後現代女性主義進行研究方法，評論並且分析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因該研究是以皇民化政策探討為中心，關注的話題必然在於奉公與國家貢獻的主旨上。並且將研究作品以種族與性別分類為日人作品、男性作家、女性作家三大項，其中男性作家寫作方式採取主動積極態度，日人男性作品更是另當別論傾向國策，日人女性作品則遵循大和精神發揚，扮演軍國之妻的角色好仿效日本男性的國家認同，而台灣女性除了備受種族上的衝擊外還必須承受父權制度的雙重壓迫。在該研究中針對〈花開時節〉的相關評論，楊千鶴做為日治時期女性中寫作條件與處境最為優勢一人，因〈花開時節〉並非皇民化作品無細談作品內容，〈花開時節〉仍是被定位於知識女性對抗傳統婚姻思想的主題小說。

透過丁與邱的文學作品研究能概要得知日治時期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脈絡，如丁提及的日治時期的女性處於「性別、階級、種族」多重壓力的社會背景，因此女性相關的文學作品多會把議題聚焦在女性被壓迫的一面，以及在皇民化文學作品中女性所呈現的為國奉獻的賢妻良母特徵。然而丁鳳珍的究中對於〈花開時節〉的評論皆察覺了其中的女性角色的特殊現代性但並未更深入探討。

王婉葶²⁰（2014）以1934年至1939年刊登的婦人雜誌《台灣婦人界》為研究範圍，說明《台灣婦人界》的刊旨為啟蒙指導女性與國家政策宣揚、強調現代女性的食衣住行育樂、透過由家庭，由內向外深層教化與動員等功能。其婦人雜誌內容取向從女學生乃至家庭主婦或職業婦女，經常報導各行各業、女性楷模、女學校，介紹校園實際狀況、女工工廠、巡演歌劇團、服飾與化妝等，更設定立

¹⁹邱雅芳《聖戰與聖女：以皇民化文學作品的女性形象為中心》，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1。

²⁰王婉葶《世界·民俗·帝國：〈台灣婦人界〉小說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碩士論文，2014。

了「共婚座談會」與「畢業後的希望」等專題投稿欄，《台灣婦人界》可說是綜合了日治時期多元女性面相的雜誌媒體。王在研究中進行了概要分類，並關注《台灣婦人界》中刊登的小說之中的多項議題，其中小說的走向與特徵強調賢妻良母的典範化，另外社會基層的面向多是報導女性面臨經濟、法律、父權之下的多重壓迫來批判女性身體的剝削，更或是以宗教民俗題材以及通婚與混血的題材創作，皆是與同化政策息息相關的觀點。

回顧以上研究，丁以日治時期的女性所受「殖民者、資本家、封建父權」三重壓迫關注其議題，女性描寫的小說往往受關注的話題在於女性在壓迫下如何反抗突破。而作家藉由女性個體創作，用各式故事陳述女性在當時的待遇，描寫這些女性角色在故事中以何種方式「展現自我」以及「與社會抗衡」便是筆者欲關切的話題。如〈她要往何處去〉²¹中，主角被解除婚約而赴日留學，藉由學問知識重新包裝自己，「求學」能作為呈現女性自我價值的方式與管道，這除了強調女性知識啟蒙濃厚意味外，也強調女性擁有打破社會階級追尋自我的權利。

如同上述提及，相關研究中針對〈花開時節〉的部分描述，各學者的共識皆是正面評論其故事人物受新式教育的洗禮，讚揚〈花開時節〉中的現代特殊性，而實際上針對〈花開時節〉進行深入探討的研究並不多。唯有陳怡君²²（1999）針對楊千鶴探討以作者本身的「女性自我主體」為軸心出發，理解作者楊千鶴的出身背景來探討她的文學創作，研究中進一步解釋說明〈花開時節〉與1999年發表的自傳《人生的三稜鏡》²³之間的重疊性，因此，〈花開時節〉也可作為作者楊千鶴本人的女性經歷投射，陳將〈花開時節〉論為楊千鶴鞏固文壇的重要一作，其評價在於〈花開時節〉隱含的批評與嘲諷，且簡潔有力的表達出傳統女性的生命力發展，其中關注的焦點固然在於主角惠英受新式教育與散發出的獨特浪漫氣息。

以上，筆者提及的各研究他們關注的焦點大多在於，女性受新式教育與新潮思維啟蒙所具備的獨特新式現代特徵，針對〈花開時節〉的時代背景與其中女性的特質許俊雅²⁴（1997）有一番說明。他提起十九世紀世界風潮的近代化思潮受

²¹謝春木〈她要往何處去（彼女は何処へ）〉，1922。

²²陳怡君《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的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²³楊千鶴，張良澤、林智美譯，《人生的三稜鏡》，南天書局，1999。

²⁴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南天書局，

歐洲個人主義與民主主義影響，民主主義運動與民族自決思潮藉著海外留學的文人以及流通於民間的平面媒體（雜誌、報紙、書籍刊物等）進入台灣社會，在這之中反封建、反傳統、反陋習的文化意識與社會運動崛起，時代風潮中的啟蒙意識蘊含了抗日與啟蒙的雙面相，同時代也出現了針對婦女問題所提倡的婦女解放運動，而運動關注的議題如女性的地位與婚姻制度批判。因此，由舊式的封建型態解放並且達到知識的啟蒙，如此的主旨為當時婦女解放運動的軸心精神指標，提倡這些思維的多為思想較通達的男性文人，如反對聘金傳統下的買賣式婚姻、媳婦仔等陋習，針對該時代提倡的「解放」一詞，許俊雅論述如下。

將婦女自家庭納入生產線上，此時婦女所受正面肯定之作為，卻往往只是將婦女之智、勞力奉獻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行列中；當時有些婦解言論，其目的只是企圖「改造」婦女以便吸納其勞力與智力，以遂行其進一步的剝削。²⁵

由許俊雅針對「解放」一詞的論述能理解，該時代由男性主導的文化思潮與解放運動，其提倡的「解放」實質上是將女性由家庭「空間」的對外解放，而〈花開時節〉主角惠英在故事中一度求職的此行徑便與該時代的解放思維特徵一致，惠英的一度求職的獨斷行為，是以往研究者探討與關注的話題軸心，其原因在於研究者關注的，是在於女性與婚姻之間的人權與知識啟蒙問題，因此上述〈花開時節〉的相關評論，皆是探究其中新式與舊式思維的抵抗與磨合一致的特徵，最終而聚焦在惠英一度就職最終卻回歸家庭空間，這文脈上最顯著的軼事。另外，許俊雅在該研究中評論〈花開時節〉的部分說道，「主角作為知識女性擁有選擇婚姻的權利、尋求自己的生活方式」，針對許俊雅的這方解說筆者認為惠英的「追尋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不在於求職，反而與少女的「友愛情誼」有關，在各研究評論中有關「友愛情誼」的描寫，以及與少女形象塑造有關的獨特「浪漫氣氛」僅被歸論為背景一環，以至於尚未有研究以主角惠英的情感表現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唯有陳佩甄²⁶（2013）以「同性愛論述」的立場關注了〈花開時節〉其中的議題，陳佩甄提起主角惠英的「自我」與「體制」的衝突下充滿了矛盾，並將惠英在文中的對友情呼喊的浪漫詞句解讀為她深刻的慾望，在〈花開時節〉的結局

1997.12，頁 55-56。

²⁵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頁 30-31。

²⁶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台灣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13.12。

並未對惠英所追尋的自我與未來多做敘述，留給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因此陳佩甄將惠英與好友之間的友愛描寫歸類做「類同性愛」經驗。然而陳的論述發現了〈花開時節〉中的「同性愛」議題，關注的焦點在於惠英面對「友情」與「婚姻」的兩難，最終將「類同性愛」的情愫投注於友情的呈現上，將此行為認定為某種「自我審查」。而筆者認為，這樣惠英的友情呈現議題尚未被重視的原因在於，非自傳性質的〈花開時節〉受局限於小說性質以至可信度受質疑，陳佩甄在論述最後並未深入追究惠英的「自我審查」留下了該課題。然而陳佩甄的研究結果也給予本論更深層的啟示，也就是惠英的在文中呈現的「友愛情誼」表現與她的自我認同有著相當的關連。

然而，〈花開時節〉為女子教育體制完整的日治後期背景下，女性已是受知識啟蒙的對象，抗衡的「殖民、父權、封建」三重壓迫仍然存在，主角惠英雖藉著求職或探究好友的婚後生活試著陳述了面對婚姻的「抵抗」與「理解」，而文中圍繞的首要話題「婚姻」問題仍然是壓迫女性自我發展的阻礙主要原因，如上述提及，以往〈花開時節〉的相關評論探討的軸心在於惠英受到婚姻壓迫的抗衡為一度就職的行為呈現，正面且肯定其中的「友情」描寫是未婚少女具備的獨特浪漫情愫，有關「友情」的相關情感描寫，易被視為女性在求學的創作背景一環，而不易察覺其中的情感表現可能代表著身為少女的「抵抗」更或是「自我意識的呈現」，因此在各項評論中往往只肯定〈花開時節〉中女性蘊含的現代性，以及女性在該時代不得外出就職的社會風氣。

承接上述彙整的相關研究的評論整理，就如同楊千鶴描寫的開放式結局供世人無限想像。最終我們仍然無法得知惠英欲追求的自我發展，因此而呈現了「自我迷失」的樣貌，也如同陳佩甄以友情視作惠英的「自我審查」之觀點探討後留下的課題。筆者抱持著以下疑問探討本論，主角惠英與外界壓力（婚姻抑或是傳統思維）抵抗而追尋著真正的自我發展為何。其社會背景與造就惠英將情感寄託於「友愛情誼」的緣由為何，惠英的「自我呈現」與「友愛情誼」之間的關係性又是如何互相運作。以上為本論欲關注焦點，並在後續章節以少女為軸心觀點切入進行探討。

1-3 研究方法—日本「少女」研究概要

如上節提起，惠英與婚姻所帶來的外界壓力抗衡，並且追尋理想的「自我發展」的樣貌呈現，其故事背景的婚姻所帶來的外界壓力亦是台灣社會風氣中的傳統婚嫁壓力，若探討惠英的「自我發展」與外界壓力之間的衝突，必須追究〈花開時節〉其時代的傳統社會背景。

透過〈花開時節〉文脈可得知惠英的學歷背景，以及擁有書物閱讀、與友人交換書物分享的習慣、電影鑑賞的興趣培養。因此，可理解惠英與其中登場角色確實為女子教育與文化思潮洗禮的對象，如在 1-1 論述中提起〈花開時節〉與日本「少女」的形象類似性，主要藉著「教育」與「平面媒體」之媒介影響下產生其「少女」的獨特的自我形象與塑造，因此在本論欲藉由探討〈花開時節〉故事中少女角色群體所接受的女子教育，以及該時代的文學思潮是如何影響少女個體，若假設惠英追求的為類似日本的「少女」自我認同，筆者試圖以日本學者所探討的分析方法，其影響少女個體的形象塑造的「女子教育」與「平面媒體」等相關論述引用，參考後確立「少女」研究的觀點後再進一步借用作為研究方法，探討該時代台灣的少女形象，運用於〈花開時節〉作品分析之中。

關於「少女」在台灣的女性形象研究領域中有些陌生，也可說是尚未被發掘的研究領域，但在日本的研究範疇中，「少女」一詞作為獨立的女性形象於 1990 年代開始掀起熱切探討。根據本田²⁷（2012）的研究解釋了「女學生」形象在明治時期的演變，在日本近代化趨勢下教育體系演變至男女分學，同時雜誌媒體也分裂出「少年」與「少女」的各別獨立體系，並詳細論述了「女學生」的身分特性，內容如下。

公民教育是以男性學生為中心，（中略）導致「非男性學生」「非投資對象」的女子們被排除而建立了獨自的領域，也就是「女學生」這樣的無投資價值的群體……。然而因時代演進女性們必須背負養育中產階級的責任，終於在 1900 年前後成為了國家投資的對象，然而這被納入公民教育體系的「女學生」群體與「中學生」相異且被冠上了奇妙的性格。（中略）女學生的未來目標與中學生不同，在進學與就職皆被封閉在曖昧的狀態。她們在不能成為公職且無法習得求職技能的地平上被要求成為國家有用之途。其結果就是

²⁷本田和子，《女学生の系譜：彩色される明治・増補版》，長弓社，2012。

以「賢妻良母」為目標……。然而，作為賢妻也不知能在何時何地相遇那未知的異性。作為良母也不知那該照顧的孩童在哪。²⁸

同上述，由男性學生群體中排出的獨立個體「女學生」，在國家層面上培育女學生的價值在於養育後代的使命。因此，她們必須以「賢妻」與「良母」這兩項無法觸及的虛幻形象作為習得學問的目標，這也是主角惠英處於無法就職也無法實踐賢妻良母的徬徨狀態，在教育中未有明確的職業出路，而以賢妻良母為目標又過於虛實飄渺，最終成了自我發展迷失的結果。因此以賢妻良母為教育目標的女子教育，反而造就了女學生與現實抽離的特殊性格，女學生在教育體制下必須以「賢妻」與「良母」作為女性自我發展的目標前進，本田將成為「賢妻良母」前的空窗期稱之少女期，而在這與現實抽離的曖昧地帶中誕生的就是少女的自我認同。

以上藉由本田的論述引用，我們能理解女學生在求學期間與現實抽離的特殊性格是「少女」的自我認同形成與形象塑造的重要因素，因此「少女」也可說是由女子教育體制下的女學生所進階誕生的形象體，而有關少女的具體規範的方面渡部周子《「少女」像的誕生》²⁹有更詳細的論述。

渡部認為即使女學生在國家期待的女子教育下，以成為賢妻良母為目標來實踐身為日本國民的奉公奉獻，然而在少女時期的求學女性仍然無法實際達成賢妻良母的職責，因此除了重視成為賢妻良母必須的技能教育之外，女子教育中相當重視未婚女性心性教育，渡部將其心性教育分類為三項實際影響少女的行為規範。其論述如下。

我認為少女期的教育中，為了讓賢妻良母的職責持續作用以及將其職責

²⁸本田和子，《女学生の系譜：彩色される明治・増補版》，頁 135。公教育は男子生徒を選び出して中心に置き、(中略) その結果、「男子生徒でもなく」「投資の対象にもなり得ない」女子たちは排除されておのずから別のカテゴリを形成することになる。すなわち「女学生」という無用者の集団……。彼女たちが中産階級の育成その他に時代的要請と結び付いて、ようやく投資の対象とされた 1900 年前後なのだが、しかし、こうして公教育に組み込まれた「女学生」なるものは「中学生」とは異なる奇妙な性格でしるしづけられる。(中略) しかし、女学生たちの行く手は中学生のそのと異なって、進学の道も実業に就く道も、すべて曖昧に閉ざされている。官界でも実業でもない地平に探られる国家有用の途。その結果彼女らの前に掲げられた「良妻賢母」という目標……。しかし、良妻として仕えようにも、その相手は、いつ、どこでめぐりあえるか、予測もつかぬ未知の異性である。賢母として育むべき子供もはたして、授かりうるものか否か。筆者譯。

²⁹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新泉社，2007，

內化入少女，因此給予了少女期特有的規範。正如同在文章開頭敘述的少女特有規範—「純潔」規範（生理的純潔）、「愛情」規範（愛情的豐富）、「美」規範（容貌的美麗）—。³⁰

渡部以高等女學校的修身科教科書做為研究場域，探討了影響少女的實際行為與心性規範，其三項規範分別限制了少女的身體、心理以及外貌，卻不影響少女成為賢妻良母的最終目的，這也呼應上述本田的言論中，女子教育體制下的女學生具有與現實抽離的特殊性格，而「少女」的形象個體由女子教育體制下誕生，並藉由上述三項的心性教育規範而成。而另一方面不能忽視的是書物流通與思維近代化過程，流通於台灣與日本間的平面媒體也為「少女」形象補強的要素。以下引用今田的論述。

（前略）少女雜誌能夠藉由流行、用詞、動作、想法、嗜好、品味、生活方式等多項「事實現象」綜合建立出「少女」的性別身分認同（自我認同）。這些看似毫無關係的「事實現象」藉由「少女」賦予了不同意義，也就是創造出一個自我認同。³¹

藉由今田的論述我們能理解，求學階段的女學生能藉由閱讀雜誌媒體等書物，吸收其中的「少女」概念認同自己為「少女」的事實。另外，本田以明治時期的女學生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少女」出現的社會背景，與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變化，如同上述提出的女學生進一步塑造成為「少女」的特殊性格，在少女雜誌的考察當中，本田察覺女學生以虛幻的筆名投稿讀者專欄，其中本田將「少女」們的獨特群體互動命名為「少女幻想共同體」。而繼本田後大塚英志《少女雜誌論》³²也為「少女」的形象誕生有更確切的整頓，引用如下。

³⁰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18。少女期の教育においては、良妻賢母役割と連動しつつもこの役割を少女に内面化させるために、少女期特有の規範が与えられたと考える。それこそが、冒頭に述べた少女に特有の規範—「純潔」規範（性的に「純潔」であること）、「愛情」規範（愛情に富んでいること）、「美的」規範（容貌において「美しい」ことである。）筆者譯。

³¹今田絵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8。（前略）しかし、少女雑誌はファッション、言葉遣い、ふるまい、考え方、嗜好、センス、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実に様々な事象を「少女」というジェンダー・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でまとめあげる。すなわち、なんの関連もないような事象を「少女」という意味によって結び付け、一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核にするよう促すのである。筆者譯。

³²大塚英志，《少女雜誌論》，東京書籍，1991。

(前略)明治三十年代，女學校令發布後「少女」在學校制度與女性雜誌平面媒體，圍繞在兩種形式下誕生。「少女」最初由虛構中誕生這點至今仍未改變。但是制度與平面媒體的共犯關係的催生下虛構與實體逐漸結合，「少女」以各式型態再現並不影響其虛構性質。因此「少女」幻想是先由學校制度的包裹下，在藉由少女雜誌媒體進一步定型化，最後越境於現實層面。³³

由上述列舉日本學者針對「少女」誕生與形塑而成的論述，最初探討中「少女」是種出現在女學生個體上的幻想共同體，並在教育體制與平面媒體塑造下誕生的性別身分認同—「少女」自我認同—。「少女」的自我認同並非湊巧出現在女學生上，女學生的身分誕生於教育體制下，並為了成為賢妻良母作為國民奉公目的而出現了與現實抽離的性質，如大塚提到「少女幻想越境於現實層面」³⁴，少女一詞能作為單純的身分稱謂，或是作為「少女」的自我身份認同、以至媒體再現(ex.名詞稱謂：一位少女 / 自我認同：我們是「少女」)，延伸為各種稱謂與自我認同的雙方意義，並以各式型態出現在現今媒體。嘗試舉例〈花開時節〉故事中的少女事例，就如同惠英最初本是女學生的身分個體，並以「少女」一詞作為自己的身分稱謂，然而這「少女」並非單純的自稱，其「少女」一詞所具備的自我認同特徵以及其背後作用的機能性，是如何透過女子教育與平面媒體內化形塑而成，便為本論欲追究探討的核心議題。

在以上論述中，嘗試與「少女」類似特徵的對照下，我們能理解「少女」研究視野與〈花開時節〉的相容性。〈花開時節〉以女子教育為故事背景，而 1940 年代的台灣為日本殖民統治近 45 年歷史，並與日本島內採取類似的賢妻良母教育方針³⁵，就日本的「少女」出現的時代背景，台灣很可能出現所謂的少女的類

³³大塚英志，《少女雜誌論》，頁 278。(前略)明治 30 年代、女学校令という学校制度と女性雑誌というメディアによって二重に囲まれる形で〈少女〉は誕生する。〈少女〉は最初から虚構として生まれ、それは今も変わらない。だが、制度とメディアと共犯関係で生み落とす虚構はしばしば実体と結びつき様々な形で〈少女〉という虚構もまた例外ではない。〈少女〉幻想は、まず学校制度によって囲いこまれ、少女雑誌により定型化され、その上で〈現実〉の側に越境していった。筆者譯。

³⁴指少女表象在現今透過少女文化再現於媒體之中。舉例如現代日本流行的少女漫畫，也是一種「少女」形象越境於現實媒體的呈現。

³⁵呂明純〈日據時期女性作家之自我呈現—以辜顏碧霞、楊千鶴為主要討論〉《台灣新文學》，2000，頁 35。一、教育目標：「國家主義」和「賢妻良母觀」的結合。根據洪郁如的研究，二次引用(游鑑明：1988：54、58)提示作者楊千鶴所就讀的私立靜修於 1916 年以「養成賢妻良母的資格」為其教學標榜，「殖民地台灣的女子教育目標，不出精通日語、培養日本國民性格、涵養婦德和

似主體與產生其自我認同的社會背景脈絡，在教育體制下的女學生個體若與日本相同造就出與現實抽離的性格，其受到的影響要素相較於日本方面，必須考量殖民教育中的同化政策成分，平面媒體方面可能更受到日本以外的思潮影響而錯綜複雜。因此本研究參照日本學者一渡部周子與今田繪里香—探討「少女」研究關注的焦點，套用於台灣的研究範疇下，嘗試了解女子教育方面影響「少女」自我建構的心性教育為何。該時代的女學生所閱讀的書物以及接受的文化思潮實際上為何。想必出現在台灣的少女形象體與日本的「少女」具有不同的特徵與機能作用。

而在數量眾多的近代日本少女研究之中，渡部周子的研究成果《〈少女〉像的誕生—近代日本的「少女」規範之形成》一書以日本女子教育為場域考察「少女」之心性規範，能作為本論考究台灣女子教育中的少女規範之依據；以及今田惠里香的研究成果《「少女」的社會史》一書以大正時期至昭和戰後時期（1910年至1950年）的少女雜誌作為研究場域，並關注其中呈現的「少女」像的轉變與社會背景之關係。而今田研究關注的研究場域—少女所閱讀的少女雜誌—，實際上在根據山本禮子的《殖民地台灣的高等女學校研究》的問卷調查結果³⁶，1925年至1945年的畢業生表示在女學校的生活中，女學校使用的教科書以外也閱讀多類書籍，在學校圖書館借閱或是透過舊書店購入，女學校具有相當豐富的書籍資源，如今田研究中出現的日本少女雜誌（少女俱樂部、少女之友）包含於女學生喜愛閱讀的書籍之中，並且也閱讀著名少女小說家吉屋信子的作品³⁷。因此透過以上山本針對高等女學校的實際調查結果，可推定〈花開時節〉中的少女角色，在高等女學校時期為受少女文化的消費群體。以上兩位學者的著作所網羅的研究對象之少女，確實符合筆者欲研究的〈花開時節〉中的少女角色，因此在本論中會使用此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作為日本社會背景之參考依據。

傳授有關知識為主。尤其偏向同化教育和家庭教育，可說是殖民教育政策和日本國內女子教育方針的結合體。（游鑑明：1988：58）」。

³⁶山本礼子《殖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多賀出版，1999，頁111-112。參考山本的問卷調查，以台北第三高女（現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的1925年至1945年的畢業生為重點調查對象，分別調查了生活環境（父母之職業、家庭結構）、在學生活（出身公學校、入學動機、校園氣氛、課程內容等等細部問卷調查）。

³⁷山本礼子《殖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頁139。⑤讀書・習い事。

1-4 研究架構

本論以〈花開時節〉作為軸心進行作品分析之試論。透過上述連貫筆者假設少女惠英在故事中處於種「未完成」姿態³⁸，遇上自身與旁人發生的婚事話題而觸發了「感傷情懷」，進一步透過「友愛情誼」來呈現自身的少女自我意識，為進一步考證以上假設的背後意涵，首要探討〈花開時節〉的故事背景。透過〈花開時節〉故事中的婚事話題提示，在故事開端「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的女子教育環境背景，伴隨著主角群在結婚話題中不斷強調少女的自稱，而後，惠英險要聽從父親與姑姑的意識決定出嫁，在結婚的話題來臨惠英並未有反抗的餘地，所幸惠英的二哥作為理解者替她說情而免去婚事，由此即能得知身為少女的惠英在家中的服從立場。恰好當時 21 歲的楊千鶴作為與主角惠英同樣的少女身分，她在受男性作家主宰的文學環境中是以何種立場與環境資源撰寫〈花開時節〉，以及發表刊物的《台灣文學》的政治立場，因此在 2-1 首要探討楊千鶴的創作立場作為背景一環。

而呈現在〈花開時節〉其中的少女特徵，與惠英圍繞著婚事話題之中進而呈現成自我迷失狀態是有跡可循。首先，針對與惠英的自我迷失狀態有密切關聯的「感傷情懷」特徵與「友愛情誼」特徵來看，關於「感傷情懷」，她在學校環境中同學陸續邁入婚姻而感傷，這背後必須追溯的是女子教育體制下是以如何的手段來教化少女成為賢妻良母，以至於故事中少女們惜別最後的少女時光而感不捨；在朱映的訂婚儀式中出現了「友愛情誼」之表現，如惠英在故事中說道「命運被決定了。」朱映選擇結婚也象徵了惠英的落後，然而訂婚儀式上卻是以聘禮的傳統文化來衡量一位女性由出生到婚嫁這段時間的「自我價值」，惠英對這如同買賣化的場面感到不滿，而出現了重視友情的「友愛情誼」之自我呈現。因此設問惠英自我迷失的主因可能來自於社會背景中以下兩項主因，其一：聘金文化的傳統性，其二：女子教育中的賢妻良母主義方針，在 2-2 與 2-3 筆者嘗試歸類此兩項少女呈現特徵與主體自我意識之間的初步歸類與整理，並探討其背後的社會背景。

而當在透過彙整聘金文化與賢妻良母主義方針之女子教育，我們能進一步理解對少女而言所謂的「賢妻良母」，它在作為社會所期待的理想形象的同時，也作為少女自我發展的壓迫來源，因此在成為賢妻良母前她們必須學習維持自己的

³⁸ 指不屬於女學生，又未接受婚事結婚進入下一人生階段的間隙間之狀態。

少女樣貌。在研究方法筆者引介大塚英志「『少女』圍繞在學校制度與女性雜誌媒體此兩種形式下誕生」之論述，女子教育環境創造出了少女的個體，她們可再藉由雜誌中的少女形象建構出了自己的少女自我認同，如前文提及〈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呈現與日本同時代的少女友愛小說有著類似特徵，因此，在理解少女友愛小說背後給與閱讀者少女的意涵與內化規範機能性後，筆者嘗試彙整出少女文化與少女自我發展之關聯，以便後續第三、四章深入分析作品。第二章作為初步連貫的過程，以作者創作立場、社會背景、少女文化思潮此三項作為創作背景之軸心來探討惠英與外界壓力之關係。

在初步探討〈花開時節〉外在的創作立場域社會背景後，在第三章進一步深入探討〈花開時節〉中的內化要素之影響，藉由參考渡部周子研究成果提示的「少女規範論」，以女子教育中的「愛情規範」「純潔規範」「美規範」三項心性教育作為參照依據，理解女子教育中是如何內化規範少女的自我意識，進一步產生少女的自我認同。以渡部的研究作為範本後回歸台灣的女子教育，考察該時代的女子教育觀，實際是如何規範台灣少女的心、性以及容貌，逐步由外在背景至內化要素。再來探討〈花開時節〉中出現的作中作《結婚、友情、幸福》與《娘時代》的作中特徵描寫與影響性與主角惠英的少女自我之形象塑造關聯。第三章作為〈花開時節〉的少女內化規範與形象塑造之過程探討。

在透過第二、三章探討〈花開時節〉的外在背景與內化要素影響後，第四章綜合前兩章觀點，並且引介今田研究成果—少女雜誌中所提示的成功者形象，進一步探討〈花開時節〉中少女可抉擇的自我發展出路，並且同時對照作者楊千鶴出版之自傳《人生的三稜鏡》歸類作者的實際事例與關連性，推測主角惠英的少女自我呈現，在第二章初步推測的少女自我特徵與少女自我意識的連結，其特徵呈現所具備的機能性為何。在第四章，筆者欲進行由外部社會背景至內化因素的總整分析，探討惠英的少女自我呈現。最後，並於第五章結論釐清主角惠英的自我迷失之議題探討。

1-5 研究假設

以上，我們可理解少女與賢妻良母兩者為一體兩面的形象關係，假設惠英能透過教育與少女雜誌等媒體學習少女的自我認同，而成為賢妻良母的背後蘊含了

傳統社會的壓抑與眼光，透過上節的研究鋪排能逐步釐清惠英名為少女的自我之發展脈絡與外在壓力之因素，少女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磨合與抗拒。因此作品中身為少女的惠英，她面對婚姻的不安而對少女的自我價值感到疑慮，嘗試了就職卻不成功，於是藉著友愛行為鞏固並保有自身的少女自我意識，自我發展出路被阻斷下同時藉著「感傷情懷」否定身為少女的自我價值，這樣矛盾的自我呈現也是我們在閱讀〈花開時節〉時發現的－惠英追尋著理想的自我尚未得到解答的迷失樣貌。而惠英所萌發的少女自我意識可能受到來自當時日本的少女雜誌影響，而與日本相異的社會背景下的〈花開時節〉是具有發展出屬於台灣本土的少女形象之可能性。

1-6 研究目的

本論透過上述推演的假設，主角惠英的少女自我認同在體制中誕生與塑造，卻也因體制的衝突下產生了自我迷失的矛盾關係，在研究目的筆者欲嘗試以以下三項目的推演至結論。

第一，關於主角惠英的少女形象探討：藉著解析〈花開時節〉當中由女子教育與平面媒體—少女雜誌—如何塑造出少女形象，探討惠英的少女形象的塑造過程與她的自我認同；第二，是關於少女與外界壓力之間的賢妻良母化³⁹之議題，並理解惠英的自我呈現，如故事中藉著「友愛情誼」抵抗外界壓力的行為作為範例，嘗試解釋惠英意圖呈現的抵抗行為，並理解她充斥著「感傷情懷」的生存姿態；第三，為少女的研究領域定位，在日治時期的女性作家之作品研究中尚未有以日本「少女」形象作為切入點之研究，筆者欲透過本論以〈花開時節〉作為少女研究的先例，其在日治時期女性研究中的貢獻為何，希望能透過本研究為日治時期女性形象研究引入不同的研究視野。

³⁹ 指自身與旁人接受婚事陸續結婚成為賢妻良母之事。

第二章 〈花開時節〉的創作背景探討

2-1 作者楊千鶴之創作立場－女性書寫與自我呈現

〈花開時節〉之作者楊千鶴出生於日治時期社會時局較安定的 1921 年（大正 10 年），由她 1993 年出版的長篇自傳《人生的三稜鏡》可得知更詳細的家庭背景與當時的創作心境。楊千鶴父親從事公職，母親盡其妻母職責管理家務的雙親背景，上有四人兄長三人姐妹的么女。雙親與手足之愛於一身的她擁有相當完整自初等公學校教育至高等女學校⁴⁰，以及最高學歷的「台北女子高等學院」⁴¹（俗稱「學院」）的教育歷程。學院是 1940 年代台灣唯一開設的高等女學校（中等教育）以上的女子高等教育機關，內設科目除了國語、修身等一般學科以外，如家政、藝術皆為正式課程，因此在當時也被稱作新娘子學校。在楊千後畢業後的 1940 年先是由他人介紹進入了台灣大學理農學部擔任了副教授助手，但因日台國別薪資落差，在無法忍受不平等對待下僅任職了一個月而辭職，辭職約一年後，她在友人介紹下認識當時《文藝台灣》⁴²編輯社的西川滿，並受任委託撰寫新聞記事。根據自傳，楊千鶴在閱讀當時一篇日人作家撰寫題名為〈芳蘭〉，其中內容譏諷台灣風俗文化中的「哭婆」在喪禮上嚎啕大哭的舉止，使楊千鶴感到相當反感，因此以自身喪母經驗時的體悟撰寫了〈哭婆〉一隨筆，文字上也蘊含了楊千鶴對抗日人冷眼看待台灣風俗文化的意圖，其隨筆受西川滿肯定並刊登在《文藝台灣》，此投稿事件後在西川滿的引介下，楊千鶴於 1941 年 6 月進入《台灣日日新報》擔任「家庭文化欄」的婦人記者，在歷史上以台灣首位女記者為名，而這也是她首次藉著文筆創作試圖為台灣傳統文化抵抗與呈現之事例。

而本論的研究對象〈花開時節〉的發表，並不是楊千鶴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的期間。她任職婦人記者的期間撰寫大量台灣家庭生活與文化相關的記事報導，在 1942 年 4 月因戰時體制新聞社版面縮減，楊千鶴辭職離去《台灣日日新報》維持了僅八個月的記者職業生涯，之後她受旁人鼓勵持續執筆並參加文壇活動，而〈花開時節〉於該年的 7 月 11 日發表於《台灣文學》，在楊千鶴的自傳提

⁴⁰楊千鶴於 1928 年入學「台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1934 年入學「台北進修高等女學校」1938 年入學「台北女子高等學院」。

⁴¹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設立於 1931 年，是日治時期殖民地臺灣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校址即現在的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該校常被戲稱「新娘學校」。

⁴²《文藝臺灣》創刊號於 1940 年 1 月 1 日由「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至 1944 年 1 月 1 日發行 7 卷 2 號終刊為止，共發行 38 號，為日本統治期台灣所發行之綜合文藝雜誌中最高壽者。

供的歷程推算下，與丈夫林嘉雄是在她女校三年級（約 1937 年）已有面識，實際上真正有交集是丈夫留學回台後，也是楊千鶴已離職記者工作並已發表〈花開時節〉之後的 1942 年的七月末，而雖然他在自傳提到進入報社任職期間有過一位名為 N 的初戀情人，但也是在報社任職期間得知 N 已訂婚而失戀，這位名為 N 的初戀情人在楊千鶴任職期間調職去高雄，最後自願赴任戰地記者離開台灣。因此，能推測〈花開時節〉是楊千鶴在未擁有戀愛或婚配對象的狀態下撰寫的。

在上述，楊千鶴除了任職《台灣日日新報》期間撰寫多篇家庭文化相關記事以外，她發表於《台灣文學》中的〈花開時節〉為唯一正式發表的短篇小說。恰巧，在楊千鶴任職記者的 1941 年 6 月至 1942 年 7 月正好也是台灣文學雜誌確立穩固且文學活動活潑的全盛時期，在楊千鶴自傳中提及⁴³如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和池田敏雄主編的《民俗台灣》、以及與西川滿的殖民主義對立由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等。楊千鶴擁有的文化資本⁴⁴與記者一職緣故，因此曾受邀參加文壇活動並與多社編輯以及文壇前輩有過交流，她以少數女性作者身分受台灣文壇寵愛，但除了受邀投稿並未主動投稿，〈花開時節〉也是受催促鼓勵下執筆的，在當時，父權體制的封建思想深根蒂固，且未婚的狀態的楊千鶴盡可能不與文學界相識的人有私交，對於文學創作抱持著消極狀態。

關於〈花開時節〉所刊登的《台灣文學》政治立場，據張文環〈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與池田敏雄發表的後記提及⁴⁵，財力與背景雄厚的西川滿多數日本人為中心創辦的《文藝台灣》，其內容多是以西川滿個人興趣取向顯現異國風情的作風，因此，使得本是《文藝台灣》編輯一員的張文環對西川滿的獨裁作風感到不滿，於 1941 年 5 月分裂後以台灣人為中心另創辦《台灣文學》。其中多是處理台灣風土民情為主，刊登作品偏向質樸純厚的寫實風格且具濃烈的鄉土色彩，在戰時體制當下《台灣文學》中的作品也反應出台灣人的立場，但在 1944 年受外部的《文藝台灣》打壓停刊。因如上《台灣文學》與楊千鶴的政治與創作立場，〈花開時節〉可描畫且反映出少女瑣碎心理及心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楊千鶴所擁有富裕的文化資本，她身為家中么女受父母與兄長寵愛，也顧念母親在世時交代的相夫教子才是女人真正幸福的想法，本打

⁴³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整理自頁 166-179。

⁴⁴此文化資本指楊千鶴的學歷與優渥的家庭環境。

⁴⁵張文環〈雜誌《台灣文學》の誕生〉、池田敏雄〈張文環「《台灣文學》の誕生」後記〉《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2 號，1979.8，頁 180-189、頁 169-179。

算赴日留學以女醫為目標，卻因戰情惡化赴日危險而轉移志向就讀當時台灣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機關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花開時節〉發表的 1942 年 7 月時局已經進入戰時體制殖民政府全面實施皇民化運動，封閉的社會風氣下女性往往不被允許外出工作在家等候待嫁，因此不用說就職，當時女性並沒有得到相對的公平創作機會。

根據呂明純⁴⁶（2000）針對楊千鶴於 1990 年出版的自傳《人生的三稜鏡》之其女性的自我呈現進行初步探討，呂明純提及，即便在 1922 年殖民政府確立了完整的女性教育系統，但女性教育仍然處於種族與性別的雙重壓迫的困境。且學院的創校宗旨致力於將女性塑造為合乎仕紳階級的新娘子，因此，即便接受教育制度洗禮女性，她們的自我被壓迫在成為獨當一面的賢妻良母，更不用說是中下階層的婦女，她們被壓迫的心境更加不可言喻，因此直至日治晚期的 30 年代晚期至 40 年代中期才見女性作家出現在文藝領域。而呂進一步以英國女性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名作《自己的房間》舉例，敘述女性自我與書寫之間的密切關係性。

物質環境會阻礙創作。

心智上的自由得靠物質方面的東西，而詩得靠心智上的自由。

如果你要寫小說或詩，你一定得有五百磅的進帳，同一間門有上鎖的房間。

藉由吳爾芙的言論，呂明純針對女性與創作之間提出一翻見解。即是，創作必須擁有相當的精神自由。然而即便女性受教育或文化思潮啟發精神層面的自我意識，在當時的雙重壓迫下往往沒有足夠的物質基礎或隱私來進行精神層面的創作，而物質與個人隱私則為影響女性創作的最大因素。因此，藉由上述對照楊千鶴創作〈花開時節〉歷程與背景，學歷使得她能掌握語言與書寫的能力，而創作當下是楊千鶴生平中尚未有異性干擾的時段，曾任職記者一職使他有機會接觸文藝創作。因此，當時作為未婚少女的楊千鶴她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而出類拔萃，並能藉著書寫方式來呈現未婚女性的自我與情感。另外，雖然自傳中並未明確提示有購買少女雜誌的行為，然而楊千鶴的成長環境有富裕接觸少女文化思潮的資源，以及她本身家境與喜愛閱讀的興趣，因此推測楊千鶴作為可能受少女文化洗禮的

⁴⁶呂明純〈日據時期女性作家之自我呈現—以辜顏碧霞、楊千鶴為主要討論〉《台灣新文學》，2000。

對象之一。

而〈花開時節〉最大的特色在於其自傳性質的描寫方式，楊千鶴以個人經歷投射於書寫，根據自傳，楊千鶴也表明並非是排斥婚姻價值或反對母職等主張，但她對於女性的自我發展抱持著相當的主見，但相較於 90 年所出版的自傳《人生的三稜鏡》中楊千鶴所回顧當年的自我意識，〈花開時節〉更能真實的反應出當時未婚女性的內心描寫，儘管楊千鶴是在消極的狀態下撰寫了〈花開時節〉，它仍然作為當時未婚女性珍貴的自我呈現作品之一。如同呂明純的研究中試論女性在作品中試圖呈現的自我，這項議題已是以往日治時期女性研究學者所關注的一環，而其中〈花開時節〉的少女角色是否以「友愛情誼」來呈現自身的少女自我意識，日本「少女」的形象塑造與〈花開時節〉其中的角色的自我有何關聯，筆者欲在本章來進行初步的連貫。

2-2 〈花開時節〉的少女書寫初步分析

如筆者在緒論提及，〈花開時節〉中的女性形象與日本同時代的「少女」形象所出現的特徵「感傷」與「友愛」相似，〈花開時節〉的原文當中出現了「乙女（おとめ）、娘（むすめ）」的稱呼與自稱。而原文內雖未使用「しょうじょ（少女）」一詞，在日語辭典廣辭苑中「少女」一詞的定義為「年少的孩子、姑娘」，因此日文中的「少女（しょうじょ/shojo）」「乙女（おとめ/otome）」「娘（むすめ/musume）」等本論僅視之為稱呼方式的落差之同意語，因本論其目的在於追討形象本質不在辭彙上的落差，其含意差別與稱呼方式亦不在本論的探討範疇內而不追究。

那麼，本論的少女泛指的是甚麼對象呢。以生物學的視點來看少女是介於思春期前期到思春期，對異性抱持興趣好感、生殖機能成熟的成長期的女性。而本論的軸心在於探討有關少女的形象層面，關於少女一詞的形象（Image），根據須川⁴⁷（2013）針對少女與近代媒體受容與演變成穩固的少女文化過程有一番的解釋，參考她彙整出「少女」的形象具備了如下。

那麼，我們對於普遍的「少女」抱持著如何的印象呢。「少女」具有純

⁴⁷須川亜紀子《少女と魔法—ガールヒーローはいかに受容されたのか》NNT，2013，頁 19。

粹、虛然、未成熟、純潔、感傷的、夢想的、容易受傷的特徵（脆弱）、多愁的、浪漫的等特質，這些特質和一去不復返（因此而具有稀有價值）的思春期的女性多樣形象結合為一體。⁴⁸

由以上須田論述中的多重的特性結合於思春期的女性，因此，「少女」一詞必非單一使用於年少女性的稱呼，也為因應社會環境與媒體結構而隨之發展而成的多重表象的形象體。而少女時光若遇結婚擇一去不復返的「一次特性」也造就了「少女」形象的稀有價值。

在以下，可透過須田所強調的「一次特性」的少女稀有價值重複窺看惠英在故事中呈現的生存姿態，如上章提及惠英處於女學生畢業後猶豫結婚，自我發展處於較為尷尬的「未完成」—並非出嫁的妻或母、並非是女學生的間隙姿態—。而這樣的少女生理上之特殊性，在進入婚姻成為眾人期待的賢妻良母而消逝。

因此如上述少女一詞所具備的特殊性，在〈花開時節〉中所出現的少女自稱，除了作為身分稱謂以外，更深層的以少女作為一種自我認同時，〈花開時節〉中的少女一詞便會具備不同意義。而我們也可以下文理解〈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形象相當的幽微曖昧，詞彙使用上交雜了多層次的意涵與背後自我認同所運作機能性，以及他人眼光與少女本身的自我意識。舉例引用文中音樂老師給的畢業贈言中所見的少女樣貌：「在優雅，美麗之中，少女應持有一縷凜然之風。⁴⁹」；以及惠英感慨少女時光流逝時舉引大迫倫子《娘時代》一書說道少女的曖昧心境：「那本書將我們這群未婚少女內心裡含糊不清、莫可名狀的煩惱寫出來，我們頗覺心有戚戚焉。⁵⁰」；在朱映離別少女時光的海邊旅途中惠英陳述的心境：「口裡咀嚼著吹入的風沙，心頭回味著稍縱即逝、虛無縹緲的少女時代，不是對那即將要出嫁而離去的友人所不滿、少女之間的一份友情，必然是抵擋不住結婚浪潮的沖擊，而一下子就動搖，真是脆弱的可憐，令人心裡難過。⁵¹」

如上述，少女一詞在故事脈絡中其具備了「曖昧不清」、「脆弱可憐」、「虛無

⁴⁸須川亜紀子《少女と魔法—ガールヒーローはいかに受容されたのか》，頁 21。では、われわれが抱く一般的な「少女」イメージとはどういうものであろうか？「少女」には純粹、儂さ、未成熟、純潔、感傷的、夢想的、被傷性（バルネラビリティ、傷付きやすさ）、ノスタルジー、ロマンスなど、ある特定の、一回性で取り返せない（ゆえに希少価値のある）思春期の女性の多様なイメージが結びつけられている。筆者譯。

⁴⁹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9。

⁵⁰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7。

⁵¹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9-90。

縹緲」等特殊性，由他者所觀看的少女形象以及惠英所認同的少女意識所顯露的特徵如何，以下筆者彙整出〈花開時節〉文中提起少女一詞時所出現的兩項具體特徵，其一特徵為呈現少女的曖昧生存姿態的「感傷情懷」，其二特徵為與少女的自我意識有密切關聯的「友愛情誼」。

2-2-1 〈花開時節〉中少女曖昧的生存姿態與「感傷情懷」

在〈花開時節〉中出現了六位少女以外的旁觀者，分別是畢業場景給女學生贈言的音樂老師、畢業後惠英三人去探望的醫生太太、以及畢業後待家時圍繞著相親一事惠英周遭所登場的父親、姑媽、姪子、二哥這四位家庭角色，藉由這六位人物觀看登場角色群的少女樣貌。而其中的音樂老師與二哥這兩人物對於惠英所散發出的少女形象特徵有類似的認知，如畢業前夕的場景音樂老師要同學們練習畢業歌之際，一位畢業即將要出嫁的林同學啜泣起時，音樂老師道出一番肺腑之言。內容如下。

畢業，目前對於你們各位來說，的確是令人感傷的事。然而，能夠沉浸於這般心境的妳們，正處於人生無比幸福之中。感懷少女時代而引出的所有淚水，就讓它盡情地流吧！能哭出的眼淚是珍貴的。（中略）今後妳們將面臨的前程必定與往日不同，每人都難免會遭遇到人生的一些困難或欣喜的事，請妳們記住，在悲傷中要拿出勇氣，而在得意時不要嬌恣忘形，須持以謙虛、戒慎的心而行（中略）妳們都是優秀的學生，這不是我在這裡故意誇獎妳們，妳們都是本性純樸、溫順的好女孩。希望妳們能永遠記住現在這樣的氣質，一直將它好好保持下去。⁵²

以上，音樂老師作為長者經驗之談，在畢業贈言中重複訴說著惠英這些少女們處於「沉浸感傷」的狀態，即將踏出校園的他們將遇上人生的難關及喜悅，段落中可見音樂老師稱讚少女們不諳世事的純樸溫順，突顯了消縱即逝的少女其形象生存時光的短暫而珍貴。

如旁觀者音樂老師所見，作中的少女群散發出的獨特「感傷情懷」代表著即將告別女學生的身分，離開學校生活的拘束面臨「現實」的考驗。而惠英本身也

⁵²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8-69。

在多處提到自己的心境，如下文同樣是故事開端的面臨畢業的場景。

我們雖然不是一群容易因此動容而多愁善感的羅曼蒂克少女，但由於即將要畢業了，心裡也泛起一縷淡淡的哀傷與感傷。⁵³

在女學生生活時，班上已有多數同學論及婚嫁，尚未體會親事上門的惠英交織著感傷的情感相當茫然，她提到如下。

要告別少女時代，開始跨入多彩的婚姻生活，幾多惜情？幾多憧憬？這些人的心中多麼複雜的感情！我真想一窺究竟，了解這些已訂婚的同學她們的內心世界。⁵⁴

結婚一詞區分了論及婚嫁的同學與惠英，然而由惠英的立場看來她對於婚姻也抱持著相當的憧憬與好奇，但尚未親身體會而感不安。而對婚後生活抱持好奇的惠英三人們一起探究了她們在學時就結婚的醫生太太家。作為結婚前輩的醫生太太對著尚未成為「大人」的她們如此說道。

「不管怎麼說，你們確是正處在如花似玉的錦繡年華呢！既沒有柴米油鹽的煩憂，也無需為公婆費心，逍遙自在，什麼問題都沒有」有時這位醫生太太也會嘆口氣，吐露出這樣的真心話。但是那時她也必定不忘記又再加上一句：「但是，未婚的妳們，還不能算是成年人哩。」⁵⁵

如同醫生太太所言結婚才能成為成年的「大人」，就這位醫生太太眼光看來，惠英她們這些尚未論及婚嫁的少女們處於「錦繡年華」而顯得稀有珍貴，如前文筆者提及惠英的生存姿態處於女學生後與結婚之前的間隙之中，而惠英他們這些尚未成為「大人」的少女們正處於自我發展的途中，但她大多數的同學面臨著女學生階段才剛結束，卻又立刻銜著接下階段結婚的開始。因此如上述彙整，貫穿通篇故事的「感傷情懷」，其實與少女處於間隙之中的曖昧生存姿態有密切的關係。

而當惠英實際遇上了婚事的現實來臨，她透過書信和二哥聯絡表示決定聽從姑媽之言順從結婚，而二哥替惠英回絕姑媽引介的親事時在信件上如此說道。

⁵³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6。

⁵⁴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7。

⁵⁵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9-80。

你的心意我十分明白，父親的心情我更是清楚。我倒不認為你的心境該歸諸於少女莫名的感傷。⁵⁶

如二哥眼光看來，惠英他們散露的少女氣質與「感傷情懷」密切的結合，而在該文脈中惠英碰上了婚事話題，在旁人都選擇結婚的環境中惠英也險要妥協接受，直至惠英親身經歷了婚事臨門，以及好友朱映決定結婚，如告別少女時代的名目與好友三人一同出遊八里，惠英又以感傷的情愫更進一步講述。

那天的淡水河，風浪洶湧。我倆走過的每步腳印，立即被陣陣強風吹得了無蹤跡。我們根本無法停下腳步。不知是因為被強風往前推送著，還是被自己內心不平靜的情感所驅策著。口裡咀嚼著吹入的風沙，心頭回味著稍縱即逝、虛無縹緲的少女時代，不是對那即將要出嫁而離去的友人所不滿、少女之間的一份友情，必然是抵擋不住結婚浪潮的沖擊，而一下子就動搖，真是脆弱的可憐，令人心裡難過。其實也不全是因為「友情」遭「結婚」所催拜。聽朋友說要結婚時，大家雖然口中說著對他祝福的話語。一絲寂寞卻也同時悄悄地潛入心底。坦白說，那就像是被丟下，遺留下來的一份落寞吧。難免會覺得這樣，大概是因為少女看著自己每日過著漫無目標的生活，總是會對那樣的自己感到可悲又可憐的。⁵⁷

該片段以強風和浪濤來隱喻結婚所帶來的衝擊與動搖，惠英在經歷友人陸續邁入婚姻的過程感到落差，另外在其他旁觀者姪子、姑媽、父親以及醫生太太皆抱持女大當嫁、少女的自我發展必然走向婚姻的壓迫眼光，如前章提起惠英因對抉擇結婚之事尚有疑慮與躊躇，險要答應婚事後試圖藉由就職來尋求自我發展之出路最終卻以自我迷失收場，種種的挫折下在八里海邊的場景中，惠英並藉著感傷的情愫來質疑與反思身為少女的時光以及自身存在價值。而如上述筆者探究惠英的少女生存姿態，故事整體的「感傷情懷」來自於結婚等違和感壓迫下，惠英抱持疑慮不斷進行反思，她處於未及結婚卻也失去女學身資格的不穩定狀態（未完成的大人）、尚未有明確自我發展目標的少女身分，並且處於自我辯證的拉合過程之中，因此「感傷情懷」的特徵充斥著少女的曖昧性、作為一種自我反思，同時也強調了少女與婚姻外界壓力下的磨合。

⁵⁶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6。

⁵⁷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9-90。

2-2-2 〈花開時節〉中少女的自我意識與「友愛情誼」

藉著上節筆者嘗試將〈花開時節〉中的「感傷情懷」特徵描寫進一步與惠英的曖昧生存姿態連貫，她的自我反思與疑慮也反映於結婚與友情這兩項情感對立的抉擇，而筆者嘗試將惠英的友情描寫作為焦點，再次初步連冠故事中少女之間的情感的脈絡轉變。惠英以莫洛亞的作品《結婚、友情、幸福》的內文向兩位好友設問關於少女間的友情價值，她在即將畢業的場景中提到下述內容。

「或許，始料未及的，結婚之日突然來臨。如果婚姻美滿、成功的話，至少在某段時期內，少女之間的友情將為結婚所扼殺。因為兩份同樣強烈的感情是很難雙全並立的。」雖然莫洛亞在書中是如此地給「友情」下了註解，而「妳認為呢？」⁵⁸

藉此我們能得知，惠英相當執著友情，並將友情視作與婚姻對立的情感，即便從學院畢業後惠英與兩位好友仍然以興趣⁵⁹—看電影、交換書刊—來延續過往的情誼。而在〈花開時節〉中惠英所舉引莫洛亞作品《結婚、友情、幸福》的「少女之間的友情將為結婚所扼殺。」的部分其實並不完全，在該片段後半莫洛亞針對友情與婚姻的對立繼續講述「相反的結婚若以失敗結束的話，能藉著坦承秘密再次發揮她們的友情的機能。⁶⁰」，根據莫洛亞原作中的提示可了解，此項與結婚對立的情感—友情—，可能存在著背後作用的機能。特別是直到好友的朱映決定結婚，在朱映的訂婚儀式上少女間的情誼有明顯的改變，內容如下。

另外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到不滿，當她在客廳裡被戴上了訂婚戒指之後，回到房裡來，那時我們覺得她的命運就此被決定了，而不禁感傷，卻看到她嘴角掛著微笑，眉宇間掩不住欣悅，確實是副喜不自禁的模樣。為什麼會是那樣的心情？真是令人費解！我想有一天該好好問問她。⁶¹

在朱映訂婚儀式中惠英出現了值得關注的情緒反應。戴戒指的儀式如同揮別少女身分正式踏入婚姻，惠英察覺了朱映的變化，並且觸發了與好友分別的「感

⁵⁸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0。

⁵⁹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7。朱映、翠苑與我的三人小組，我們在畢業後大約每個月相聚一次，一起去看看電影，或互相交換書刊來看，情形似乎與以前在學時差不多。只是彼此見面的機會要比原來所預期的少了很多，總覺得是一項缺憾。

⁶⁰ アンドレ・モロア《結婚、友情、幸福》。頁 113。筆者譯。もし反対に結婚が失敗に終わった場合には、打ち明け話を聞かされる女は再び彼女たちの役割を勤め始める。

⁶¹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3-84。

傷情懷」，而感到不得其解的惠英對朱映產生獨特的執念。另外，在惠英當初得知朱映答應婚事時也曾提到。

雖說我們三人都有容易受感動的共同點，但就「自我意識」的強度而言，朱映不像翠苑與我，她總是不常表達出自己的主張。⁶²

惠英認為輕易的踏入婚姻的想法過於單純總缺少了些甚麼，若妥協於婚姻是「自我意識不強烈」的想法，那反之，惠英所認同的自我意識是否是以與婚姻對立的友情來呈現呢。而在這個段落當中我們能夠理解，惠英所認定的自我意識與友情有相當的依存關係。為後續說明方便，因此筆者將惠英於故事當中所呈現的執著友情，即是將以友情與婚姻比較等行為稱呼為「友愛情懷」，而此「友愛情懷」的呈現特徵，背後意涵可能在於試圖維持並鞏固自身的自我意識。

如上，筆者嘗試歸類〈花開時節〉中的兩項少女形象特徵－「感傷情懷」「友愛特徵」並且進一步定義。在生理上，少女介於結婚成為妻母之前的曖昧時期。他們面臨了自我發展的抉擇，但在這段猶豫時期會際遇周遭婚事話題，而惠英她察覺自身並未擁有明確的生存姿態，周遭紛紛將她指引向「結婚」的環境之中，進而呈現在文脈上看到的「感傷情懷」特徵之上；並且，惠英嘗試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反映於「友愛情懷」行為之上。

2-3 1921 年至 1942 年的台灣社會背景與〈花開時節〉

在上節藉著〈花開時節〉中呈現的少女形象特徵推論下，筆者嘗試定義作品中的少女形象具備了的「感傷情懷」與「友愛情誼」的特徵，而這兩項形象呈現之特徵也維持在個既曖昧又矛盾的狀態，即是透過「感傷情懷」反思自我價值進行自我辯證，另一方面卻又透過「友愛情誼」嘗試鞏固自我意識的狀態，如此的曖昧與矛盾這也作為惠英的少女的自我認同的特徵。而這兩項少女特徵圍繞著「結婚」一話題進展，因此在本節，筆者欲關注影響少女自我發展的婚姻制度與女子教育，進一步解析〈花開時節〉中的這兩項少女特徵背後蘊含的社會背景。而在本節筆者參照作者楊千鶴出生的 1921 年至創作〈花開時節〉的 1942 年作為考察背景之年代設定，關於女性在該時代的處境與立場呂明純⁶³（2007）的研究

⁶²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1-82。

⁶³ 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國立編譯館，2007。

考察並且總整統合了台灣傳統觀念與女子教育的起源。

根據呂明純探討向來受研究領域遺忘的日治時期女性作家作品，分析其作品中女性角色所呈現的女性自我與作為女性文學之涵義，從女性的自我心理發展、社會性別秩序、島內時代氣氛、女性生命經驗等不同層面來理解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文學表現，並且深入考察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在殖民政權與父權秩序下的生活處境。在透過呂明純的研究為進一步解析〈花開時節〉中的少女自我建構的社會背景提供相當具體的參考資料。

當我們在閱讀〈花開時節〉時能察覺背景的線索，比方如貫穿全文的女學教育背景、貫穿整篇故事的結婚壓力、又如朱映訂婚時她的親戚清點聘禮的場景。同時惠英在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畢業後至結局一直處於待家的狀態，心境上產生的各種不安徬徨也對應了惠英所呈現的「感傷情懷」，因此在論〈花開時節〉其背後的社會背景，筆者欲以傳統婚嫁觀念層面與女子教育層面雙方切入探討，進一步理解這些外界壓力⁶⁴是如何影響惠英的自我發展。

當我們在閱讀〈花開時節〉時，作中的少女角色可說是受婚事話題包圍的狀態下，如以下筆者引用的內文可見，惠英他的自我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萌發了尋求自我意識依靠的念頭，也就是一度就職的突破行為，並且在經歷好友朱映的結婚之後決定離職，結局處於曖昧不安定的狀態。可參考下文。

在學生時代裡，一年的時光似乎是相當漫長。然而，畢了業之後，閒著呆在家裡過著輕鬆的日子，卻覺得才一眨眼功夫，一年就過了。聽到學校又送出新的一批畢業生，不由得使我們這些畢業以來一直是生活漫無目標的人，心理突然著急起來。概念上，開始覺得該考慮結婚了。要不然，自己是否會落為「碩果僅存」最後的一個？這樣的焦慮很快地就潛入了心頭。

幾次有人來家裡提親，但父親沒問我的意思之前，就全打消了。在一個刮著強風的夏日夜晚，我突然心血來潮，翻開畢業一年來所寫的日記看。上面盡是寫著何時與朋友到某地方郊遊啦，看了什麼有趣的電影啦，不被家人重視而傷心落淚等等。可說是連篇長句，別無其他。自從踏出了校門，這一年內，我真是沒什麼長進，毫無收穫可言。縱然我不曾特別打算要去獲得什麼，但也不無感到心有未足的一份空虛。為了鞭策自己，給懶散、缺乏幹勁

⁶⁴ 指故事背景中的傳統女大當嫁的觀念與女子教育中主張的賢妻良母主義概念。

的自己注入一股新活力，於是我想到要出去找工作做。(中略)

朱映的親戚——大概是嬸嬸吧，正幫忙著清點聘禮的數量，她那機械性、不帶任何情感的聲音，相當大而刺耳。隨著一層層疊高了的物品，朱映的人也好像是一節節被取走了，我不禁住有這樣的一種錯覺。(中略)朱映她本人，倒是沒什麼特別表情地與我們一起望著一箱箱的禮餅盒漸漸疊積如山。我對這樣的她有些不滿。另外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到不滿。當她在客廳裡被戴上了訂婚戒指之後，回到房裡來，那時我們覺得她的命運就此被決定了，而不禁感傷，卻看到她嘴角掛著微笑，眉宇間掩不住欣悅，確實是一副喜不自禁的模樣。為什麼會是那樣的心情？真令人費解！我想有一天該好好問問她。

至於我的工作，當初我決定要開始上班時，意志是那麼堅定，是懷著滿腔熱血而去的。事實上我也因之得了一些磨練，使我有長進。但是半年多以後，我又覺得透不過氣來，而把工作辭掉了。這並不是因為年輕姑娘做事不能專一，或態度散漫，其實是因為有種種的情況使然。然而，我就職上班之事，畢竟是如同女性一般的「暫時就業」那樣的結局，而沒成為終身從事的志業。⁶⁵

如上內文引用，我們可觀察到除了她的姑姑帶來了婚事話題以外，惠英處於在家無所事事，嘗試就職的卻未得到自我發展歸屬的曖昧狀態，而在朱映的訂婚上，當朱映的親戚清點著聘禮時，惠英彷彿察覺了婚姻會剝奪女性的自我。因此在傳統婚嫁層面部分，筆者由惠英在家中的地位與朱映訂婚場景上的聘禮文化作為切入點理解，而後更進一步了解隨著日治時期女性就學環境的改變為女性帶來的影響與變化。

2-3-1 惠英的家庭地位、朱映訂婚場景的聘禮文化

首先筆者欲先將焦點凝聚在主宰女性一生的婚姻制度來釐清婚姻對女性價值定位，藉呂明純的研究探討可理解有關台灣社會中婦女的婚姻觀念。呂引用楊翠研究⁶⁶提及，日治初期的台灣，延續清代傳統的漢儒社會背景中所講究的「倫

⁶⁵ 〈花開時節〉，頁 80、83-84。

⁶⁶ 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頁 12。二次引用提

理關係」與「男尊女卑」，在性別秩序下女性在社會中落為最下階層地位。且台灣的傳統婚姻觀念深受其中婚姻制度的「房」的概念（兒子相對於父親的身分）左右，「房」，作為家庭的單位延續父系家族的祖先牌位，但女性並不具備「房」的社會身分來延續子嗣，她們只能藉由婚姻來納入父家的「房」與家族系統。呂進一步引用楊翠（1993）研究，「兒子一出生極具有「房份」，日後將留名祖譜，由後代子孫奉待，而女兒則否，她只有透過出嫁，寫進另一個父系家族的「公媽牌」中，才能享有清香膜拜。（楊翠：1993：38）」，因此唯有經由婚姻女性在她的此生才有位置，在來生也才有歸宿。另外呂依據卓意雯（1993）研究提及，清代台灣開墾初期由於男性人數大過於女性的關係，而造成了「女鮮選婿而婚姻論財」的社會風氣，導致了繁衍具有實質利益交易性的聘金文化。因此，聘金文化表面的交易性質對女性一生更具深刻的影響，它使一般民間習慣性以金錢論女性身價，聘金所彰顯的意義可能在於女方養育家庭的經濟補償，也能變質為買斷女性日後的勞動力，又如呂明純所言。「在這種重視經濟效益的思考邏輯之下，她總結清代台地的婚姻制度，認為清代儒漢社會中台灣的婚姻實際上型同交易，女性也因此而處於被客體化、物化之地位，形同待價而沽的商品。」⁶⁷。

以上，如此的背景即使到了日治以後，婚姻的買賣性並沒有太積極的改變，總督府為統治上的便利，以及政府本身並未有強烈的意圖想改革台灣傳統結構，但為避免激起民族對立，以「台地舊慣」「現行之例」作為行事事項判決依據，因此殖民政府並未以嚴格的法律來廢止這種如商品買賣般，傷害女性價值的聘金制度⁶⁸。呂根據沈靜萍（2001）的研究提及，當局政府將聘金文化造就的婚姻買賣性視作日本內地的「結納儀式」，將此陋習的交易性禮物化，去金錢化，僅是削弱作為女性身價之性質與可能，並非根本性的否定如此的陋習，因此民間社會

示：漢人的儒教，是一個含涉內容極深極廣的文化體系，它可出可入，可外可內，既有最高的文化價值，同時也是官僚體系的一環，而其中最重要的運作機制便是禮治秩序。在這 interpersonal 網路中，講的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的「倫理關係」，而「男尊女卑」的兩性關係，正是此一人倫規範中相當重要的一種分類秩序。清末台灣漢人的社會制度，便是圍繞著這套儒家文化秩序在運轉。儒家「男尊女卑」的人倫關係，是奠基於數千年前的古老傳統。從先秦禮典中大量「陽貴陰賤」、「男尊女卑」、「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等倫理論述看來，婦女的卑賤性透過經典被正當化，「男尊女卑」因此成為一套由內而外、潛移默化的儒家傳統價值觀。清末的台灣婦女，既生存在儒漢文化的分類秩序中，自然動靜出入亦皆有其定規。（楊翠：1993：33-4）

⁶⁷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頁 12-17。以上為（一）傳統儒漢社會中婦女的婚姻，之整理。

⁶⁸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頁 25。

對聘金文化仍有根深蒂固的思想與慣行⁶⁹。另外，根深蒂固的聘金文化至日治時期也因當局政府重視國家主義和家庭制度等統治上的便利並未有太多鬆動，而統治國日本本身即是極其重視倫理秩序強調國家主義的父權社會，進入日治末期為讓離開家庭上戰場的皇軍（夫）為國奉獻，總督府動員婦女的重點，即是強化婦女犧牲奉獻的精神並且作為家庭的後盾，其與儒漢社會的婦德傳統規範目標相同⁷⁰。

以上，筆者透過呂明純之研究總整〈花開時節〉中的婚姻制度與聘禮文化之背景，追述婚姻制度和聘禮文化的起源時我們可理解，女性因道德倫理等世俗眼光的拘束下由清代開始一直處於社會與性別最低的階級地位，再來，清代延續的儒漢社會的「房」的傳統觀念使得女性被迫束縛於婚姻的物化交易性質之中，而進入日治時期卻因總督府的「台地舊慣」等消極政權，民間的規範力量在日治年間依然深深支配台灣女性，綜合以上這些背景形成了妨礙女性的自我發展的外界壓力，以上的社會背景呈現於〈花開時節〉中，貫穿通篇故事的婚嫁話題，以致女性必然婚嫁的傳統思維使然下，惠英處於畢業後僅能待家的現況，而實際上惠英也察覺了朱映的婚禮中，聘禮的習俗的交易性質如同剝奪女性自我，在後續論述，筆者將以上論述的傳統婚嫁觀念視為少女自我發展的外界壓力之一。

2-3-2 〈花開時節〉的女子教育背景—自我發展由家庭空間轉移至女學校環境

透過上述探討中，我們能理解婚姻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影響，婚姻如同女性價值的目標，唯有藉著婚姻的媒介才能受社會認可。而進一步針對惠英在故事中待家的現況來看，事實上，女性是被拘束於家庭的勞動空間，在傳統儒漢社會中，女性是不允許外出等行動自由因此社會參與相對有限，他們生活的一切如人際社交網路、宗教信仰或禮教規範，也都是以家庭生活空間為中心成形。其原因在於女性並未擁有透過文字的人際社交網路，即便在日治前已存在傳統女性書房教育，受灌輸的知識如《三字經》《女論語》《孝經》等規範女性溫順貞節，灌輸三從四德的女教思想，規範女性遵從合乎賢妻良母的角色，而並非現代知識的傳授。因

⁶⁹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頁 27。二次引用（沈靜萍：2001：57-60）。

⁷⁰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以上總整於二、沿襲舊慣的日據時期，頁 24-30。

此漢儒社會當中的傳統婦女深受禮教束縛，幾無獨立人格可言⁷¹。而直至日治時期開始女學校的開辦，「求學」使女性擁有婚前合法長期離家外宿的可能性，對女性的自我成長有新的拓展。

根據洪郁如⁷²（2001）研究提及，至 1895 年清國割台日本政府統治後台灣才有系統的推行完整的新式女子教育，但日治年間仍然存在台日民族間的差別對待，總督府與其說是將心力花費在創辦女學教育，更強烈的目的仍然在於同化教育的層面，因此在日治初期相當重視國語教育，並藉由大量的傳統手藝課程來吸引女學童的入學率。而在 1913 至 1915 年間島內的教育內容因無法滿足現況的事態壓力下，於 1919 年頒佈了第一次「台灣教育令期」進行課程修正減少技藝學科並且增加普通學科，重新確立了女子教育制度。而教育內容宗旨以「培養國民性格」進行改革，並以「婦德培養」為目的。對照日本內地的女子教育目標，其主要是培養出嫻順淑雅又勤勉的「大和撫子」，同是父系社會的日本國內的女子教育觀及是種結合「國家主義」與「賢妻良母觀」的教育思想，其與台灣本島的傳統規範要求女性為父系至上社會體制的犧牲奉獻精神相似。並且，日本內地的女子教育是以養成以家國為先、犧牲奉獻的女性，因此進一步強化了女性在為「家庭國家」輔助的位置，日本國內導入了家政體系的新式教育，而這樣的教育觀念也相當適用於殖民地台灣，雖然也必須配合同化政策，因此教育主要目的在於「精通日語」與「確立日本國民性格」等課綱，但與培養賢淑婦德並無衝突且可並行進展。而到了皇民化時期，國家政府更藉由塑造皇國女性為由，以經營家事穩固家庭名目作為「國民」一員的肯定，進一步拓展國民思想，因此在台灣的女子教育目標，是以精通日語、培養本國民性格、涵養婦德等「同化教育與家庭教育」的相關知識結合⁷³，這點是後續分析探討時必須秉持的重點。

然而即便如此，女子教育的開辦仍然是有助於過往拘束於家庭空間的女性自我發展，在傳統規範中女性不允許家庭活動以外的名分外出，因此，求學製造了合理的機會使未婚女性能離家接觸同齡女子，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子相反於重統社會婦女的保守，在求學期間與同性異性接觸的過程中逐漸鬆動了傳統「男女授受不清」觀念⁷⁴，在求學期間，女性能夠短暫得以身體與心靈上的自由與自我發展

⁷¹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頁 20-24 整理。

⁷²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勁草書房，2001，頁 129-132。

⁷³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頁 34-38。

⁷⁴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頁 38-40。

的可能，突破單純的家庭關係和親屬關係的結構，在女學校環境的社交圈並擁有識字機會，她們能夠藉由外來思想理解與比較自我感受。不過，有關他者（男性）眼光的拘束，根據洪郁如⁷⁵（2000）的研究如下提及。

男性士紳心目中的新女性形象，絕大多數所指涉的，是同為上層階級的台灣女性。她們被期盼扮演一種新的「賢內助」角色，那就是以受教育所得知近代知識協助男性，在士紳的家庭與事業兩方面皆能有所貢獻。

以及實際上，女性在參加社會運動所受的種種限制，社會眼光對女性的期待仍然在於待家，即便外界與社會潮流提倡婦女的性別階級解放，女性仍是歸咎傳統婦德，始終侷限於賢妻良母形象圍籬下的思想。

透過以上針對社會背景的考察，也可進一步對應於〈花開時節〉中惠英的待家處境，嘗試就職卻又退縮回家庭環境之中，而惠英雖然得到了受新式教育的機會，但其自我仍然無法得以自由伸張發展，仍然受拘束成為符合男性仕紳期待的輔助妻職角色。然而女子教育確實提供當時代的女性萌發自我意識的環境，卻也因同化政策與國家教育以及世俗眼光等規範所受壓抑拘束，不過在思想方面惠英的身分不同以往的是，她可夠藉由閱讀書物開拓思想，如前述曾提及，〈花開時節〉中的少女角色擁有閱讀的興趣，以及實際上該時代的女學生能夠透過學校圖書館或是舊書攤購買課外的雜誌書籍⁷⁶，舉例如《少女俱樂部》《主婦之友》《少女之友》等，以及近代文學作家如夏目漱石、吉屋信子等著作，在實際上，她們在文學思潮下所受的影響，筆者將於下節進行更進一步說明。

2-4 日本少女文化思潮影響

根據洪郁如（2001）提示，在 1920 年後出生的就學女子，她們在完善的女學校體制環境下能夠合理外出，並且得以短暫的身體與心靈自我的自主權⁷⁷，同時，就學率的上升伴隨學齡女性的生活圈範圍擴大，形成了家庭以外的交際關係，除了這些外在因素的改變以外，教育普及的環境下女性的內涵在學習近代知識技能，逐漸具備了國語能力，他們能藉由文字追求知識，並有助於人緣交際。而〈花

⁷⁵洪郁如〈日本統治初期士紳階層女性觀之轉變〉《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新自然主義，2000，頁 281。

⁷⁶山本礼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頁 139。⑤讀書・習い事。

⁷⁷洪郁如《近代台湾女性史》，頁 125。

開時節〉作者楊千鶴所出生的 1920 年代，正處於民族自決風潮盛行的第一波女性主義風潮當中，在追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以及獲得教育、參政、經濟獨立等各方面主張婦權的背景下，當時台灣與中國斷絕往來的狀態下，絕大部份接受了日本的平面媒體影響，具體來說，如《不如歸》等戀愛觀念小說書籍引入台灣後，開啟了台灣社會的戀愛結婚與婚姻自主等新式觀念，因此，透過識字技能與閱讀習慣女性能擁有受啟蒙的機會⁷⁸。而如前述少女雜誌作為當時女學生間熱門的課外讀物之一，另外，〈花開時期〉作品中所出現的《娘時代》也為台北高等學校讀書傾向調查文學類的第二名。若假設〈花開時節〉中的少女角色的形塑與這些書籍中的思潮觀念有具體的關聯，筆者欲在本節詳細論述可能影響惠英的少女自我認同—其背後的少女文化之思潮影響。

2-4-1 少女文化發展簡史

如前文筆者論述，少女一詞在〈花開時節〉可能作為一種性別身分認同，嘗試對照作者楊千鶴的出生以及經歷求學的時期，正好是日本少女文化發展確立後的穩固時期，根據須川⁷⁹（2013），在同時代的歐美國家並無少女小說的類似流派出現，因此少女小說的文化可說是近代日本獨自發展而成。而所謂的少女小說，即是刊載於少女雜誌以少女為群體的小說類別，在日本的「少女」研究領域中，最初由川村⁸⁰（1993）提出經由少女雜誌媒體與讀者少女之間產生的「乙女共同體」概念與少女文化的起源探討，以及本田⁸¹（2012）探究女學生的形象誕生與日本雜誌媒體互相作用下凝聚為「少女」形象的過程，並提出「少女幻想共同體」之概念，另外今田⁸²（2007）則是探討《少女之友》中的少女形象變化與歷史變遷，渡部⁸³（2007）考究日本女子教育中影響少女的各項身心規範，在日本學者的研究堆積下已有多種「少女」研究的切入點，其中久米詳細的論述了少女文化的興起以及少女小說所給予閱讀少女的機能作用，因此，在此小節部分筆者欲引用久米的研究探討日本少女小說盛行的背景以及少女小說的具體特徵，並於後節

⁷⁸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頁 186。

⁷⁹須川亜紀子《少女と魔法—ガールヒーローはいかに受容されたのか》，頁 18。

⁸⁰川村邦光《オトメの祈り—近代女性イメージの誕生》，紀伊國屋書店，1993。

⁸¹本田和子《女学生の系譜：彩色される明治・増補版》。

⁸²今田絵里香《「少女」の社会史》。

⁸³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

與〈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形象對照進行論述。

久米（2013）的研究橫跨明治三十年代（1900年代）至戰後為止，關於日本性別與家庭秩序中少女的地位，與台灣在「房」的傳統概念中，未婚女性的社會地位皆處於最下層的處境相似⁸⁴。「少女」充斥了曖昧的特殊性，針對「少女」本身的特質，筆者待後續會進一步探討說明。首先，參考久米的研究追溯了日本平面媒體中「少女」一詞彙的誕生，內容如下。

「少女」一詞在1900前後為止廣泛被視作「年輕女性」居多，與島崎藤村中的「若菜集」的「處女」一詞相同，也意指戀愛與結婚為對象的妙齡女性。田山花代在轉為自然主義作家之前曾寫過多部以青年與年輕女孩為對象的戀愛主題浪漫小說，小說《少女病》並稱呼這樣的戀愛小說為「少女小說」。隨著雜誌媒體意識女子教育詞彙使用方式逐漸滲透，之後「少女」一詞轉變為低年齡化主要用來稱呼十歲中半的女孩。因此「少女小說」變化為以年少的女性讀者為對象閱讀的故事總稱，但也因年齡別與領域別細分化的緣故，對於認同該領域的自主性有許多不安定的因素。另外這個領域並非是回應讀者的要求而開始，在出發期它本是作為規範的強化裝置發揮機能。⁸⁵

承接上述內文，根據久米的論述提及，少女一詞最初是明治初期以年少者為

⁸⁴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頁20。「近代日本中の性別秩序中女性雖然也是背負嚴厲了義務，而特別是少女是在成人男性／女性／少年／少女」的排列順序的最下地位，是受強力壓迫的存在。「少女文化」外表雖是華麗又甘甜的，但我們不能忘記她們是被壓迫於最下層的文化。」近代日本のジェンダーの秩序は、成人女性にも厳しい課したが、ことに少女は成人男性／女性／少年／少女という序列の最下位に位置し、強い抑圧を受ける存在だった。「少女文化」は一見華やかで甘美だが、最下層の者に与えられた文化であることを忘却するべきではない。筆者譯。

⁸⁵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頁22。「少女」という語は1900年前後（明治三十年代前半頃）までは広く「若い女性」を意味することが多く、島崎藤村『若菜集』（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の「処女（おとめ）」と同様に、恋愛や結婚の対象となる妙齡の女性も指したからである。田山花袋は自然主義作家に転じる前、青年と若い娘の対象の恋をテーマとした浪漫の小説を何作も書いたが、小説「少女病」（1907年〔明治四十年〕）ではそうした恋愛小説を「少女小説」と呼んでる。その後「少女」の語が、主に十代半ば頃までの年齢の娘の示すように低年齢化したのは、女子教育を意識した雑誌メディアの使用方法が浸透したためと考える。そのようにして「少女小説」は年少の女性読者を対象にした物語の総称に変更されていったのだが、年齢別、ジェンダー別の細分化されたジャンルであるために、領域の自立性を認めるには不安定な要素が多かったと思われる。また必ずしも読者の要求に応じて始まったわけではなく、出発期には特に規範の強化装置としての役割を強く担っていた。筆者譯。

對象的雜誌《少年園》中分離出少女的投稿欄而誕生，在 1895 年「少女」一詞早已普遍受使用。它作為泛指年少女性的群體稱呼方式，與女子教育體制互相影響下帶起了少女雜誌中的少女小說的盛行，少女一詞不只作為一項稱呼，也做為規範裝置作用，在歷史背景發展下被逐漸賦予不同的意涵與特色。

而「少年」與「少女」這兩項看似對等的形象來看，「少女」並未具有對稱的區別與規範，如同教育體制與雜誌媒體都是由「年少男性：少年」分裂而出的「年少女性：少女」，「少女」本身也蘊含了劣等於「少年」與「二等國民」的偏差意味存在。而在 1899 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女學校令後也促成了少女文化的盛行，若論少女雜誌中的「少女」形象蘊含運作的規範與機能，其與女子教育相同意圖貫徹了性別秩序與遵照賢妻良母主義之行為規範與理念，並進一步塑造出所謂的「少女」形象⁸⁶，其中筆者詳細說明後兩項「少女」形象的特徵與具有強制性異性愛制度補足機制的部份進行相關介紹。

2-4-2 少女小說的特徵

2-4-2-1 被愛姿態的「少女」

關於在少女雜誌中的「少女」形象，久米探討了少女雜誌中所呈現的〈少女特徵、少女形象 / 少女らしさ〉與身為少女的情愛表現的立場，久米舉例了「少女」的「愛」的觀念是由巖谷小波作品〈愛之光〉與其編集主要幹部沼田笠峰在〈少女教室〉〈少女の世界〉中的論述派生而來。首先根據久米對巖谷的概念提出論述說道。

也就是，並不是遵從父母或世間的受動服從姿態，而是追求藉著自己的「愛」來維護自己「身為女人」之事。（中略）——也就是巧妙的操作理論讓少女「自主的選擇自身的女性特徵」。⁸⁷

即是，小波所提倡的「少女」身為女性所以必須具備富裕的愛與情感（愛を

⁸⁶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以上內容整理自頁 26。

⁸⁷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P166。筆者譯。すなわち、親や世間に従うという受動的な服従姿勢ではなく、自己の「愛」によって「女である」ことを守るよう求めたのである。「女らしく」という行動原則は不変でありながら、それを支える原理に主体的「愛」を置く—そこに〈自主的に選択した女らしさ〉へと少女を追い込む巧妙な理論操作を見ることもできるだろう。

持つこと)，但久米並針對之後笠峰所提出的「被愛」立場加上補充。

相較於小波主張為他人的「愛」論述，笠峰更重視受他人「被愛」的立場，因此這裡我們必須關注「可愛。令人疼愛」＝「少女性」的行為。「外表也看起來讓人感到可愛」便成為少女的條件。在這個階段能夠認同新的〈應有的少女像〉形成。少女像由「溫順遵從道理」（三輪田真佐子）、「高潔貞淑」（山脇房子）、「不忘本分」（巖谷小波）發展成以〈可愛〉〈純真・純潔〉為特質的基礎。同樣是被受〈少女形象〉的規範，雖非嚴厲的監視看似寬容但卻是非常周到的框架。這樣的旁人眼光也可以將他們抑制成「服從聽話」，要求她們不需要著急地長大維持少女的樣貌。其實也是為了促使少女快點習得未來成為賢妻良母的必須知識與技術，而讚揚少女時期的〈純真・純潔〉，這樣的方式可以說是讓少女的價值基準從必需盡責的身分轉變為受愛戴呵護的身分。另外，這份「可愛」的劃時代規範不需將少女節制束縛於舊式型態，同時也能允許他們維持女學生像樣的外表打扮。⁸⁸

在這邊久米提到的（あいらしく）也能被譯作「令人疼愛」，是被受他人眼光的被動姿態，比起過往遵從道理或一味的要求少女維持自身的「貞操純潔」這種刻板的教化方式，以「少女」的框架包裝的規範更顯得方便受容消化，「少女」在少女雜誌的渲染下已不只作為稱謂方式，在這階段已經逐漸朝一種自我認同的形象凝聚，「少女」作為「深厚愛情」的年少女性，以及他人眼光下的「被受疼愛、令人疼愛」的形象，在重視他人目光的過程，少女的外觀打扮也發展為不同的觀點，久米繼續如下說道。

⁸⁸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頁 167-168。筆者譯。小波が他者のための「愛」を説いたのに対し、笠峰は他者から〈愛される〉ことを重視し、そのために「愛らしく」＝「少女らしく」振る舞うよう注意する。「外からも愛らしく見える」ことが少女の条件となったのである。ここに新たな〈あるべき少女像〉の形成を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少女らしさは、(中略)「温和にして道理に従うこと」(三輪田真佐子)、「高潔貞淑」(山脇房子)、「分を忘れない」こと(巖谷小波)から、〈愛らしさ〉〈あどけなさ〉を基調にしたものに切り替わった。同じく課せられた〈少女らしさ〉だが、厳しい監視ではなく一見緩やかなそれでいて周到的枠を当ては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の視線は「大人らしくしたがる」ことを抑制し、成長を急がずに少女のままにいるよう要請する。これまではやがて良妻賢母となるために必要な知識・技術をできるだけ早く身につけるよう諭されていたが、少女時代の〈あどけなさ〉が賞揚されることになり、勤めを果たすべき者から愛玩される者へと、少女の価値基準が変容したといえるだろう。またこの「愛らしさ」という画期的な規範は、少女を旧態依然の節制に縛り付けることなく、女学生らしいおしゃれも許容する。

若以過往的婦德自重來思考的話，少女們花心思於引人注目的緞帶和褲袴裝扮已經觸碰了奢華的禁忌。但入學後暴露於人前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另外，時代已經進展到為了實際成為良妻時也必須注重男性審美的眼光。(中略)即使是提倡賢妻良母主義的時代中，她們作為〈被受注視的存在〉而難以否定少女的美觀價值，因此也必須認同少女的「可愛」是成為良妻的資質。也就是家父長制度下的由男性統治分配的女子不單只是〈愛〉，也必須作為〈被愛〉〈被挑選〉的對象。少女雜誌能夠教導如何〈被愛〉並提供各種角度的學習場域。⁸⁹

因此「少女」的內在與外在都被視作未來婚姻成為賢妻良母被挑選的條件，以「令人疼愛・愛らしい」之名的「少女」規範也使她們的外觀打扮合理化並增強內外的少女特徵，並能透過閱讀少女雜誌的內容習得如何讓自己能夠「被愛」「令人疼愛」進一步內化，並認同自身的「少女」自我認同，少女雜誌作為「少女」自我認同的重要媒介與學習場域，並且在遵守規範的同時自以往的舊有規範解放，也同時受他人眼光影響學習提升自我價值（內涵與外觀打扮）⁹⁰。

2-4-2-2 「友愛情誼」－強制性異性愛制度的補足

然而在上節論述，久米探討明治末期日本的「少女」形象機能規範，該規範是遵從賢妻良母主義之理念，並且能讓女性讀者透過少女雜誌的場域進一步的吸收知識習得「少女」的應有姿態。少女小說的故事內容用來呈現「少女」的性別樣貌，但其中的所教導的「被愛」的姿態仍然是與男性不對等的，少女小說的故事中也顧及了少女在現實中仍然不能與異性有直接的接觸，因而進一步發展為日後的少女友愛小說的故事型態。針對友愛小說的故事型態起源，根據久米的論述

⁸⁹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頁 171-172。筆者譯。従来の婦徳尊重から考えれば、人目を気にしてリボンや袴の着こなしに苦心する少女は驕奢（きょうしゃ）の禁忌に触れている。しかし通学時に人目に晒される生活が一般化し、また実際に良妻となるためには、男性からの審美的なまなざしに耐えうることも必要な時代になってきた。(中略)良妻賢母主義が唱えられる時代であっても、〈見られる存在〉としての少女の美的価値を否定することは難しくなり、少女の「愛らしさ」は良妻になる資質として認め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すなわち家父長制度下で男性によって統制分配される女子は〈愛する〉だけでなく、客体として〈愛され〉〈選ば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少女雑誌はどのようにすれば〈愛される〉のかを、さまざまな角度から教える場ともなった。

⁹⁰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頁 172-173。

如下。

事實上，當時的少女雜誌中的圖像和故事內容，若說登場的家庭與親族以外的男性只有老人跟小孩並不過言，少女雜誌強硬貫徹了排除異性愛的姿態。即便少女未來的規範目標是成為賢妻良母，其中也不給予少女們分辨理想異性與相遇的方法。⁹¹

在當時沒有家長允許就無法結婚的統治環境下，少女小說中出現的異性愛排除的現象，不外乎是用來操作不讓少女有戀愛的機會，這也是遵守了賢妻良母主義教育與性別社會秩序。因此少女雜誌作為教導少女們「應有的少女樣貌」的場域，卻是以少女之間的友愛故事來達到教導與戀愛配對的機會。所以在明治後期發展出的少女友愛小說，是藉著同性間耽美的小說內容來保持「少女」的純潔和魅力，另外，同性間的耽美情感與羈絆也能作為未來異性戀的預備練習⁹²，因此我們必須理解，「少女」之間的「友愛情誼」其具備了將「少女」拘束於「少女」應有樣貌、「少女」之間的社交環境、且自我發展僅設定於賢妻良母的閉鎖性質特徵。

2-4-3 「少女」與〈花開時節〉

以上，在筆者說明少女友愛小說中的「少女」特徵，日本的少女文化的興起，與少女本身的性別階級與次於男性的劣等性有連帶的關聯，而少女雜誌中作為形象體的「少女」，進一步也作為「少女」基準的規範裝置，在閱讀的過程中逐漸內化入少女本身，建立少女的意識形態。以〈花開時節〉中惠英等少女群作為消費群體假設，她們在接受這樣的文化思潮後，也可能逐漸萌發了少女的自我意識。而「少女」本身作為一種被愛的姿態立場，作為感化情感也同時達到了要求純潔與貞操的運作機能，這也反應了少女本身的社會與性別的地位，她們在未來必須成為賢妻良母，並藉由少女間的「友愛情誼」進一步加深了「少女」的閉鎖性，

⁹¹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頁 178-179。筆者譯。実は、当時少女雑誌の図版や物語には家族・親族以外の男性は老人と幼児しか出てこない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く、強固な異性愛排除の姿勢を貫いていた。良妻賢母という目標が課せられながら、少女たちに理想的な異性を見分け方も出会い方法も示され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⁹²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頁 186-188。

將她們封閉於「少女」應有的姿態，以上這些特徵同時反應於〈花開時節〉的惠英的人物特徵之上，在後續論述我們必須理解，惠英在故事中的呈現的「感傷情懷」扣合著尚未成為大人而自我辯證與反思的變動曖昧性質、「友愛情誼」作為連結少女的自我意識的媒介之同時，也將少女閉鎖入情感表現的被動姿態與少女單一的社交環境之中。

2-5 〈花開時節〉中少女的自我發展

以上，在本章探討了作者楊千鶴個人因素之創作環境，在民族自決風潮中出生的她，透過自身的家庭教養認同女性相夫教子的傳統賢妻良母思維教誨，但對女性自我價值抱持著疑慮等心境也反映於〈花開時節〉作品當中，另外投稿刊載的《台灣文學》更被視為當時陳述台灣人心聲的雜誌媒體，如在〈花開時節〉的書寫中所呈現的少女特徵，像是闡述了身為待家女性的立場，「感傷情懷」其中透漏了背後的自我反思與辯證，卻也透過了「友愛情誼」來保有少女的自我意識，這其背後與台灣的社會背景以及傳統風氣習性息息相關，台灣傳統社會在儒家道德倫理與延續後嗣的思想滲透下，以及聘金文化所帶來的交易性，迫使女性的價值與自我所受拘束無法自由發展，但在 1919 年後殖民政府所進行的教育改革使求學女性擁有了婚前短暫且合理的身心發展自由，卻也藉著賢妻良母觀的教育理念將女性塑造為合乎國家的理想形象，及是要求女性作為賢妻良母奉獻國家以做為被認可為「國民」的條件，在教育的目的卻依然在於要求女性作為家庭空間的勞動者的情況下，女性的自我依然持續被壓抑於賢妻良母的形象之中。

然而在教育的另一層面，求學女子可透過雜誌媒體接受日本的少女文學薰陶洗禮，透過山本禮子的考察結果，能掌握當時女學生所閱讀的書籍中有大半的內容皆是女學生取向的少女雜誌，我們能夠理解女學生所受的文學思潮概要方向，伴隨著女子教育發展 1920 年代出生的女子擁有別於前一個世代，她們普遍具備國語能力，且經歷大正民主自決風潮洗禮吸收外來的雜誌媒體新知，因此在本章，筆者專注於當時女學生取向閱讀的少女雜誌其中的少女文化發展，透過「少女」這由雜誌媒體中所誕生的自我認同，同台灣當時代的女性是被排列於性別秩序最下階層，「少女」除了作為戀愛與結婚為對象的妙齡女孩或是十歲中半的女孩的群體稱謂，少女雜誌所刊載的少女小說使閱讀者能夠吸收其中的「少女」特徵，

進一步構築自身的「少女」自我認同。

而少女文化所帶來的新式自我認同也給予她們不同的自我審視角度，環境影響使惠英在作品中呈現了「感傷情懷：自我反思與辯證」與「友愛情誼：保有自我」的矛盾樣貌，而「感傷情懷」出現的主因來自傳統婚姻的壓迫，「友愛情誼」來自與友人陸續轉變為賢妻良母，即是面對賢妻良母化之維護情誼的反抗行為，進一步追溯 2-3 提及台灣傳統觀念中「房」的家庭單位，女性必須藉由婚姻納入父權體系保有自身社會地位，同時，清末以來延續的聘金習慣的彰顯作用更深刻剝削了女性自我發展的權利，女性的自我發展被侷限於賢妻良母的形象當中，在 1937 年後皇民化時期總督府政權更加深了台灣人民作為皇民的信奉精神，並動員婦女深根家庭勞動徹底貫徹了國家主義，關於這點，日治後期的女子教育全面普及的家政教育中便能看出端倪。在下一章，筆者欲探討台灣女子教育中，少女在朝著賢妻良母化前進的路程的內化規範進行探討。

第三章 〈花開時節〉中的內化要素之影響

在上章，筆者探討了〈花開時節〉相關的社會背景與少女文化的思潮影響。在本章將嘗試探討女子教育當中的教化內容以及〈花開時節〉作中作《結婚、友情、幸福》《娘時代》中的內化影響，彙整後探討其整體的少女形象塑造，作為第四章分析主角惠英之少女自我建構與呈現的基準。以下筆者欲先論述〈花開時節〉中的教育背景，並進一步探究少女的內化因素觀點與影響。

參考作者楊千鶴的求學經歷⁹³，進一步對照當時台灣的社會背景，楊千鶴出生的 1921 年，正洽殖民府政府發布第一次的台灣教育令後女子教育全面普及且逐漸滲透民間時期，在第二次教育令（1922 年）之後出生的女性普遍接受了初等教育。另一方面，1913 年殖民政府發布了「實業學校令」後開辦了農、商、工業等職業學校，但升學對象大多為男性。相較起男性升學選擇，如有師範、工商、農林等職業學校以及高等教育機關的帝國大學等豐富的教育系統，而真正合乎女性需求的職業教育開辦於日治後期，但是在 1938 年至 1943 年間，因入學志願者大幅增加的背景下才陸續開辦，並且是以打造賢妻良母為名目的家政教育學校。家政學校在民間也被稱作新娘學校⁹⁴。而根據榎本（2000）研究，家政的概念之所以能夠順利受容於台灣社會，是因家政科學的盛行與社會背景以及國家主義有密切的關連性⁹⁵，如前章（2-3-2）提及女子教育結合了「國家主義」與「賢妻良母觀」思想，透過重視國語教育進行同化並確立日本國民性格，藉著妻母職之女性深根滲透思想進入家庭內部。因此受教育的女子可說是背負連接國家與家庭之間的重要責任。而在 1937 年太平洋戰爭時局，日本當局政府為了讓人民動

⁹³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350 年譜。楊千鶴於 1934 年四月至 1938 年三月就讀台北靜修高等女學校，並於 1938 年四月進入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就讀於 1940 年四月畢業。

⁹⁴細谷等〈逸脱する家事—キャサリン・ビーチャーとエレン・リチャーズの家事の科学・政治学〉《接續》，2007，整理自頁 126-144。實際上家政的概念，是於近代開始重視女性在家庭中的勞力與家事負擔的背景下發展而成。家政以家事改革的理念為出發點，將日常生活接觸的家事科學化、專門化、效率化，透過社會改革與環境運動使女性能夠進出於家庭外部，也就是透過家政的概念，將性別分類為男性社會與女性家庭的性別分工概念。

⁹⁵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湾の家政教育》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専攻修士論文，2000，頁 20。在家政教育起步的 1920 年代，因相較於過往封建社會與家父長制等壓迫，新式的家政教育正確且有效率改善婦女於家庭中的勞動力因此廣為民間受容，透過家政的新式概念家事勞動備受高評價及尊重，不過相對的，教育科目集中於裁縫與家事技藝也備受批評是將女性排除於知識階級。同日本當局，台灣的殖民政府也相當重視近代家庭概念，在時態脅迫的 1930 年代後半，皇民化風潮中女性必須承擔「銃後之母」的角色，以便維持戰場後方的家庭系統之重要任務，家政教育可說是貫徹了培育賢妻良母的教育理念。

員，透過教育與媒體等媒介傳播天皇為父，國民乃為天皇之子的家族國家共同體概念，即是所謂的「家族國家觀」，因此，在國民思想的統治方面，殖民地台灣的不同面貌是待後續探討時需注目的觀點。而有關於女子教育中是如何塑造少女為國奉獻培養成「國民」的意識形態，在這方面的敘述筆者為撰寫方便將之稱為「國民化」，在本論探討亦是女性的「賢妻良母化」議題。

而根據渡部（2007）之研究，日本的「少女」與「女性國民化」之間的關係探討，她提到，近代國民國家為橫斷階級，直接的支配人民的國家形態，因此，「國民」一詞作為想像的共同體，意圖在於近代國家的帝國主義是需要人民生產更多健全的人民來成就勞力以及壯大國力，因此在家庭成員當中男性能夠作為士兵以及勞動者直接為國奉獻，而女性則是藉著生產後代子孫以及回復丈夫的在勞動間產生的疲憊，以間接的方式為國奉獻，並必須將後代養育為優良國民，因此，「生產後代」「養育國民」的母職，以及「回復國民（夫）的勞動力」的妻職，符合這三項目才能算盡「國民的義務」參與「國民的想像共同體」被視為「國民」⁹⁶。因此，透過家政教育將女性改造為賢妻良母，滲透入家庭並進一步為國奉獻強碩國體的過程，換言之家政教育也能稱為女性「國民化」的手段，其目標為最終目的將女性塑造為賢妻良母。

因此我們可透過上述說明重視〈花開時節〉中背景的女子教育，是一種塑造少女成為理想國民的環境。而當我們在賢妻良母為目的的教育框架中探討少女形象時，容易混淆這兩項對立的形象，所以在這裡我們必須先釐清，少女在接受賢妻良母形象塑造的家政教育當下，是尚未成為妻母的狀態，就學女性在國家主義所灌輸的理想國民形象－賢妻良母－教化過程中，她們擁有發育完全能夠生育的生理機能，也因就學期間延長了這段曖昧的少女期，而在這段期間因無法實行賢妻良母的職責，實際產生的規範反而樹立少女形象誕生，並受雜誌媒體中的少女文化影響進一步確立了少女自我認同，也可能在畢業離開教育機關後，少女形象變得更加曖昧模糊，在進入婚姻後而逐漸形象瓦解。因此在尚未成為妻母的少女，對她們而言少女期相當的短暫且形象塑造與自我建構過程之過程顯得獨特。而惠英處於少女期的少女形象的內化塑造之後，也就是曾處於「國民化」之後的階段。

回歸惠英經歷過的女子教育之中的內化塑造影響，筆者重複引用緒論舉出渡部提出的教育中的三項少女規範，「我認為少女期的教育中，為了讓賢妻良母的

⁹⁶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14。

職責持續作用以及將其職責內化入少女，因此給予了少女期特有的規範。正如同在文章開頭敘述的少女特有規範—「純潔」規範（生理）、「愛情」規範（心理）、「美」規範（容貌）—。⁹⁷。渡部提出的理論分別規範了少女的身體的純潔以及心理與外貌的美麗，此三項規範也與少女雜誌的「少女」特徵的有著密切的補足關係，卻不影響少女成為賢妻良母的最終目的⁹⁸。因此筆者參考渡部舉出影響少女規範並提供概念說明，並在本章嘗試探討在台灣的女子教育中實際影響少女的規範的概況，進一步聯結惠英所閱讀，並可能影響她自我認同的兩本小說《娘時代》與《結婚、友情、幸福》，最後，彙整多方面影響來探討主角惠英整體的少女形象塑造。

3-1 教育中「少女」規範

3-1-1 渡部周子的少女規範論

渡部（2007）探討明治時期日本女學校使用的修身科教科書中實際影響未婚女性在少女期的規範內容，同上章內容提到，提出的「愛情」「純潔」「美」此三項規範，並且考察其規範樹立的背景以及分析了此三項規範互相牽制的機能。

歸類整理日本學者的少女期女性之相關研究，不論是分析少女小說的久米、分析少女雜誌的今田，又或是分析教育中的少女規範的渡部，他們所提出的理論中一致的共通點及是少女必須維持「純潔」特徵。根據久米（2013）之研究，少女在未來作為成為賢妻良母的預備軍，必須以異性愛為對象、但在少女期的當下又必須維持生理上的純潔無染，於是雜誌媒體中進而出現了藉由少女友愛主題的友愛小說來補足異性愛的體驗。另外根據今田（2007）之研究，該時代的少女雜誌編輯者透過了「童心主義」意圖使少女們認同「清純」的價值，進一步保有生理上的純潔。但渡部認為影響少女的「純潔」概念，也必須以國民國家的性別約束視點來關注它所俱備的制度性與影響性，因此久米與今田研究中皆留下了國家、社會與少女文化的關係性尚未釐清的課題，也就是教育中少女的實際規範為何之課題。因此，本小節筆者欲參考渡部針對女子教育與少女之間的受容關係的研究

⁹⁷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26-30。

⁹⁸ 前述少女小說的規範，雜誌媒體中少女的特徵影響①被愛，領人疼愛首先她們必須要擁有豐富的愛情，②被愛與可愛是必須維持女學生的外貌與打扮，③友愛小說藉著同性間的羈絆同①的被愛立場能夠使少女維持生理純潔。

內容，進一步理解少女的國民化塑造過程⁹⁹。

渡部¹⁰⁰（2007）提及，隨學校制度確立後女性擁有能生育能力的同時到結婚為止的猶豫期伴隨著就學期增長，因此在明治期發展出了妻與母以外的新式少女生活型態。明治政府當局理解，在實際的教育過程下少女並不可能在就學中成為真正的賢妻良母，因此才需要特有的規範來約束。同時，明治民法規定了十五歲的適婚年紀門檻，這讓選擇就學的孩子在過了適婚年紀後各別產生了所謂的少年和少女時期。而當時朝向國民國家發展途中的政府當局視培養賢妻良母來再生產回復士兵的勞力為國家發展上的首要課題，因此，必要讓女性在女學校等教育機關習得和男性對等的知識教養，所以，教育的制度化對未婚女性的生活方式帶來很大的影響與變化，也就是接受國民教育的同時，女性勢必會離開家庭環境與地域性的風險。另外，高等女學校多集中在市都心，因此發展出花費長時間的通學生活以及寄宿的新式生活。如上述，我們能理解在制度化的過程中進一步發展出了未婚男女的性別特質規範。

在有關「愛情」與「純潔」的規範概念，渡部如下說明。

為了維持父權社會制度，女性在婚前必須保持純潔、遵守節操不得和丈夫以外的對象發生性關係，若和丈夫以外的性行為產下的「嫡出子」會破壞倫理秩序，因此，女性在婚前的「純潔（貞操）」會左右家父長制度社會的體制。然而，當然不可能以物理性的作法將女性的行動侷限於家庭空間內來約束少女的性別特質，因此必須在新式女子教育制度中創造出符合管理性別特質的實踐雛型。在上述當中我們能理解「純潔」的作用用來約制女性與父權體制社會的關係，而少女在未來也備受期待成為為丈夫犧牲奉獻與養育子女的角色，其更必須具備的是深厚愛情。（女子教育中愛情規範與純潔規範的互相作用的課題）然而少女在未來必須與男性培養異性戀關係，並以妻職身分盡國民義務，但在結婚之前又必須保有性方面的純潔。因此，將女性教育為身體保持純潔並擁有能回應異性戀的精神如此矛盾的教育目標，也是女子教育所背負的難題之一。¹⁰¹

⁹⁹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25-26。

¹⁰⁰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31-34。

¹⁰¹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35。家父長制度の維持のためには、女性が結婚するまで純潔なままでいることが必要だった。なぜならば家父長制を維持するためには、女性の貞節を守り、夫以外の子どもを産む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か

渡部以政治視野談論女性教育中的「純潔」規範與「愛情」規範的互相作用的關係，他認為國家透過制約未婚女性的「純潔」維持父權體制的平衡，並要求未婚女性成為情感富裕的個體，最終達到犧牲奉獻的國民化目的。另外有關於「愛情」規範的重要性，渡部如下進一步說明。

明治政府與西洋邦交的過程中（國家政府）理解，建立平等的性別秩序所俱備的重要性、國民的「正確的異性關係」關係著國家的繁榮。因此明治政府在國家的層面上視女孩（女子）的愛情為相當重要的價值。雖然女性被期望藉著家庭貢獻間接的為國家犧牲奉獻，但若要讓女性發揮無償再生產的角色的話，必須將該角色作為「尊貴的角色」內化。山田昌弘考察了現代戀愛結婚與其成型的家族、其夫妻之間的角色分工能夠順利運作，愛情在之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透過戀愛將情感帶入婚姻關係中。雖然我們很難看得出來異性戀愛和家庭內妻職的再生產職能之間的關連性。但是山田認為，在戀愛結婚的夫妻之間，即使角色分工有不合理之處，仍會盡到自己的職責，這便是愛情的證明。舉例來說，對女性而言熱心從事家務勞動便是愛情的表現。也就是說，戀愛具有讓女性的再生產角色自然化之功能。¹⁰²

らである。女性が奔放な性行動をとったら、嫡出子（男子）を次代の家長とする家父長制は崩壊する。しかしながら、物理的な方策一家の中へ囲い込み一によって、少女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を統制することはもはや困難であった。そこで、新たな女子教育制度に相応な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管理に関わるプラティック（実践）（慣習行動）のモデルを創出せ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このように、純潔であ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る一方で、少女たち将来、妻として夫に献身し、子どもを産み育てることが期待されていた。女性が夫に献身し、子どもを養育する役割を果たすうえで重要なことは、深い愛情を備え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少女は将来、男性と異性愛関係を築き、妻として献身することが期待されていたのだとしても、身体においては純潔なままに、異性愛に応える精神を持つ女性を訓育することは、もともと矛盾した教育目標であり女子教育が抱えた難題の一つであった。筆者譯。

¹⁰²同註釋 28，頁 37。明治政府は、西洋諸国と対等に国交するうえで、ジェンダー秩序も同等のものとして築く必要性を理解した。また、国民が「正しい異性愛関係」を結ぶことが、国家の繁榮に繋がるのだということをも認識していた。それゆえ明治政府は女子の愛情を国家的に重要な価値とみなした。家族に尽くすことによって間接的に国家に奉仕することが女性に期待されたとはいえ、無償労働である再生産役割を女性たちに実行させるためには、この役割を女性にとって尊い役割なのだとして内面化させる必要があった。山田昌弘は、現代の恋愛結婚とそこから形成される家族について考察し、夫、妻の役割を遂行するうえで、「愛情」という感情が重要な機能を担い、恋愛は結婚の中に愛情関係を持ち込むのだと述べる。異性愛関係としての恋愛と、家庭内の妻の役割すなわち再生産役割の関連性は見えにくい。しかしながら、山田は恋愛によって結びついた夫婦は、彼らの役割がどんなに不合理であってもお互いがその役割を果たすことが愛情の証だと感じるかぎり役割が遂行され、女性にとっては例えば家事労働を熱心にすることが愛情表現だと位置づけられるのだと指摘する。つまり、恋愛が女性の再生

因此，在上述提示下我們能夠理解，國家政府透過教導女性「純潔」規範，藉由培育貞操觀念來達到維持父權體制的平衡，透過內化貞操意識要求少女的自律精神，進一步管理她們的性別特質，另外，並透過「愛情」規範讓女性無償融入家庭再生產而創造出的實踐雛型，也就是少女的自我認同。然而在教導愛情規範方面，因在大正時期即便是同性間的交往都受學校嚴密的監視，同性間萌生的愛情也被視為危及女性「純潔」的危險因素，但在教導將來成為人母必須的「養育」品行時仍然會涉及到男女關係，因此在教育層面上是以「教導弟妹」的方法來代替，透過這樣的方式將賢妻良母的角色隔離開性愛的話題。如上論述下我們能理解，這是種透過「無償的再生產分隔了男女之間的性愛」的作法，若比方情感的付出兌現為男女間的性方面接觸、勞動生產的付出兌現為金錢的酬勞，這樣的作法在現實層面將少女抽離了生理與物質的回報，最終，少女被塑造成為了付諸不望回報的「慈善行為」之個體¹⁰³。因此承接上述，在沒有任何酬勞與回報的前提下，「愛情」規範便能發揮功用，我們也能用上述的邏輯合理化該時代少女的情愛表現在國家統治的需求下其實是更接近所謂的「慈善心」。而這樣的「愛情」規範的培養，實際上在女性未來職業方面也能進一步發展成培養戰爭所需的看護角色。

在上述「純潔」規範與「愛情」規範的作用下，少女作為「感情富裕的慈善個體」，為保有貞操必須與異性分隔禁止交往，然而少女在不久的未來又必須在婚姻市場上受男性挑選最終締結成異性愛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少女並非完全與男性隔絕。在明治時期的女子教育當中強調，女性的容貌之美是建築夫妻感情生活的重要因素，因此，統治方提倡「美」的重要性與「知育」「德育」並駕齊驅。在明治時期的教育觀點上，統治方將女性養育塑造為男性喜好的對象，不外乎是因為在當時女性的自我發展被侷限於婚姻，最終作為被挑選的角色時，男性無法由外表判斷女性的內涵，挑選的基準只能依靠容貌的美醜，而渡部將有關女性身心的容貌養育的規範稱呼為「美」規範。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日本女子教育中「美」規範樹立的社會背景，因明治時期

産役割を自然化する機能を果たしているのである。明治期の女子教育は、女性が愛情という感情を自然化し、内面化することを目論んだ。少女は男女別学によって異性愛から厳格に隔離されていたとし、女子教育上における愛に関わる規範の形成については、従来ほとんど考察されてこなかった。明治期の女子教育は「純潔」という規範を逸脱しない範囲で、「愛情」に関わる規範を形成し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筆者譯。

¹⁰³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80-81。

的教育學者深受西方文化影響，認為「美麗的靈魂」能夠慰藉人心，同樣，明治政府仿效西洋國家，將中產階級女性的性別規範作為道德且慈善的存在來慰藉鼓勵男性，在該時期，統治方雖然理解日本女子教育體系上女性的精神美的重要性（目的在於為男性奉獻給與精神層面與勞力的撫慰），但實際上仍然傾向於提倡外表容貌的「美」¹⁰⁴。而針對「美」規範，該時代的日本教育學者提倡不同的主張，在明治 10 年開始的幼兒教育已經嘗試以園藝圖畫唱歌等實踐課程來拓展「美的教育」，草創之近代化背景下大部分引介了西洋思維。在日本美育的教育立場在於，人不僅要擁有識別美的能力，必須培養創造美的能力，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想像力的培養。時至明治 20 到 30 年初頭，教育方才開始提倡美育教育的重要性。在明治 40 年（1905 年）前後陸續有學者¹⁰⁵提出興趣培養的重要性，舉例如學者小西重直，他認為興趣培養與審美之間的結合能使人的品性達到更完美。但實際上，美育教育的概念核心是藉由女性的「美」作為輔助媒介，撫慰並安慰男性的精神，役使男性成為更加「完美的人類」。但是因容貌本是先天的因素，在教育上意圖的將容貌的美推導向後天努力，女性「美」的特質會備受重視，其不外乎同在於產業社會當中並無女性適合發展的職業，在中產階級的性別分工概念普及後女性被分隔在家庭空間的再生產角色。女性擔當了在家中維持機能與回復在外工作男性的角色，而其容貌的美占回復機能相當大的因素。如同探討「愛情」規範時提及為丈夫犧牲奉獻的情愛表現，容貌的「美」也作為間接性參與社會必須擁有的要素之一。

如上述提到「美」規範的概念後我們能夠理解，在異性愛的觀點上女性並非完全與異性隔離，在自我發展出路被侷限在婚姻，未來必須受男性挑選，但在性自律的少女期又必須成為理想的異性對象，婚前無法判定女性的內涵的情況下，多半只能依靠容貌的美醜，但在「愛情」與「純潔」此兩項相剋的教育目的調和下使精神美藉由身體美可視化。最終在三項規範的互相作用下順利誕生出的就是「少女」如此的客體¹⁰⁶。

透過以上參考渡部研究的少女規範論，其三項少女規範的互相作用下，「少女」被要求成為擁有富裕情感，強調以家事勞力作為愛情表現，並且受要求自律精神而呈現了被愛的姿態，並且透過興趣培養體現內涵。「少女」作為被愛的立

¹⁰⁴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87-94。

¹⁰⁵小西重直，日本教育學者。第 9 代京都帝國大學總長。

¹⁰⁶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頁 114。

場，在內化上述規範的過程並唯有符合生理與心理的回報而具有閉鎖封閉的性質。在以上渡部的研究提示後，在後續筆者嘗試以渡部的少女規範論的視角來觀看台灣的女子教育，進一步探討〈花開時節〉中的內化影響。

3-1-2 台灣女子教育中的少女規範試論

在上節引用渡部的少女規範論後，我們能理解影響少女客體樹立的三項規範，「純潔」「愛情」「美」之規範分別制約少女的生理、心性以及容貌體現。回歸本論的〈花開時節〉的台灣背景，筆者試圖以渡部提供的規範論觀點檢視日治時期的台灣的女子教育背景，其中女子教育學者分別存在了兩派教育立場。洪郁如¹⁰⁷參考游鑑明¹⁰⁸的研究重新修正分類，分別是「齊家興國論¹⁰⁹」的女子教育觀與「解放論¹¹⁰」的女子教育觀。而此兩種反差立場的女子教育觀念反映於〈花開

¹⁰⁷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¹⁰⁸游鑑明《日據時代台灣的女子教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

¹⁰⁹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整理自頁 151-156。在 1920 年代以前「齊家興國論」的女子教育觀，其內容基於賢妻良母傳統教育觀念的同時並以「齊家興國」為理想，如同字面上強調「家與國」的構圖，並且強化了女性身為「妻」與「母」的角色，洪二次引用小山靖子（1991）研究指出，近代日本的賢妻良母之女子教育思想具有兩項明顯特徵，其一是透過家事與育兒的貢獻來成為具體國民；其二是比起妻職反而更強調母職。這不外乎是因母親的角色為養育下一世代國民之重要任務而易賦予價值，同時受到近代性別分工的影響，妻職的定位在於家事勞動與管理的再生產上。然而，在殖民地台灣發展而成的「齊家興國論」之賢妻良母教育觀具有兩項特徵，其一特徵，同是透過「人、家、國」的傳統世界觀，強調並且要求女性在家中的妻母角色與國民意識的連結，但在台灣的女子教育論者關注的重心則多集中以「家」話題為中心（1.圓滿的夫妻關係、婆媳等家族關係 2.家政能力 3.下一世代的教育），探討的話題聚焦於女子教育為家庭帶來的利益，然而針對國家的影響卻較少提及。其二特徵為「國家」概念的曖昧不明，因當教育論者涉及「國家」言論時，能依場合與國家認同的不同解讀為「中國」或「日本」，因此而刻意不提示具體對象。其原因不外乎在於論者迴避具體的論述，整體也能看出台灣的「齊家興國論」的思想僅止於「齊家」的層次。殖民政府立志同化台灣國民意識之「國家」等於「日本」的努力，具體呈現在 1920 年後女子教育中加強「國民」概念的思想性課綱當中，因此台灣的「齊家興國論」之女子教育觀中實質意義在於「齊家」，而理想放眼於「興國」，可說是殖民地獨特的教育觀。

¹¹⁰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整理自頁 156-166。1920 年起以赴本島之台灣留學生為中心帶領起了「解放論」之女子教育觀。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思潮與女性運動等影響，在留學生論者之間以學歷規範（以學歷作為社會地位高低之判定基準。）為要因形成了社會階層，因此在女性教育範疇裡出現了資質與規範需求，其論點主張：透過女子教育進一步達成家到學校的解放以及解決男女平權問題，並且強調自由戀愛，台灣社會對「新女性」賦予相當的期待，如上述的主張立場，「解放論」對 1920 年後出生的女性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另外根據洪郁針對女子教育論者針對 1920 年代「解放」的脈絡分析，其具備了兩項特徵如下。

第一特徵：由家到學校的行為解放，強調女性作為人的權益，換言之，在該時代開始強調起男女對等存在的「人格」，但卻是以「男主外、女主內」的構圖主張男女平等，同時又受「戀愛・結婚」等流行潮流洗禮，因此，「解放論」之女子教育關相較於「齊家興國論」女子教育觀中議論的「女性=家庭（=國家）」之貫徹國家主義思想性構圖，「女性」逐漸作為單獨的個體，教育論者認為女性教育是承認個人的「人格」並且重視「權利」的制度。

時節〉之中。此兩項理論的女子教育觀的立場在於「重視人格」與「奉獻國家」之差別，實際上重視人格立場的教育論者仍然保留了女性價值等同家政這既有的思維。

而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解放論」之女子教育觀的立場，他們對女性的社會活動的自覺與參與，並非出自期望女性行為性踏入職場，而是透過家政教育的近代化思維樹立女性在家庭內的人格，提高家庭環境的知識水準，透過這樣的方法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其實質意義上仍然在於輔佐知識分子的丈夫，參與男性中心的社會議題與活動，同時達到了男主外女主內－現代性別分工的構圖。因此，在當時的女子教育中也是透過家政的科學化補足了男女不平等之間的爭論，而這兩項存在於 1920 年前後的女子教育觀之立場，教育風潮的影響勢必對當時女性的人格發展有相當的影響，正如同惠英在文中不經意提及身處於新舊世代的夾層中，而「重視人格」與「奉獻國家：抑或是遵從傳統禮俗」的教育風潮之特徵，也反應於惠英的家庭角色之上，相關分析筆者於第四章細論。

在以下筆者嘗試以渡部的少女規範論中的三項規範觀點，探討台灣女子教育中是否出現類似的規範，以及其中形成的規範其獨特性質。但因針對日治時期女子教育中的課綱相關研究與未婚女性之規範內化研究短少，特別是針對修身教育中的「愛情」與「純潔」相關規範，研究領域大多著重在創校沿革及大環境的變遷，故此研究限制下筆者只能進行簡約的概要試論。

根據山本（1999）之研究，山本調查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等女學校學生之回憶錄採訪結果，如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以「端正、堅強、賢淑」為校訓，道德教育內容指出禁止該校女學生與男性互動（如談話或並肩同行等行為）強行規範與異性的接觸，外出時也規定必須穿著制服展示自身為該校學徒。山本訪問高等女學校經驗者關於國民性格涵養最具關聯的「修身科目」的感想，受訪者感想如有「教授誠實、勤勉、謙虛、等女子未來成為賢妻良母必要的三從四德等內容。」¹¹¹

第二特徵：是女性對社會自覺的期待，也就是藉由接受教育進一步達到自我（人格）解放。教育論者認為女子教育的意義與必要性在於啟發女性自覺來解決傳統的婚姻制度與納妾等束縛自我的問題（童養媳、娼妓、蓄妾等陋習），進一步乃至於生活自立等議題。而在批判性層面上，論者們提倡喚醒女性的社會自覺並且參與社會，同時也批判殖民地式封閉的女子教育內容。如此的「解放論」之女子教育論當中，其並非對抗「齊家興國論」所主張的賢妻良母思想，而是期許接受教育的女性能再定義自身在家庭內的角色，進一步理解並且輔佐以男性知識分子為中心的政治、社會、經濟等殖民地問題。

¹¹¹山本礼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頁 120。

以及「道德與婦德的教授內容，台灣人與日本人的道德觀念有些許落差。」¹¹²等。據訪談內容的結果，修身科的課綱目的在於國民精神性的規範。另一方面根據游鑑銘¹¹³（1987）的研究提示，1920年代的修身科重視婦德與禮儀，禮儀方面的訓練包括日式與西式兩種，藝能課程（家事科與藝術科）課程培養節儉、清潔、周密、節約和利用厚生等習慣，皆回應在1920年代該時期殖民政府方發布的「〈一〉涵養德性〈二〉精通日語〈三〉確立日本國民性格〈四〉陶冶貞淑溫良和勤儉家事的習性〈五〉傳授切合實際的知識技能」以上五項教育要旨中。

如上述，研究領域的限制尚未有針對內化教育的分析研究，而會有此現象不外乎是該時期政府執著在同化政策的結果，比方如前述說明1920年前後的女子教育觀提及，因殖民地的教育層面在於「日本化」，且第二次教育令發布後女學校實施「台日共學」，「語言」與「學歷」成為競爭入學時最大的門檻，而形成了行為規範。另外，在2-3-1部分提到，台灣固有且根深蒂固的儒漢文化中「女性社會地位（男女授受不清）」的特徵，筆者認為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足已形成了代表父權體制象徵的「純潔」規範。

另外，在民族自決風潮中的192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層（赴日留學生）間紛紛關注起男女之間的「戀愛結婚」的相關論述，這些知識分子透過平面媒體帶領起的「婚姻自主」的觀念，引導出與以往不同的婚姻觀念與樣貌，如主張戀愛為結婚的先決條件並且尊重本人的意願，在新式婚姻環境下，勢必影響了接受平面媒體的女學生們¹¹⁴。在過往接受殖民教育的男女組合而成的新式家庭陸續形成，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與意識形態也有顯著的變化。如女子教育中不斷主張的「賢淑」，過往進入家庭的女性，她們在教育過程中培養成為家庭貢獻的妻子形象，不外乎也是利用「賢淑、忠貞」的教養要求女性以家事勞動兌現為愛情表現。然而回歸台灣的社會環境相較於「愛情」規範與「純潔」規範，因擇偶條件左右下仍然會偏重在取得「學歷」的層面上。另外，在台灣的女子教育課綱中，以興趣培養為中心的「藝術教育」能顯著的發現類似渡部提出的「美」規範。

據洪郁如調查引用，〈花開時節〉背景之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後文簡稱「學院」）當局的評價，「內在方面，努力將原有的思想情感以及趣味國民化；外在方

¹¹²山本礼子《殖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頁121。

¹¹³游鑑明《日據時代台灣的女子教育》，頁166。

¹¹⁴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頁205。

面，則考量本島婦女風俗習慣之長短，矯正惡者，助長善者，同時讓其認知內地婦女之長處美點，盡力徐徐與我國樣式同化。」¹¹⁵如上述，女子教育目的以日本的女性為同化目標，並藉由興趣養成的音樂、圖畫、等科目使女學生貼近日本女性的精神思想。同參照渡部提供的「美」規範概念，藝術相關的興趣培養能夠體現女性的美，〈花開時節〉作者楊千鶴求學背景的靜修女學校期為該時期家政教育的代表校之一，其中的「圖畫」「音樂」「體操」科目目的同在培養興趣與審美觀體現，進一步探討〈花開時節〉創作背景的學院，該校為當時日治時期台灣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機關，相當重視學生在摩登文化與自我表現上以及「現代性」，其科目除了文學、音樂、家政、英語、普通科（修身、體操、教育、國語）與實科（裁縫、手藝）等正規科目，選修科目中更是出現了哲學、美學、美術史、音樂、繪畫、插花、園藝等藝術相關之興趣培養科目。其中針對畢業生的調查發現閱讀、電影、音樂、花道等為該學校學生的主要興趣。而該學校並不禁止學生涉足於電影院之事，並且經常舉行音樂、料理、繪畫等相關活動及定期舉辦音樂會。其機能也是為了確女學生在學習、消費與表現摩登文化的自由發展空間。

因此，在 1920 年至 30 年間隨著在台灣人與在台日本人間出現了女子高等教育的需求，1931 年創校的「學院」其科目中的藝術文化培養—美教育—，帶給求學女性的價值除了培養女性內涵在未來能順利立足於婚姻市場，另因台灣社會的紳士階級更放眼於「學院」學歷，其也意味著學歷價值在台灣社會發生的變化。學歷本具有「地位形成」與「地位表徵」兩大功能，而台灣的女性取得學歷的作用則偏向後者，相對於男性以學歷作為出人頭地之方法，女性則偏重在象徵出身家庭與社會階層之教養文化，透過學歷的表彰功能並在婚姻市場達到成就社會階級，且因學歷與婚姻之間存在高度的關聯性，所以家長也相當重視學歷的地位表徵功能，雖說是當時台灣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機關，但創校目的並非在於解消女性升學管道，是在於滿足台灣士紳的婚配需求。技職方面相較日本內地專門學校畢業即可取得「中等教員」資格，台灣的女學校仍然不聘用台灣島內的畢業生為教員，因此在政策上為了解消「學院」畢業生就在職的需求而授予了小學家事裁縫教員的資格，然而這仍然與日本內地的女子高等學校有落差待遇¹¹⁶。最終，

¹¹⁵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頁 147。

¹¹⁶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1999。頁 157-183。

取得學歷的出路仍僅限於被擇偶的條件，因此透過上述台灣女子教育環境中影響少女的規範探討，比起「愛情」「純潔」「美」等規範，更顯著在確保婚姻市場的「學歷」規範。

以上，透過台灣的女子教育中少女相關的內化規範試論，嘗試與〈花開時節〉連結可發現，惠英在被要求成為賢妻良母的教化過程中，受要求成為被愛且無償付出的少女，而實際取得學院學歷的目的仍然侷限於匹配當時待仕紳的婚配需求，且就職不完善的環境中，女子教育確實的將少女的自我發展壓抑在成為賢妻良母的目的之上，但在接受課外書籍的思想性影響，〈花開時節〉之中出現的作中作卻提示了另一種少女的自我意識萌發與自我發展，筆者於下節詳細說明。

3-2 作中作之影響－《結婚、友情、幸福》《娘時代》

在上節嘗試討論台灣殖民地女子教育中的少女相關規範，此節筆者將進一步探討有關於惠英在文中提到的兩本作品，也就是大迫倫子的《娘時代》莫洛亞的《結婚、友情、幸福》，參考〈花開時節〉中的內容引用如下。

我們畢業的時候，一本《娘時代》（少女時代）的新書風行一時，讀者很多。那本書將我們這群未婚少女內心裡含糊不清、莫可名狀的煩惱寫出來，我們頗覺心有戚戚焉。¹¹⁷

上文引用作品之作者，大迫倫子（1915-2003）由偕成社於1940年發行第一部作品《娘時代》是一部以隨筆方式講述身為少女（戀愛、相親、友情、婚姻等話題）思維與主角本身獨斷的想法，而作者大迫倫子同時曾任婦人畫報擔任編輯部記者。〈花開時節〉故事中惠英也提到與此部作品的少女思維抱持著相當的同感。

南國的太陽，雖說才只是三月天卻已經相當強了，暖烘烘的陽光照射在這青翠校園的草坪上。我們在這裡朗讀著莫洛亞「結婚、友情、幸福」書篇中的詞句。朗讀的聲音，恰好與禮堂處飄出的鋼琴樂曲，溶合成優美的旋律，洋溢於這不算大的校園裡。¹¹⁸

¹¹⁷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77。

¹¹⁸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66。

另一部作品《結婚・友情・幸福》為法國作家安德烈・莫洛亞（1885-1967・アンドレ・モーロワ）於 1939 年發行的思想概念書。值得注目的部分是，在〈花開時節〉中惠英對於自身價值抱持疑問時的自問自答，來自於此部作品。

或許，始料未及的，結婚之日突然來臨。如果婚姻美滿、成功的話，至少在某段時期內，少女之間的友情將為結婚所扼殺。因為兩份同樣強烈的感情是很難雙全並立的。」雖然莫洛亞在書中是如此地給「友情」下了註解，而「妳認為呢？」可惜，翠苑、朱映與我，都還來不及發出反駁的言論，我們就已經在「螢燭之光，窗下映雪」的驪歌聲中，踏出校門了。¹¹⁹

藉著莫洛亞文章的引用惠英試問「結婚」與「友情」之間的抉擇，然而故事的最後在主角群之間並無直接明確的回答有關於這兩項情感之間的關係性。而這兩項作品勢必對作者楊千鶴以及〈花開時節〉本身有直接的影響，因此以下筆者閱讀過此兩部作品，整理出其中的特徵並進行深入的解析。其中發現了《娘時代》中的主角具備了鮮明自我的特徵，以及《結婚、友情、幸福》當中的講述「友情與自我發展」，此兩項特徵與〈花開時節〉的詳細關聯性

3-2-1 《結婚、友情、幸福》中的友情呈現

此作品中以五個章節分別論述結婚、親子、友情、職業與公民社會與幸福的概念與思維，針對〈花開時節〉作品中出現的「友情呈現」的部分，筆者欲關注其中有關「友情」與自我意識的部分進一步探討，歸類出與〈花開時節〉有關連的「友情與自我意識」與「友情與結婚」這兩項關係性進一步說明。

3-2-1-1 友情的誕生與自我意識的鞏固

莫洛亞首先解釋了人為何需要「友情」的論述與重要性，內容如下。

對於建立家庭的人們、擁有珍愛伴侶夫與妻、擁有懂事明理父母的小孩們、又或者是擁有三千位情人的唐璜，他們都需要別種東西。我們看到，即使在家人間或者是戀愛時我們是不允許自己表露出完全的想法與情感。佔據

¹¹⁹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0。

我們心中的是即使面對家人或在戀愛也不能說出口的東西。那是因為在家人之間的關係是肉體而非精神上的，我們在那方面（家人之間的相處）易於被愛，另外在戀愛方面相愛的兩人，除了從戀愛轉移到友愛的情況以外，他們就像是互相扮演著兩個過於美麗的戲曲角色，因此，不論是小孩、父母、夫妻、情人、愛，在他們的心中的某處都保持著某些不用言語的關係。他們特別是對家人、對結婚、對父母、對小孩們抱持著不滿。但是，那些不說出口的事情是會損害過於封閉的心。那宛如像是傷口裡的異物會傷害組織。我們想要說出自己的想法、想要解放自己的肉身、但是我們看到的這並非是在家人間和戀愛時的狀況，那意義並非是純粹的肉體方面，而是在於知性與精神方面的，我們都有想呈現最赤裸的自己的需求。我們想說出這些秘密的情感和反抗心，又聽了這些反借給我們智慧，即使不借給我們智慧，那像是將這些秘密的憤恨與不滿轉變成社會層面的某些甚麼，渴望想藉著和某個親密的對象坦率說出秘密（心事）抒發心情。因此，除了戀愛以外的關係以及家人之間，我們也需要別種社會。而這裡述說的別的社會，也就是我們自由選擇的人，與其之間的友情，也或者是現實存在又或是故人的老師之間的精神上交涉。我們此時研究的就是這自由選擇，輔助般的家人。¹²⁰

¹²⁰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92-93。筆者譯。家庭を建設した人々、最愛の同伴者を有つ夫や妻、物分りのいい両親をもつ子供たち、また三千人の愛人をもつドン・ジュアンに対してさへ、他のものが必要なのである。我々は家族でも、恋愛でも我々の思想や感情の完全な表現を許さないことを見た。最も我々の心を占めてゐるものは、家族の中でも、恋愛に於ても口にするのでできないものである。なぜなら家族に於ける関係は肉体的なものであつて、精神的なものではなく、我々はそこでは余りにも容易に愛されるからであり、また恋愛に於いては、愛し合つてゐる二人が、恋愛から友愛に移りえた場合の外は、彼等が余りにも美しい二つの役割を有つてゐる戯曲を相互に演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である。かくして、子供も父も母も夫も妻も情人も愛も、すべての人々は彼等の心の片隅に口にしない何かを保持してゐる。特に彼等はそのなかに家族に対する、結婚に対する、両親に対する、子供たちに対する不平を保持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ところで口に出さないことがらは、あまりに固く閉ざされた心を損ふものである。恰かも傷口のなかに含まれた異物が組織を害するやうに。我々は思ふことを喋りたい、自分の身を投げだしたい、また、家族や恋愛の場合に見られるやうな殆んど純粹に肉体的な意味ではなく、知的な、精神的な意味に於て、赤裸々な自分でありたいといふ要求をもつであらう。我々はこれらの秘密の感情、これらの反抗心を口に出して言ひ、また、それを聞いて智慧をかしてくれるやうな、たとへ智慧をかしてくれなくとも、これらの密かな憤懣を何か社会的なものにしてくれるやうな、誰か親しい相手に打ち明けることによつて、さつぱりした気持になりたいと要求する。そこで我々には恋愛以外の関係、家族とは別な社会を必要とするのである。この別な社会が、取りも直さず、我々が自由に選んだ人間との友情であり、もしくは現存の或は故人の師匠との精神的な交渉なのである。我々が今日研究しようとするのは、この自由に選択された、補助的な家族である。

如上述，據莫洛亞的說法，人是需要家人、戀愛以外的某種情感來達到身心平衡。「我們想要說出自己的想法、想要解放自己的肉身、(中略)，我們都有想呈現最赤裸的自己的需求。」進一步理解莫洛亞的解說，他主張了在友情與自我的關聯性，人需要自我的空間舒展自己的原始樣貌，因此需要家庭以外的夥伴來呈現最真實的自我，必須向親暱的夥伴講述自己真實的心境並且成長。最後，莫洛亞將「戀愛與家庭以外的社會」稱呼為友情。

莫洛亞以上文解釋了友情的誕生，相較「戀愛」和「母性」這樣純粹的本能我們並不會抱持疑惑，再更進一步論述「友情」這項情感時往往會與「結婚」作為比較對象，特別是在面戀愛時便會對友情感到無味。然而「友情」這樣精神性親密的結合是如何誕生呢，莫洛亞以下文說明。

在這個世上像如此邂逅的人擁有珍奇的才能，那就是想得到對方認可這樣如此簡單的理由，這種結合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友情。¹²¹

因人在相遇的彼此身上產生了認同感，並作為精神上的同伴而產生了友情。莫洛亞接著再進一步與「戀愛和結婚」的關係論述比較。

但是，去除掉例外的情況，這樣偶然的邂逅大多是沒有機會永續的關係。就像透過結婚的制度讓戀愛深根持續維持健全，友情天生需要一種拘束。因人心會怠惰，如果沒有某種拘束來刺激這種天性的話，人往往會因為各種細微的理由而迅速感到疲憊。(中略)而在這裡就有拘束的必要。如學校、連隊、軍隊、船上生活、戰爭中的將校會餐廳、小型都市中官吏們共同的餐會，在這些形式的生活就像在補足類似像家庭生活的某種東西。而這是健康的，人們被迫和他人共同生活，透過這樣的強制方式讓使進一步判定自己，也就是學習互相包容。¹²²

¹²¹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95。筆者譯。世の中にはこんな風にして邂逅した人間が珍しい才能を有つてゐ、それが相手に認められたといふ極く簡単な理由から、この結合に無理のない場合がある。即ち疾風迅雷的な友情である

¹²²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96。筆者譯。しかし、例外的な場合を除いては、このやうな偶然的な邂逅が永続的な関係を生じない機会の方が非常に多いのである。結婚といふ制度の助けによつて恋愛が根強く続くことが健全であるのと同じく、生まれつつある友情もまた一種の拘束を受けることが必要なのである。人間の心は怠惰である。もしどのやうな拘束も生まれつつある感情を刺激しない場合には、人々は不当に、またさまざまの些細な理由によつて早急に疲労するやうになる。(中略)拘束の必要はここにあるのだ。学校、連隊、軍隊、船上生活、戦争中の将校会食所、小さいな都会に於ける官吏たちの一律の食事、すべてこのや

如莫洛亞上述內容提及，「友情」並沒有如「結婚」這強制拘束戀愛關係的方法，因此，如在〈花開時節〉中的女學校生活這種類似家庭生活的拘束，一旦在離開學校的環境下便反而容易失去藉著與他人相處與包容認識自己的機會。莫洛亞進一步總歸友情誕生的因素，他認為是所謂的「靈魂與性格的親近感」，且必須是幸福的拘束著彼此意志穩固的共感成長，比起肉體上（家人或戀愛）的羈絆促成的關係，必須擁有更多的精神自由¹²³。莫洛亞並強調他自身對於友情的觀念理解，認為其本質的特徵在於「無私無欲」與「互相尊重」，上述提到人需要透過講述真正的想法來呈現最真實的自己，而挑選的友人，能夠提點我們不足的優缺點，莫洛亞接著以下論述。

正因為尊重才能夠允許誠實，理解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臣服於愛我們並且稱讚我們的言語，那是因為，我們信賴自己，若缺乏這些的時候人生會變得過於痛苦，只要擁有信賴就能夠同意對方對我們的指責。¹²⁴

友情的機能彷彿在於鞏固自我，我們能藉由認識性質相近的友人，能進一步理解與比較達到自我成長。而針對友情的經營莫洛亞認為與「共有秘密（秘密の打ち明け）」有關。

我認為真正的友情若沒有坦承秘密是不會成立的吧。我說過，友情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將沉澱在心中隱藏部分的感情回歸於社會生活之中。¹²⁵

我們能透過友情的關係呈現最真實的自己，擁有共通話題與共同感受維持感情互相成長，維持自我，透過友情，使感情的部分有抒發的管道，並持續作為友情之間的養分與糧食，如同莫洛亞訴說的「將情感回歸於社會生活之中」，透過這樣的方法持續維持著正向的循環。

うな形式の生活のなかには足らざるを足れりとする家族生活に似た何者がある。そしてそれは健康なことなのである。人々は共同生活を余儀なくされる。そしてこの強制によつて人々は一層よく自己を判断することを、つまり相互に忍び合ふことを学ぶのである。

¹²³ 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 98。

¹²⁴ 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 108。筆者譯。誠実さを許すのはこの尊重のみであることを理解す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る。我々は我々を愛し、もしくは賛美してくれる人の言葉には悉く承服する。そのわけは、我々は自己に対する信賴、それを缺くときには人生があまりにも苦しいものになるであらう、この信賴を失ふことなしに彼の非難に同意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ある。

¹²⁵ 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 104。筆者譯。私は真の友情は秘密の打ち明けなしには殆んど立ちゆか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ふ。我々は友情の目的の一つは、心の隠れた場所に澱んでゐるさまざまな感情を《社会生活のなかに復帰させること》であると言つた。

3-2-1-2 友情與結婚的關係性

在上述內容我們能夠理解莫洛亞的理論提示，友情與自我的建構維持的正向迴路，然而「友情如結婚同樣，必須達到預期誓約如此相當程度的思想¹²⁶。」相較結婚的關係，無利害的關係的友情以共感感受來維持，因此必須要有相當的決心以及自我信念，所以當我們離開互相拘束的場所（如學校等）便會失去維持感情的環境。在〈花開時節〉中引用《結婚、友情、幸福》中「或許，始料未及的，結婚之日突然來臨。如果婚姻美滿、成功的話，至少在某段時期內，少女之間的友情將為結婚所扼殺。」的之後如此論述，「相反的結婚若以失敗結束的話，能藉著坦承秘密再次發揮她們的友情的機能。¹²⁷」友情最終仍然能作為感情上的補足，但如同上述，莫洛亞認為友情在戀愛過程中容易變的平淡無味，且並無實際上的誓約拘束因此在維持上感到相較困難。因此針對友情與結婚之間的破綻，莫洛亞在後文如下敘述：「對女性而言，要沒有任何的動搖沉靜的觀望友人和她自己所深愛的男性幸福的生活，是需要相當偉大的靈魂。¹²⁸」「若婦人俱備極高程度的精神或是被賦予知識價值的情況，她們才可能擁有最完整的友情結合。¹²⁹」在莫洛亞的思維當中，他認為若沒有極高的精神思維與知識水準，在進入婚姻的戀愛拘束後是難以鞏固自我與友情關係的。

透過上述莫洛亞針對自我建構與友情之間不深入論述，說明人為何需要友情來平衡親情以外的情感並與社會連結，以及友情的情感產生以及延續，而友情必須接受某種形式上的拘束才能延續，在莫洛亞的見解下提出的舉例如有學校等類似家庭生活的空間拘束。總結他針對友情與自我的論述，人透過友情來呈現真實的自我，藉著共有話題或秘密增強羈絆與好友一同成長，習得尊重並確立更完整的自我。不外乎友情的發展是必須擁有相當的精神自由，但友情在女性的生命歷

¹²⁶ 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 107。筆者譯。友情も結婚と同じように、誓約を豫想するという極めて必要な思想に到達する。

¹²⁷ 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 113。筆者譯。もし反対に結婚が失敗に終わった場合には、打ち明け話を聞かされる女は再び彼女たちの役割を勤め始める。

¹²⁸ 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 114。女にとっては、彼女自身も悦んで愛したであらうやうな男性と、自分の友人が幸福に暮らしてゐるのを、何の底意もなしに黙って見てゐられるために、偉大な魂を必要とするのである。

¹²⁹ 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頁 114。もし婦人が極めて高い精神的なもしくは知的な価値に恵まれてゐる場合には、彼女たちにも最も完全な友情を結ぶことが可能になる。

程中仍然勢必是與戀愛做為比較的對象，結婚作為戀愛的具體終點與成就，然而友情並未有這樣形式上的約束途徑，因此友情仍然劣等於戀愛，當失去學校的拘束空間後友情必須透過更高度的思想與精神來達到約束，就如同莫洛亞文中引用，「偉大靈魂」換言之也能稱作強烈的「自我意識」。因此以下筆者彙整出以下六項莫洛亞所提出的友情作為自我意識之構成要素。

①透過友情達成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②友情有助於自我成長。③友情必須透過交換真實的自我（秘密）作為建立基礎。④有共通環境來拘束的必要性，若缺失則會變得經營倦怠。⑤因友情非肉體上的關係且無像婚姻上締結的關係拘束，因此友情的維持與精神性（自我意識）有關。⑥若遇婚姻的介入時必須以更強烈的自我意識來維持友情關係。

透過以上的論述莫洛亞所論述下我們能理解，友情能作為女性的自我建構與呈現的主軸。此主軸也反映於本論研究對象的〈花開時節〉其中，且透過友情的自我呈現與少女形象塑造有密切的關聯，如惠英在畢業後離開學校的共同空間拘束，面對婚姻的衝擊而必須藉著更穩固的自我意識與精神來維護友情，如惠英在故事中講述認為即將要結婚的朱映自我意識不如於自己，對於結婚的友人投注「那是一種自我迷失」的眼光不得其解。因此透過以上引用莫洛亞的敘述，〈花開時節〉中的友愛情誼便有了一番確切的解釋。即是確認，友愛情誼與惠英的自我意識的成長具有密切的關連性，嘗試維持友情是種鞏固自我意識不受現實層面影響的方法。而針對「少女」自我發展，在下節筆者將進一步論述另一部作中作，《娘時代》中的少女特質－藝術涵養之影響。

3-2-2 《娘時代》少女的特徵描寫

大迫倫子年約 25 歲所撰寫的《娘時代》一作品在 1940 年代的高等科學生的讀書傾向調查中位居第二，另外〈花開時節〉的作者楊千鶴也曾在自傳《人生的三稜鏡》中提及，該作品在當時是女學生間廣為流傳的書籍，故此能理解此作品對當時閱讀的女學生想必有一定的影響力，該作品的文體是藉由名為「セコちゃん」以及「大迫」第一人稱敘述，在故事中主角常用少女或是「おとめ / otome」等自稱方式。在經過筆者的閱讀後，分別挑選了兩項與〈花開時節〉主角惠英有關連性的部分論述，分別是「少女自我」與「藝術氣息培養」之軸心話題。因故

事內容冗長，以下簡要敘述故事內容。

3-2-2-1 少女性格描繪－冒險、自我、好奇心

在《娘時代》作品中「少女的憤慨」¹³⁰的部分，主角講述了自身對於少女的認知，主角認為世人對於少女的印象具有相當的批判性，也訴說了少女的特質大膽、自我主義、蠻橫等，相較於大正時代的少女，現在的少女卻會被指責行徑瘋狂大膽且無禮而感到相當憤慨。

在「所謂的冒險」¹³¹的小節提到，主角主張少女是追求刺激並且具備了冒險的性格，過往的少女把戀愛看似童話般純真，但主角認為已婚的女性才是喜愛冒險追求刺激，已經結婚有人生經驗的前輩鼓催著沒經驗的少女必須趁著年少時嘗試冒險，因此，當代的少女甚至會說出沒必要結婚，或是反對結婚等言論。但正因為沒有人生經歷所以才會抱持著好奇心，然而沒經驗的少女只是聽從了已經結婚的前輩的意見反而招之世間的誤解。並且，文中提到少女的不良行為如，帶電影明星的海報去學校、擁有男性的朋友、被憧憬的舞台劇演員請喝茶或交換信而被受崇拜、以及擁有未婚夫的人等等的行為，另外像配戴與他人不同的領結、胸針、不戴帽這些看似前衛（おしゃれ）的行為，到頭說來，在少女眼裡的冒險不過都是這些小事。

在「果斷的少女」¹³²的小節中，提到因為過往的少女性格較保守且如同家長操縱的人偶，而現今的少女相較爽快，然而果斷的性格容易招之世間的誤解，而主角只是單純認為，相較諂媚蒙騙他人，像少女般直率沒有虛假才是最好的，因此這部分才會被世間見解為「現實」，他認為世俗眼光應該更有雅量。少女會隨時態變遷，所以世間必須理解少女具備的時代性，然而主角仍然認為世間對少女的眼光相當冷漠。而在男性視角認為少女看劇的行為沒有意義。另外，少女在對於結婚之事抱持著相當多的意見。在自我意識方面¹³³，無戀愛經驗無婚事上門的主角認為自己的「觀念」越來越強硬自主，自我意識過於強烈，被他人說是「觀念派」（意指自我主見的思維或性格），這樣的狀況最後只會淪落不幸（文中指的

¹³⁰大迫倫子，《娘時代》，頁 67。「娘のうつぶん」

¹³¹大迫倫子，《娘時代》，頁 69。「アバンチュールとは」

¹³²大迫倫子，《娘時代》，頁 72。「はつきりしている娘」

¹³³大迫倫子，《娘時代》，頁 103。

是無法論及婚嫁)，但同時也感到空虛且自我厭惡，因此對於戀愛與結婚話題相關座談會感到相當無趣。

在「保有自己」¹³⁴的部分針對上文提到的「觀念」更進一步說明。「觀念」，換言之及是少女的自主意識或是自我，在思考的當中主角開始覺得自己越來越不像自己，越漸越主觀的傾向，當主角觀念越來越強烈的同時也深陷在自我迷失當中感到相當煩惱，並認為主觀的自己是不會有戀愛和婚事上門，同時對「主觀」之事抱持著相當複雜的想法。再進一步提到少女的未來，主角繼續說道¹³⁵，認為「少女時期這些無謂的煩惱會在結婚之後解消」，這些都是不負責的說法，他聽從結婚的朋友說道，婚後成為賢妻良母才是真正負責任的生活，然而主角認為同是無聊，但他寧願選擇少女無受拘束生活，結婚並非是他所追求的美好終點。

3-2-2-2 藝術氣息與追求夢想

有關於藝術氣息的培養與夢想，在「少女與觀劇」¹³⁶的章節當中主角有獨特的見解，他講述在當時都市少女們之間廣為流行的「觀劇（review）」活動，並強調藝術氣息能給予少女們夢想，並提供音樂教養使少女容易感性感傷，然而在學校只教授刻板學問，一旦離開學校踏出社會的話，他們對於藝術方面的知識真的就一無所知了。主角認為少女是需要藝術氣息的感化，他們崇尚藝術的世界並且沉醉在感傷的情緒當中。因此觀劇這樣的活動行為可說是少女的興趣舒壓。然而女學校方面反對女學生觀劇，但主角再次主張，觀劇時產生的感傷和悲憐是少女的精神支柱，而她們相當沉浸於舞台劇的浪漫氣氛中，因此少女藉著觀劇逃避現實沉溺在幻想裡，就能暫時忘卻博物（生物）國文等刻板科目，對少女來說舞台確實能讓少女與現實分離，越來越厭惡現實的傾向，看似是憧憬卻又相當悲哀。然而他認為少女是必須理性的理解觀劇的故事內容與現實的差距，並不能真的沉溺在陳腐的感傷當中。因此教育方也必須尊重少女們的憧憬，然而教育制度阻撓少女的感性，並認為觀劇會使少女與現實分離。主角他主張，觀劇能將少女導向正向，正因為少女的純真特質所以才能夠抱持著單純的憧憬，少女在觀劇時觸發內心的並非只有悲傷寂寞，而是在那之上至高的清純與感動。

¹³⁴大迫倫子，《娘時代》，頁 106。「自分をもてあます」

¹³⁵大迫倫子，《娘時代》，頁 107。

¹³⁶大迫倫子，《娘時代》，頁 31。

透過以上簡述《娘時代》中的兩項相關特徵，針對（《娘時代》的）主角呈現的少女形象可發現，其一是主角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與應即時代的現代性，與〈花開時節〉最大的共通點在於主角都抱持著相同的疑慮，同是自我意識與婚姻之間的抉擇問題。如《娘時代》主角主張寧可維持少女現狀也不願選擇婚姻，認為婚姻並非是女性的最佳歸宿，這點也能連貫回莫洛亞於《結婚、友情、幸福》友情與自我之建構要素⑥若遇婚姻的介入時必須以更強烈的自我意識來維持友情關係。

而針對其二《娘時代》故事中散發著獨特的藝術洗禮，筆者舉例了「觀劇」相關之內容，雖說在〈花開時節〉當中並未有具體類似的興趣提示，但與《娘時代》相同的，在故事中的散發出種藝術涵養之氛圍，在前節（3-1-2）中考察台灣女子教育背景的過程得知，學院的科目中確實注重藝術科目來引導女學生的興趣培養。因此，《娘時代》中關於對藝術世界的至高崇拜特色是筆者欲關注的重點。其中如讚揚觀劇時引發的感傷為精神依靠與清純，藝術涵養能帶給少女夢想，但教育方阻止少女們這些觀劇的行為，而為何禁止少女們這樣的行為呢。且主角指稱少女在觀劇的行為中所引發的感傷情緒具有與現實分離的特性以來忘卻現實層面。如上述感傷情緒作為一種與現實分離（逃避現實）的方式，而藝術氣息能給予少女夢想，這樣的圖式具備了甚麼樣的脈絡與意義呢，在《娘時代》中發現的此圖式提供筆者進一步探究〈花開時節〉主角惠英的自我發展分析方向。

3-2-3 作中作之影響總結

以上小節統整，筆者試論《結婚、友情、幸福》中的友情與自我意識的關連性，以及《娘時代》中的有關少女性格描繪以及藝術氣息的相關內容與特徵。《娘時代》主角的少女特徵以及陳述的思維，如同該時代背景處於民族自決的風潮強調女性自我意識之萌發，《結婚、友情、幸福》中女性友情強調自我意識的部分有相同的觀點，值得注目的是《娘時代》的主角與〈花開時節〉的主角惠英有著共同煩惱，如自我意識強烈而造成了迷惘，以及率真的批判婚姻並非女性價值的終點，面對婚姻感到不安的同時也對自我價值感到疑慮，如惠英嘗試就職不成功於是藉著友愛情誼確保少女的自我意識，與《娘時代》的主角肯定友情經營下所

獲得的存在感¹³⁷，這自我意識與友情的連結類似。但在〈花開時節〉中呈現出的友情與自我意識的關係，因婚姻與傳統的外界壓迫下具備感傷情懷的省思，友情作為認同及紓壓的出口，然而同時也呈現了矛盾又曖昧的狀態。

以上，筆者透過兩部作中作的分析後與對照能夠印證兩項事實，其一是友情與自我意識的連結，其二是藝術世界與夢想—少女追尋的理想—的線索，提供進一步分析〈花開時節〉惠英等少女角色可能追求的理想形象，而《娘時代》中提示少女們的興趣涵養—藝術氣息與追求夢想的特質，筆者認為「追求夢想」是在〈花開時節〉中未完整呈現的部分，而對此部分的論述，將於第四章針對主角惠英的自我建構與自我呈現進行更深入論述。

3-3 〈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內化規範與形象塑造

透過第二章追溯〈花開時節〉的「少女」類似特徵與創作背景，以及本章深入探討影響少女的內化要素，逐漸的可看出〈花開時節〉中整體的少女形象輪廓。

〈花開時節〉中呈現出的少女類似特徵與其創作背景有密切的關聯，少女身處在外在環境社會背景的話題圍繞在結婚話題的壓力之下，少女的自我發展受到拘束限制於婚姻與家庭，而少女期的惠英與他的友人朱映與翠苑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具有接受少女文化思潮的條件，在受女子教育並行的環境下誕生了少女的自我認同，而少女雜誌與女子教育中同是要求少女必須作為被愛、無償付出、存在於少女之間的「友愛情誼」代表了閉鎖性的特質。而如同第二章提及惠英的「感傷情懷」出自於身處結婚話題的環境中，反思自我發展不完全而顯露的情緒表現，卻嘗試的以「友愛情誼」維持在少女如此曖昧不全的矛盾狀態之中。

在本章進一步解析〈花開時節〉中的內化要素影響，在提倡性別分工的家政教育環境下，以及「參與國體一員（國民的想像共同體）」為由「自然化」「正當化」了教育其中的賢妻良母主義思想，以少女的規範名目深刻內化少女主體。筆者嘗試整理出渡部研究中提出的少女規範論，在日本的女子教育當中察覺，女子教育透過「愛情」「純潔」「美」三項規範進一步的內化少女特質。進一步試論參照台灣女子教育的部分，但因研究限制筆者未能確切考察其中是否明確存在三項

¹³⁷大迫倫子，《娘時代》，頁 93。主角認為同性間的友情間必須要有相當的愛情存在，這樣的心意是相當真摯的，並在付出情感的當下獲得存在感。

少女規範，而綜合了台灣女子教育中強調的未來作為妻職的「賢淑」特徵、傳統觀念中的貞操規範，而實際上台灣的環境著重在表面的「學歷規範」之上，藉由興趣培養包裹下的同化名目貼近日本的女性，但整體來說在台灣的女子教育之中取得學歷只能達到表現社會地位，在自我發展上依然侷限於婚姻的立足點，並非是職業的社會地位形成，以上筆者嘗試以渡部的規範理論作為背景分析參照。

在本章前半的女子教育規範的相關探討，可具體理解台灣的女子教育環境中，以特有的手段將少女閉鎖於「無償」「被動」的姿態之中，然而在自我啟蒙的部分，透過分析作中作《結婚、友情、幸福》《娘時代》這兩本著作後發現，其中提示的自我意識啟發部分別於外在環境將少女的自我意識閉鎖於婚姻之中，這兩項著作中提示了不同的少女姿態。惠英實際閱讀的《結婚、友情、幸福》與《娘時代》，其中強調「自我意識與友情的連結」部分有著密切關聯。《娘時代》之中提及關於「藝術氣息與追求夢想」的特徵描寫，透過《娘時代》主角的行為與特質進一步理解閱讀此作的閱讀者可能所受的影響，舉例如《娘時代》主角的角色特質具備了開放性，她勇於嘗試與冒險，顛覆了女子教育規範中少女的閉鎖姿態，另外在「少女與觀劇」相關分析的部分提及，「藝術培養能帶給少女們夢想」、「觀劇時產生的感傷和悲憐是少女們的精神支柱」，因此「感傷情懷」除了作為自我省思與自我辯證的連結，從《娘時代》之中的分析看來也進一步連結了「夢想與憧憬」以及「藝術涵養」等部分。以上內容作為〈花開時節〉所接受的少女形象塑造與內化要素之相關整理，在下節筆者欲進一步分析探討惠英受少女雜誌中的自我發展影響後所形成的自我建構與呈現。

第四章 〈花開時節〉主角惠英的自我建構與自我呈現

4-1 少女雜誌所提示的自我發展

在透過第三章已理解，〈花開時節〉背景的女子教育環境所培養的明確成就目標為符合國家需求的賢妻良母，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個少女角色由故事開端陸續邁入婚姻，在畢業後獲得學歷，友人翠苑決定學習縫紉，而最終僅有惠英的呈現沒有明確的未來出路，因此，作品中女子教育機關所指示出的女性成功—即是女性的出人頭地抑或是受旁人認可—在於婚姻。但在前章提及可得知，少女個體由教育體系誕生，並透過媒體塑造下補強少女之形象，惠英作為受了少女雜誌媒體影響之群體，若分析以女學生為讀者對象的少女雜誌，其中的內容會帶給少女如何的成功想像呢。

今田¹³⁸（2007）探討少女雜誌中的少女形象與行為規範，並且針對少女雜誌中登場的大人作為「成功者」進行了分析。筆者觀察了今田提及少女雜誌中提示的自我發展，進一步探討惠英在閱讀少女雜誌時可能幻想出的自我發展。根據今田的研究結果¹³⁹，少女在教育的範疇當中並未明確引導出透過學歷獲得社會地位的方式，因此有必要追究探討少女雜誌中所提示「成功¹⁴⁰」，而今田發現，少女雜誌根據時代以及雜誌種類與立場顯示出的成功者有所不同，極端的分部在「賢妻良母」與「藝術家」「明星」此兩類對立的成功者形象。原因在於分析對象之雜誌中的《少女俱樂部》，其雜誌社長野間清治的政治立場以及雜誌本身鎖定的讀者以未來成為賢妻良母的少女為對象，相反的《少女之友》《少女畫報》之中高比例的偏向「藝術家」與「明星」此兩類的成功者形象。根據今田的探討1914年代至1937年《少女之友》《少女畫報》中出現針對寶塚歌劇院與松竹少女歌劇團等特輯報導大量增加的現象，不外乎在於該兩部少女雜誌的理想女性像並非是賢妻良母，而是達成職業成就的女性。日本的都市文化的發展受到西歐的藝術的洗禮，同期間寶塚歌劇團與寶塚歌劇學校、以及松竹少女歌劇部與東京松竹音樂部之陸續設立的背景下，因此在社會的期待下出現了「明星」此類的女性像。另外教育科目中陸續出現了藝術科目教員的市場需求也促進了女性「藝術家」

¹³⁸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第四章「少女」之成功

¹³⁹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110 分析方法：考察《少女之友》《少女畫報》《少女界》《少女世界》《少女俱樂部》之目次和題名，彙整其刊載的著名女性。透過分類今田整理出以下十種類別。「1.皇族、華族」「2.菁英」「3.藝術家」「4.明星」「5.運動選手」「6.賢妻良母」「7.孝行女子」「8.勞動者」「9.運動家」「10.軍人、武士」。

¹⁴⁰ 意指出人頭地，取得社會地位。

的形象出現，逐漸轉變而出現的了象徵業績主義的「明星與藝術家」¹⁴¹。

因此，假設少年能夠藉由獲得學歷取得職業來提高在社會中的階層。若遵從教育體制所設立的最終目標，少女的向上手段只能藉由成為賢妻良母或是與地位高的男性結婚來達成地位成就，但透過今田的研究成果能發現，在少女雜誌中提示的自我發展除了成為賢妻良母外有仍其他迴路可循。如上述的以藝術能力作為手段取得社會地位¹⁴²，在《少女之友》與《少女畫報》中所出現的職業成功者多為「藝術家」及「明星」此兩種實現困難度極高的職業，都是以藝術能力作為媒介，且在藝術的領域之中依靠的是少女本身出身背景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社會關係資本此三項資本並不受學歷限制，以上條件使取得「藝術家」與「明星」的職業途徑顯示了可能性¹⁴³。

因此，在少女雜誌所提示藝術涵養，其中存在符合少女的自我發展。其必要的並非學歷，而是透過少女自身展現的女性特質所呈現藝術能力，並且，在無男性競爭對象的環境干擾又反而能獲得男性的支持，因此如像寶塚歌劇院與松竹少女歌劇團隨著日本西歐國家帶動藝術潮流興起的背景下，少女雜誌中創造了職業成功者的憧憬¹⁴⁴。但是在現實層面上少女在國家主義下已經被預設成為理想國民的「賢妻良母」，且要達成上述的資本條件成為「藝術家」與「明星」的實現機率仍然是非常低微，針對此現象今田如下論述。

因此，對一部分的少女來說能為極力改變現實帶來效果。並且她們能再次以少女雜誌上具體提示的「成為藝術家之路線」作為參考指標。但是諷刺的是，那極為少許一部分少女的成功(出人頭地)給予其他眾多少女們希望，最終造就成一極為少許部分的出人頭地與眾多的逃避現實・補強現實的過程

¹⁴¹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116-117「屬性主義的排除」。

¹⁴²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51-55。舉例如「業績主義和性別」，今田透過考察學童取向雜誌『穎才新誌』（1877年創刊）中男子與女子的投稿言論分析兩性對於「立身出世（出人頭地）」的認知。在 1882 年男女教育體制分化前，『穎才新誌』的投稿者認為透過文明開化與「業績主義（學問至上主義）」的觀念感化女子，能使女子與男子平等的藉由習得學問來達到「出人頭地」的人生目標。然而教育體系進入男女分學時代後，分別發展出「少年」與「少女」的個別性別身分認同，其中投稿者的言論也往「少女」劣等於「少年」等先人為主觀念發展。相較於「少年」能藉由習得學問提升自己的社會階層，然而即使「少女」在女學校習再多的學問也是為了往後成為人母、教育子女的母職技藝。因此「少年」的社會機能在於追求出人頭地。然而，女性習得學問的目的如果單純只是為了成為人母，目的性而言會過度脆弱，因此「少女」的性別認同被視為補強作用、「少女時代」被賦予特殊的意義。「少女」的社會機能雖是讓女性能夠維持向上習得學問的「業績主義」，但其目的仍然是成為日後的賢妻良母。

¹⁴³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118。「藝術的能力」

¹⁴⁴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120。「女流」

重複發生（再生產）。僅是如此思考我們仍然能發現這些帶來逃避現實的理想女性像具有一定的效果。即便如此，我們能用這樣的視點來思考。確實那並非具有極力改變現實的效果，然而那和現實的自身大相逕庭的「成功（理想形象）」不斷煽動著（少女）憧憬，便時常自我懷疑，進而追求不同的理想形象。¹⁴⁵

也就是說，若透過少女雜誌中的成功者形象確實提示了達成的可能性，但實際上造就的僅是少女的憧憬心理，也就是對那些憧憬產生理想自我的幻想，而另一方面少女雜誌所呈現的成功者形象在少女之間逐漸神格化的同時，追求少女雜誌中的理想像卻無法成功的少女則會不斷出現逃避現實的傾向。另外，今田探討少女雜誌中出現的成功者報導記事，其中提示「少女的成功」必要條件為兩項，其一為家人與手足的支持，其二為少女友人的精神上支持¹⁴⁶並且少女的家庭環境是以「新中間層」人口構成¹⁴⁷，明治中末日本社會效仿西歐近代國家的「家庭（HOME）」近代理想家庭像，而由這些「新中間層」所養育的「都市新中間層女子」為受少女文化影響的主要對象¹⁴⁸。

因此透過以上今田的研究結果，我們能進一步整理出少女雜誌中的自我發展，而那是一種對夢想的憧憬，能作為惠英的自我發展的可能性。在以下筆者更進一步透過整理作者楊千鶴的主體性影響，並對照惠英在故事脈絡中的女性意識變化，

¹⁴⁵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126。「このように一部の少女にとっては実現を強力に変えてしまう効果を持っていたのである。そして彼女らは再び少女雑誌上で具体的に芸術家への道筋を示すロール・モデルとなった。しかし皮肉なことであるが、そのごく一部の少女の立身出世がその他大勢の少女に希望を与えた結果、ごく一部の立身出世と大勢の現実逃避・現実補強を再生産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った。ただそう考えてもなお、現実逃避をもたらす理想の女性像には一定の効果を見出せる。というのも、確かに現実を強力に変える効果は持たなかったものの、現実の自分とはまったくかけ離れた「成功」に憧れを掻き立てられ続けることは、現実の自分（例えば主婦になった自分）を常に疑問視し、それとは異なる理想像を希求する視点をもたらす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である。」筆者譯

¹⁴⁶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122。「成功的條件」

¹⁴⁷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5-8。「新中間層」為 1910~20 年代接受中、高等教育，在近代產業構造擴大的同時透過學歷取得職業的人口，其職業多為公職、銀行員、企業職員、職業軍人、醫師等，必須是透過職業體系取得薪資，相反的傳統產業的農工商業者則被稱為舊中間層。新中間層人口其四大特徵為：①藉由腦力勞動②取得薪水③階級存在於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白領階級勞工，並④移居都市生活水準位於中層。「新中間層」之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斷增加，連帶的影響家庭像的普及。其新中間層人口所建構的家庭特徵如下，①夫在外通勤妻在家庭內從事家事與育兒的家務分工特徵，與勞動家庭不同是新中間層家庭本身並無生產機能②由妻負責子女的教育③產兒受到限制④因新中間層家庭並無家業的關係，子女必須藉由學歷取得職業，因此對子女都抱持有一定的教育熱誠（教育主義）。

¹⁴⁸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5-8。其女子擁有以下三項條件，①小學至女學校畢業前的學齡女子，且必須限定在購買少女雜誌的女子，因此女學生的②家庭必須具備經濟富裕的條件、且女子的③父母必須具有教育熱誠以上三項條件。

總整探討惠英的自我建構與自我呈現。

4-2 惠英與楊千鶴之關聯性

在本節希望藉由楊千鶴的自傳《人生的三稜鏡》中回顧創作〈花開時節〉時的個人經歷與立場之相關內容彙整出作者之關聯性，進一步探討楊千鶴在撰寫〈花開時節〉時所投射的思維與想法，以下筆者整理如楊千鶴之家庭環境、父母的影響等自我意識，透過楊千鶴所經歷的報社辭職經驗，探討〈花開時節〉主角的自我迷失狀況之關連性；以及與少女呈現相關的友情、藝術之思維，進一步對應作者楊千鶴異圖投射在惠英之創作意識。以下筆者將楊千鶴之主體性影響分為「自我意識」「少女相關的具體事例」兩項類別論述。

4-2-1 楊千鶴的自我意識

楊千鶴出生於治安平穩且女子教育系統完善的 1922 年日治中期，根據自傳提示，她所出生成長台北市南門口（今南昌街一段）及稱發展蓬勃的市都心區，為政府官員的宿舍集中地因此備有台北一中。出生於清代的父親受過基礎的教育¹⁴⁹，在楊千鶴出生時自立開拓的事業已奠定基礎上軌道，除了自身工程承包與營造事業，也擔任了「總督府評議員」等公職。出生於纏足世代未受過教育的母親曾經歷被人收作養女（但因結婚的對象夭折最終作罷）的經驗。在自傳中也能得知，因楊千鶴祖父的傳統觀念影響下本來是要將她分為養女送人，最終因年幼楊千鶴的抵抗下作罷，而後母親對楊千鶴便是百般疼愛。在楊千鶴的自傳回顧中可得知家庭概況，如下。

母親對於父親工作上的事，從不插嘴過問；但父親無論是工作現場的狀況或是工作計劃，都一一跟母親講。父親由衷以母親為人生伴侶而信賴她。或許由於對母親訴說，使他能忘卻外面的壓力，而擬出其次的計劃吧。母親樣樣都能善解父親的意思，事事都能配合著父親的情況而進行。誰都沒有看過父母親吵嘴。¹⁵⁰

¹⁴⁹ 自傳中並未詳細說明，父親出生於佃農之家但因家中必須要有人識字而推派去上學

¹⁵⁰ 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41。

母親生前她一邊兒臆想著我長大時的情景，一邊兒像口頭禪似地常說著：「女兒絕對不讓她當女醫，職業婦女一概免談。結婚相夫教子才是女人的真正幸福。」或許是因為這句話銘刻於我心中，使我對去日本留學意興闌珊。但是，從家裡通學也許會准我吧？我這樣想著。逐百般懇求父親讓我讀當時台灣唯一的女子最高學府—台北女子高等學院。事實上，要錢的時候才硬著頭皮去父親的面前，平時很少向父親開口。（中略）幸得二哥幫助說項，才得到父親的許可。¹⁵¹

作為經濟支柱的父親具有傳統之威嚴，母親因楊千鶴之前出生的女兒都分別送人做養女兒而更加疼愛她，亦能說是賢妻良母的形象¹⁵²。如前章（4-1-2）提及，作為「新中間層」人口的父母所建構的無生產機能家庭，因無家業而對子女的教育抱持熱誠，夫在外通勤妻在家庭內的家務分工的家庭背景下，且兄長歲數差距下母愛集於她一身，「通學」行為確保身體上的自主性，在求學過程中自然習得教育中的少女規範，因此透過對應家庭環境下我們能得知，環境的庇佑下楊千鶴在就學期至婚前渡過了段少女期，並在這段時期的最後創作了〈花開時節〉。然而透過自傳能見楊千鶴的強烈自我意識，筆者將之意識能分為「女性意識」與「民族意識」論述。其一，因母親與自身都曾經歷過分送他人為養女的經驗，能見楊千鶴對於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有相當的見解。

病床上的母親擔心已長大的我月信還沒來，透過姐姐們問過我幾次。來探病的阿姑像母親的代言人似的正面問我「成了女人未？」那種沒神經似的阿姑真令人生厭。¹⁵³

楊千鶴被關切生理期狀態感到不悅，「成為女人」的關心彷彿說明了女性的使命在於生育，這或許只是單純的叛逆期反應；另外楊千鶴在台灣日日新報任職期間因與同報社的攝影部發生工作上的誤會，楊千鶴認為並非自己的責任而未道歉，內文如下。

上司西川說，和攝影部關係搞壞了以後不好做事。如果是這樣，主任就應該出面當和事佬才是的。何況，要我怎麼向他們說呢？現在想起來，或許該去說聲「辛苦你啦！」也好。但當時初出茅廬，不懂世故的我，只覺得好

¹⁵¹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84。

¹⁵²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34。

¹⁵³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79。

像是受侮辱一般。「對方也不過是想看年輕女性而已吧。」不僅攝影部，連西川都持這樣揶揄的心情？真叫人氣憤。「我是記者，不是給人看臉而來報社的呀！」¹⁵⁴

面對職場的性別不平等而感到不滿，透過上述引用的自傳內容能理解，父母的影響下楊千鶴並不否認賢妻良母的傳統價值，也因母親的教誨深刻影響，意使她放棄赴日升學的念頭，但仍然能透過她少女時期以至職場的經驗理解她突出的自我並不受限於傳統。透過以下舉例能更清楚她突出的「女性意識」。

楊千鶴學院畢業後短暫的在台灣大學理農學院教授研究室工作時認識了一位名 S 之男子，兩人關係雖好但感情遲遲無法進一步發展，至有天 S 邀約楊千鶴外出，在對話當中詢問「妳結婚的話，妳爸爸會給你多少嫁妝？」讓楊千鶴與這位 S 男子絕交。而在台大當助理的這份工作在得知自己與日本人的薪水差別待遇下離職。面對 S 男子的反應說明了她不苟同聘金買賣化女性的習俗。

其二，必須注目的是楊千鶴在台日共學的環境下萌發了複雜的「民族意識」¹⁵⁵，舉例如在前文論述曾提及（第二章）楊千鶴在婚前透過撰寫〈哭婆〉隨筆替台灣習俗發聲抗議¹⁵⁶，即便改日本姓後外出採訪時仍然表態自己的台灣人身份¹⁵⁷，擔任台灣日日新報家庭文化版記者期間並透過介紹台灣料理（魯肉）與台灣出身的名人等，這些行為都能得知楊千鶴擁有強烈的台灣人意識，而最終因皇民化時期必須撰寫皇民奉工等軍國色彩記事感到不悅反感，在報社縮減版面的情況下自願離職而結束職場生涯¹⁵⁸。

4-2-2 楊千鶴的少女相關之具體事例

透過自傳中楊千鶴提示的成長過程與學校經驗，筆者彙整如下少女時期相關的事例與呈現。如女學校時期時楊千鶴在收到好友純子堂哥（未來丈夫）時被二哥斥責禁止與異性通信¹⁵⁹等實際少女規範事例。另外，在描述母親過世的片段

¹⁵⁴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119。

¹⁵⁵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75。

¹⁵⁶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106。

¹⁵⁷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116。

¹⁵⁸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164。

¹⁵⁹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80。

提到楊千鶴在家中的立場。

我被誰連帶拉地靠近母親身邊，但母親已經沒說甚麼了。(中略)母親的眼睛往上看到戰在床頭的我就停住了，家人都怪我不該站在那地方，責怪聲中我只管慟哭。¹⁶⁰

因楊千鶴本是受母親庇佑家中地位最低之么女，喪母的經驗深刻影響她，喪母後頓時失去了依靠。在自傳中楊千鶴描述自己畢業將近的回憶部分¹⁶¹，對於母親的相關經歷與〈花開時節〉相似，推測楊千鶴在〈花開時節〉中投射了大部分的個人意識，然而卻有刻意銷抹民族意識的傾向。而從小文筆甚好喜好閱讀的她，在喪母傷痛下藉由閱讀沉靜在文學，同時也藉由「閱讀」進入書中世界能讓她暫且忘卻現實。

回到沒人等我，像熄了火似的空蕩的家，我懷抱孤單，只沉溺於看書。(中略)我在這長久的歲月中，每當痛苦時遍尋求甚麼書來讀的心理，或許是失母之後的習慣所影響的吧？即便如此，能埋頭於讀書，也是幸福。從書中悲慘的情節中感受到同病相憐之安慰，在夢般美麗的愛的世界中忘了現實的苦悶。能渡過那艱辛時期，是託了讀書之福，我要感謝。¹⁶²

嘗試分析楊千鶴的「感傷情懷」，如前節(4-1)筆者以今田的論述¹⁶³探討少女能透過藝術能力來達成成就，但因實現機率過於低迷，藝術相關職業的成就者形象在少女心理神格化，最終僅留下憧憬，而筆者發現憧憬仍然有它的機能存在，也就是「忘卻現實」的機能。這樣的現象同可用來解釋以上提及楊千鶴在少女時期的少女相關具體事例。另外，根據楊千鶴本身的「感傷情懷」，在得知初戀情人已有未婚妻的回顧中，她以戲曲「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淒美故事抒發心境的寫道。

學齡前的我，連續跟著母親去看(歌仔戲)得入神，回來之後，把兩個侄子拉來當配角，自己演成「山伯英台」之主角英台，邊唱邊哭地演著。大概是那哀切的哭腔仔還在小女孩的心胸吧，我總是一個人沉醉於劇中的氣氛。

¹⁶⁰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77。

¹⁶¹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98。

¹⁶²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78-79。

¹⁶³參照前文今田論述：但是諷刺的是，那極為少許一部分少女的成功(出人頭地)給予其他眾多少女們希望，最終造就成一極為少許部分的出人頭地與眾多的逃避現實·補強現實的過程重複發生(再生產)。僅是如此思考我們仍然能發現這些帶來逃避現實的理想女性像具有一定的效果。

(中略)那脫離現實，醉入於夢幻世界的幼女時代，油然浮現。¹⁶⁴

因此，以沉浸文學故事中的感傷作為她「忘卻現實」的方式，如此的感傷情愫也透過書寫表達於〈花開時節〉之中，而透過感傷否定自我表達容易受傷，同時也能作為少女呈現自身不諳世事的純潔特質。另外，畢業後的楊千鶴仍然享受於閱讀之事。舉例如實際出現在〈花開時節〉之中的《娘時代》《結婚、友情、幸福》此兩部著作，這兩部作品之中透露出的女性自我意識都相當強烈，如前章(3-3)探討友情能作為鞏固自我的媒介，「女人的友情真的會因為結婚就脆弱地消失嗎？我曾認真地與友人議論過。那真是優閒的少女時代。¹⁶⁵」，在生長過程歷經女性在傳統社會中重男輕女的打壓下，楊千鶴以〈花開時節〉惠英投以相同的疑問。另外根據楊千鶴本人提及的友情相關呈現，引用自傳內容如下。

文代家在我家附近，晚飯後常不先預告地來訪，邀我出去吃紅豆湯等等。兩人進了冰果室，就像有共同的祕密，品嚐一下「不良少女」的氣氛。¹⁶⁶

在喪母而慟哭於絕望的黑暗日子中，異性寄來的信件溫暖了心；也與友人們明朗的心交流，織成了多感的少女時代。¹⁶⁷

以結婚作為區隔，在女學校階段她能以同儕之間的友情關係，抱持共同祕密共築了自身的少女時期，而有關於友情的呈現，同作為少女時期的楊千鶴的自我建構重要要素。在學院的課程中，楊千鶴除了一般教養的成績出眾外，鋼琴與體育（桌球）更有出色的表現¹⁶⁸，因此也能得知楊千鶴除了受文學思潮洗禮也受藝術薰陶，擁有別於上個世代的現代性身體與思維。這些都利於楊千鶴將自身的現代性體現於作品之中。

說老實話，在內心中我真正想當的是律師，而不是新聞記者。可是在當時，那只是遐想而已。若有來世的話，我願當一位與惡人對抗，為無辜受冤哭泣的弱者伸張正義的律師。¹⁶⁹

成為律師的夢想或許因她自身意識使然，同是因台日共學的背景以及台灣傳

¹⁶⁴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147。

¹⁶⁵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99。

¹⁶⁶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81。

¹⁶⁷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82。

¹⁶⁸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85-95。

¹⁶⁹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頁 117。

統社會中的種族不平等、性別不平等之環境影響了她的創作風格。

4-3 主角惠英的自我意識

在上節彙整作者楊千鶴可能投射的自我意識與少女相關的事項舉例，在本節，筆者將透過整理〈花開時節〉的脈絡，分別探討其中的環境、惠英的自我特質、以及友情與結婚等相關事件與惠英的衝突，進一步理解惠英的女性意識的變化以及自我建構與呈現。

4-3-1 環境說明與少女角色

這回一旦踏出了校門，大家勢必得依各自的命運去面對結婚或其他現實人生中的種種境遇。因此而引發出的不安與哀愁，雖然誰也沒說出口，但一直盤踞在每個人心底深處。¹⁷⁰

畢業，目前對於妳們各位來說，的確是件令人感傷的事。然而，能夠沉浸於這般心境的妳們，正處於人生無比幸福之中。感懷少女時代而引出的所有淚水，就讓它盡情地流吧！¹⁷¹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貫穿整個故事脈絡的「感傷情懷」是〈花開時節〉中少女型塑要素的重要連結，如前述曾提及，少女處於曖昧的生存姿態不斷遭遇離別的身分與環境，並且在未來她們所面臨的自我選擇僅有婚姻一途，投入家庭之中的再生產循環，因此，在該作中散發出的獨特「感傷情懷」綜合了賢妻良母主義的女子教育、台灣傳統社會壓抑與少女個體之間衝突之下製造而出的獨特氣氛。如同上述¹⁷²透過音樂老師的旁觀者觀察，少女受學校環境呵護庇佑下，由他者眼光看來少女散露出與現實隔絕不諳世事的純潔，在離開學校環境之後，少女們必須面對現實的課題，而在故事中提及的現實，就是結婚話題。在〈花開時節〉之中感傷環境的鋪排理所當然的出現，但值得注目的是惠英所散露出的意識形態。參照以下本文。

¹⁷⁰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6。

¹⁷¹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8。

¹⁷² 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8。

我們雖然不是一群容易因此動容而多愁善感的羅曼蒂克少女，但由於即將要畢業了，心理也泛起一縷縷淡淡的哀愁與感傷。¹⁷³

即便是在「感傷情懷」環境中惠英理解自己的理性，如主張我們並非容易感傷的少女，但因環境的影響內心逐漸產生了轉變。他作為理性的少女，並且開始一一觀察要結婚的同學們的情緒轉變。

鋼琴聲突然中止，老師站了起來。我們都屏息不作聲。啊！是林同學，是我們班上第一個快要結婚的同學。

（中略）突如其來地聽了老師幽然道出一番肺腑之言，同學們一個又一個感動得哭了，頓時全班都垂著頭、黯然神傷。我沒有哭，哭不出來。¹⁷⁴

當惠英觀察了要結婚的同學的情緒轉變，卻並未隨著氣氛改變自身的立場，並以理性地問道。

「要告別少女時代，開始跨入多彩的婚姻生活，幾多惜情？幾多憧憬？這些人的心中，不知正交織著多麼複雜的感情！我真想一窺究竟，了解這些已訂了婚的同學她們的內心世界。

（中略）或許，她們只不過是將「結婚」看做人世上極為尋常的一件事罷了。¹⁷⁵

舉例以上內容，惠英理解這些「感傷情懷」與疑慮來自結婚，且她的自我意識不易受外界影響，因此，在後續的故事脈絡中必須留意，惠英作為少女的經歷者，也作為觀察者以及評論者。在理解惠英的立場後，進一步探討他的疑慮，並以以下訴說的「友情與結婚」的關係探討貫穿全文。

畢業與結婚，對年輕的我們而言，似乎只有一牆之隔。還不滿一年，就已聽說有好幾位同學曾先後到學校去分送訂婚禮餅或分發喜帖等等。我也曾兩度受邀去參加了在「蓬萊閣」辦的喜宴。屈指算來，班上同學竟然已有一半出嫁。¹⁷⁶

¹⁷³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6。

¹⁷⁴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8-69。

¹⁷⁵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67。

¹⁷⁶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1。

我們三人決定在畢了業之後也不立刻改變生活狀況。並且還約定好了，將來即使有任何一人結了婚，也都絲毫不准削弱我們三人目前的友誼。

「或許，始料未及的，結婚之日突然來臨。如果婚姻美滿、成功的話，至少在某段時期內，少女之間的友情將為結婚所扼殺。因為兩份同樣強烈的感情是很難雙全並立的。」雖然莫洛亞在書篇中是如此地給「友情」下了註解，而「你認為如何呢？」

可惜，翠苑、朱映與我，都還來不及發出反駁的言論，我們就已在「螢燭之光，窗下映雪」的驪歌聲中，踏出校門了。¹⁷⁷

以上畢業後逐漸面臨的現實—結婚—與惠英試問結婚和友情這兩大對立情感之間的關係，結婚的話題作為登場角色的少女形象變化的開端。如莫洛亞提及：若非擁有強烈意識的人，一旦離開了拘束的場所便會難以維持友情之見解。必須注意，貫穿全文的「友情」要素在故事脈絡中作為惠英與其他少女角色群的自我建構之重要一環，惠英群嘗試畢業後維持友情，其作用機能可能在於意圖迴避少女自我意識的薄弱化，但在畢業離開學校拘束環境後歷經了各項課題與考驗。因此，故事中畢業之後的時間點，便作為主角群自我意識形態轉變的開端，我們在觀察主角的友情與結婚的課題與事件發生時能觀察出主角自我意識的展演。

而在尚未畢業的階段，透過惠英的描述觀察可得知班上主要的四名少女角色。而這些角色的成長與主角後續的自我意識變化有相當重要的關連。參照以下內文介紹。

我們全班的學生才四十人不到，其中由台灣同學聚成的小圈圈只以三組。其一是以頗能表達見地的謝同學（しっかり意見を言う謝さん）為首的六人小組，她們已有四個訂了婚，成績相當可觀，是屬於「好姑娘」典型的一群。另一組是我們稱之為「好搭檔」的兩人，在班上並不足以構成什麼影響力，是來自極偏僻的鄉下——偏僻得幾乎使人想不到居然也會有「女學校」的畢業生呢。此外就是灑脫不羈、讓老師應付不了，另眼看待的三人小組—朱映、翠苑與我。¹⁷⁸

以上觀察，班上同學的構成分為三組分別為六人組為多數要結婚的少女群體，

¹⁷⁷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0。

¹⁷⁸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0。

好搭擋不足以構成影響力的描寫方式也能視作為較無主張的群體作為突顯後者的主角群三人組的較強烈之自我意識。在這裡的鋪排能發現，在多數同學要結婚的環境下，這四位角色：「主角」、「朱映」、「翠苑」、「謝同學」在故事中各被賦予了自我意識較強烈的立場，因此，必須注意以上這四位角色在故事最終的呈現。

4-3-2 故事脈絡下主角惠英的自我意識變化

在本小節之中，筆者彙整故事脈絡的時間線發展的具體事件之探討，以時間線進展的事件順序為：主角姑姑介紹婚事→主角群拜訪已婚友人（醫生太太）、決定就職→主角群為送別朱映的旅行→朱映訂婚與主角離職→各角色最終呈現：謝同學前來主角家送喜餅→翠苑決定學習洋裁→朱映生子，透過以上順序並參照其他少女角色的影響性，同時觀察惠英的自我意識形態之變化。

這些同學還在上學時，就已相當熱衷於準備出嫁的事。雖然我也頗能理解她們那安分知足地、僅求片隅幸福的心願，然而也難免覺得她們太過於單純了。那麼倉促、輕易地就嫁人了，我總覺得這樣的人生像是短缺了些什麼似的，有點遺憾。

「只有妳們的三人小組，全都依然堅定不移啊！」

「沒面子，我們大概是沒人要了——。」不，其實不然，那陣子我們相當認真地在找尋「自我」，在自我的世界裡徘徊思索。¹⁷⁹

首先，在惠英評論他人的熱衷於結婚之事，能看出對於結婚價值與作者楊千鶴一致，他並非否定自身的價值在於結婚，僅是評論他人的自我意識薄弱單純，太快結婚恐會造成遺憾，但主角自身並未闡述何謂女性的真正價值。持續思考這個問題直到故事結尾的最後都未表明，如前章我們透過教育與少女雜誌影響得知少女被要求的未來出路可能在於成為賢妻良母或雜誌渲染的女性成功者形象。因此，她尋求自我，在尚未明確尋獲未來出路所呈現的樣貌也可說是混淆不清的少女自我。以下筆者論述的「少女自我」，意旨惠英矛盾的以「友愛情誼」強化自我意識，並又以「感傷情懷」反思自我之狀態。

¹⁷⁹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1。

4-3-2-1 婚事衝突

在惠英的姑姑來訪時帶來初次婚事話題，她仍然渴望保有自我，同時也開始經歷女性與婚姻之間的價值觀磨合。

女人的一生從懵懵無知的初生嬰兒時期開始，經過幼年時代，然後便是一個學校接一個學校念下去，尚且無暇喘口氣的時候，又緊接著被催促要出嫁，然後在生兒育女之中轉眼就衰老而死。(中略)果真每一位已結了婚的同學，她們都是心甘情願、同意出嫁的嗎？在旁然的心情下，哪能將終身大事給決定了呢？我渴望能靜一靜，有喘息的時間與空間，來瞭解我自己，好好審是我自己。過去二十年的歲月裡，經歷痛苦與哀傷之餘，我尚未能好好看清自己。啊，說得也未免太嚴重了吧？我只不過是乖迂，不肯順從地出嫁罷了。¹⁸⁰

主角同樣動搖於婚姻與女性價值之間的自我開始對女子教育體制出現了疑慮。換言之主角呈現的狀態為因賢妻良母化過程下造成的自我迷失狀態，卻反而責備自身的作法不符合常態。而如前章介紹下，這些壓抑來自於台灣傳統社會與女子教育規範下的自我壓迫。在故事中楊千鶴以婚事事事件引導出了代表台灣傳統社會的壓迫感、新舊世代的觀念落差、仕紳眼光、以及賢妻良母與少女之間的庇佑關係。以下提及了五位人物，分別為主角的姑姑、侄子、父親、母親、二哥。

首先，是惠英姑姑壓迫式的要求主角答應婚事¹⁸¹，姑姑提到新舊婚事的作法不同，仍然以傳統（女性價值等同結婚）的立場強制要求主角接受婚事。同時在該段落緊接著換做主角的侄子登場¹⁸²，而這邊必須注目的是，楊千鶴在自傳

¹⁸⁰楊千鶴〈花開時節〉，73 頁。

¹⁸¹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2。「妳的母親早逝，父親年紀也大了，不要再任性固執了，好好考慮考慮吧！」姑媽一口氣說個不停，打量著一直沒開口說話的我，想要從我臉上找出一絲應允的跡象。」(P. 72)「以前我們那個時代，如果有人來提親，就只有自個兒悄悄躲起來的份兒，哪能說出自己的心意？現在妳可能也不好意思明說自己的意願。妳不答應，我就當作妳已答應，來進行安排吧！」「阿姑——，請等一下，我不想就這樣輕易、毫不在乎似地結婚啊。」「就是嘛！結婚是人生大事，我也不可能將自己可愛的姪女，這麼倉促地就嫁出去呀。只要妳交給我來辦，在訂婚之前，我總會安排讓妳們兩個年輕人見見面，彼此也談談話。阿姑雖是生長在舊式社會的人，但也不打算再用我們過去那套老方式，連對方長個什麼模樣，也要等結婚當天才知道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提起婚事，體會到這古往今來，一向總是會讓人覺得面紅耳熱，難為情的事。我一邊兒聽著姑媽的話，一邊兒卻一頁又一頁的猛翻著書本。

¹⁸²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2-73。「嘿嘿！是要當新娘子的事吧？就乾脆嫁出去算了！女人家嘛，雖逞強說著大化，終歸是時候一到，一哥個毫無問題地就嫁出去了！」「胡說！」我心中充塞

中提及，他有一位與自己同歲數的侄子，因此這位侄子的角色這可能是該人物的直接投射，雖然在故事中沒有明確說明這位侄子更詳細的角色介紹，但參考自傳，楊千鶴的侄子與她出身於優渥的家庭環境，並在戰爭時期本預計留日進學高等學校。因此這位侄子的角色也能作為該時代的仕紳立場，同樣投注了女性價值等同於婚姻的眼光。然而，惠英的自我意識必須考究父母給予的影響性。參考以下段落。

自從母親去世以來，我與父親的關係，可以說，除了當我需要錢而向他開口的時候以外，是缺少了一般父女親情所該有的溫馨對話。這或許是因為父親具有古老的傳統觀念，不想對女兒表露關心。再者也因為我曾是母親的寵兒，過去只纏著母親，在母親無限的關愛下，自由的長大，一旦母親去世了，似乎突然變了個人，在家裡也不願多說什麼話了。¹⁸³

以上我們可得知，惠英所生長的家庭環境因母親過世前處於近代社會下普及性別分工家庭，父親作為經濟生產機能、母親作為家庭再生產機能的環境中主角大部分在母親的庇護下成長。以及在婚事事件的後續是透過惠英二哥代為拒絕父親，這樣的說明也能察覺主角身處強烈父權支配的環境，母親作為賢妻良母的角色並非與主角少女的角色對立，而是形成了母女之間互相補足的角色關係，賢妻良母庇佑少女的存在，而少女學習未來成為如同母親的角色，在未來少女也會成為疼愛庇佑兒女的賢妻良母。然而在故事中主角並沒有庇佑她存在的母親，這也是楊千鶴本人的投射。

而在透過婚事的話題，惠英數度透露與父親的意念不合或是互不理解的關係¹⁸⁴，並且為回應父親的關愛與期待險要答應婚事安排¹⁸⁵。這裡的段落安排顯然能作為少女與傳統社會的僵持關係以及隱喻傳統性與少女的不安心境，而惠英

了太多的感受，還不斷地澎湃擴張著。沒工夫去理他，也懶得為他那自以為是的一派胡言發脾氣。「對像是誰？我知道了，是醫生，對吧？我去找個學長幫妳調查調查如何？」「囉嗦！別來煩我了。」「是，是，我的大小姐，就讓妳自個兒慢慢地去煩惱吧！」

¹⁸³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4。

¹⁸⁴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4。可不知父親他自己是否也疼愛著我這女兒呢？受現代教育的我，當然也期望能像其他同學那樣，與自己的父親能互相溝通、親密地自由交談，或者向他撒撒嬌、耍耍西的。我多麼渴望父愛能如此表露出來，因此竟連不該置疑的父愛，也沒把握了，而胡鬧猜疑起來。

¹⁸⁵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5-76。妳姑媽也告訴過你了吧。那門親事我是贊成的。穩重、可靠、認真、肯上進的青年，是可以託付終身的對象。至於財產，那不是問題。對這件事，妳不可再像以前那樣任性固執了。（中略）父親的話，流露著多麼親切的關愛，使我下定了決心，好吧，就出嫁吧。這回我不能不拋開以往那些莫可名狀的猶豫了。

所提到的「莫可名狀的猶豫」作為他尚未釐清的自我意識。而身為新世代立場的二哥對於惠英的婚事表達以下立場。

我倒不認為妳的心境該歸諸於少女莫名的感傷。雖然妳不會當面對我說出什麼，但我們是血脈相連的兄妹，我對妳的性格十分瞭解。縱使你的朋友們，在茫茫然的心境下也可以論婚嫁，換做妳就不一樣了。妳是不是可能簡簡單單地就甘願接受的。雖不能說妳這樣子是好的，但畢竟那是妳的本性。大概在某種程度內，順著自己的本性行事好吧！妳說為了不讓父親為妳操心而決定出嫁，其實那是大錯特錯了。對父親以及對我而言，無非是期望妳能終身幸福。如果妳能真正得到幸福，我們才能安心。¹⁸⁶

二哥與父親作為新舊世代的對立關係，但二哥的表態中能理解他察覺主角不同於同儕的自我意識。但傳統倫理秩序的家庭環境下，喪母的惠英並沒有發言的權利，作為新世代代表的二哥提到「無非是期望你能終身幸福」，二哥的角色能尊重主角的人格發展，而觀念仍然認為女性的歸屬最終仍然為家庭。而在此段落惠英數度顯露出的感傷與尚未釐清的自我（發展），其中的少女特徵與「感傷情懷」的機能性，筆者待後續自我呈現探討。

4-3-2-2 拜訪結婚的友人與主角就職

惠英在第一次婚事的衝擊下，嘗試的理解自己但仍然處於無法闡述自我的狀態¹⁸⁷，而友情的維持在該段落仍然為少女自我的重要建構要素，主角除了透過友情來聯繫與維持¹⁸⁸，更與朱映與翠苑嘗試透過造訪已婚有人家來理解女性在未來將成為的「主婦」形象。內容引用如下。

她還說「有了家庭仍然和學生時代一樣，最盼望是星期天的到來！可以去看電影、去郊遊野餐，真是最快樂不過了。歸途順便去片倉街吃壽司，喝

¹⁸⁶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6。

¹⁸⁷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8。那麼，我們又真正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這「待字閨中」的少女歲月、姑娘時代呢？雖說那正是我們自己的親身體驗、眼前的感受，但真正要我們觀察出什麼具體形式，或要說出個所以然來，卻是件相當困難的事。只知我們是身處於「沿襲古風」與「趨向新世代」的夾縫中，受到兩者之間的一層強烈的摩擦力所羈絆、網套。

¹⁸⁸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7。我們在畢業後大約每個月相聚一次，一起去看電影，互相交換書刊來看，情形似乎與以前在學時差不多。只是彼此見面的機會要比原來所預期的少了很多，總覺得是一項缺憾。但是，能有這樣的聚會，已經著實的滋潤了我的生活。

熱騰騰的『番茶』。個中樂趣，若非置身我這樣生活的人，也許不容易體會到的吧。」「但是每次付錢的時候，都得付兩人份，所以五圓左右的零用錢就像插了翅，一下子就花光了呢。」聽他補上這樣的一句，十足已成了個打著經濟算盤的標準家庭主婦。接著她又說，這陣子似乎變成愛看「榎健（エノケン）」「綠波（ロツパ）」等的喜鬧劇，以及「刀劍武打」之類的影片了。他繼續跌跌不休，幾乎是專等著我們這些好聽眾來讓她能以「結婚先輩」的身分大談一番，過個癮。

首先，透過惠英的觀察能理解，他們探訪的這位準備成為人母的醫生太太，她對於電影興趣的品味有明確的轉變。參考洪郁如¹⁸⁹將故事背景的女子高等學院的教育之文化意義定義為：其一摩登文化與自我表現上、其二高度化家政學之吸收、其三「自由校風」與自我意識之提高，此三項含意上。關於摩登文化與自我意識的相關培養，如不涉及化妝與燙髮限制以及涉足電影院之事，讓學生能體現自我表現，並確保女學生們學習、消費與表現摩登文化之自由空間。且重視所謂「電影教育」，藉由電影觀賞要求學生提交報告，並描述劇情以及內容問題所在加以深入分析等課程規劃來達到培養獨立思考之能力。而透過惠英在文中的敘述呈現，這位醫生太太在婚後轉向觀看榎本健一與古川綠波主演的電影，此兩位為該時代著名的喜劇演員，雖無法確認在校時期所觀看的電影類別，而電影興趣類別的轉變可推測為婚後育兒等觀念影響，且在家計使用上必須考量現實等層面的呈現，惠英持續觀察著這位醫生太太，並發現了她與同儕時期的形象轉變。

我們每次若想要一探究竟、瞭解結婚之後的生活情形，便相約一起去台北大橋附近這位醫生太太的家。我們的目光四處打量、暗中觀察，結果發現到她近來已不如剛結婚時那麼注意打點自己的衣著及收拾屋內的東西了。

（中略）妳們三人都趕快結婚吧！人生真正的苦樂滋味，盡在其中呢！」

我們東拉西扯，聊個夠了之後，正準備要起身回家時，這醫生太太常以老氣橫秋的口吻，又加上那樣一句奉勸的話。

「真是的，她以為我們每天盡想著要出嫁的呀！沒意思！」我們真大不以為然。

¹⁸⁹同註釋 111，頁 178-182。

「不管怎樣說，妳們確是正處在如花似玉的錦繡年華呢！既沒有柴米油鹽的煩憂，也無需為公婆費心，逍遙自在，什麼問題都沒有。」

有時這位醫生太太也會嘆口氣，吐露出這樣的真心話。

但是那時她也必定不忘記又再加上一句：「但是，未結婚的妳們，還不能算是成年人哩。」¹⁹⁰ (P.78-80)

如上述內文，透過惠英的觀察下我們可以理解這位已婚的醫生太太的意識形態，她的女性形象處於「主婦化」的過程中，且透漏著女性等同結婚的價值觀，即便理解現實（傳統與經濟）層面的壓迫仍然主張結婚才是成功，然而主角群尚未苟同這樣的想法。而經歷拒絕婚事以及窺探友人的婚後生活，主角更進一步嘗試了尋求自我的行為，也就是就職。內文如下。

自從踏出了校門，這一年內，我真是沒甚麼長進，毫無收穫可言。縱然我不會特別打算要去獲得甚麼，但也不無感到心有未足的一份空虛。為了鞭策自己，給懶散、缺乏幹勁的自己注入一股新活力，於是我想到要出去找工作做。(中略)我本來就已明白，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是不會喜歡讓女兒出去工作、讓人說閒話的。但我已下定了決心，從此不再去擔憂左鄰右舍會頭來什麼目光而受拘束，要明確地決定今後自己的生活方式。父親是頗在乎周圍眼光的老人，但他並不如以前那樣固執，也已漸漸地能跟我交談幾句了。¹⁹¹

惠英因維持在待家狀態多時而感到空虛，決定突破一直混淆不清未定位的自我而就職，在該段落並未說明尋求的是何類的職業，而〈花開時節〉為楊千鶴離開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者工作後所創作的唯一作品，在這部分的寫照也與作者的處境一致。而如同在 2-3 介紹台灣傳統社會背景提及，女性在教育中強制灌輸的賢妻良母化的規範下，在旁人的眼光下受投注了奉獻家庭的期待，在台灣傳統文化中默認女性唯有藉由透過婚配媒介才能受傳統社會認可等原因，女性若離開家庭踏入了男性主宰的職場，容易受到他者的異樣眼光注視。然而惠英仍然決定透過這樣的機會來突破自我。而這邊也需注意，惠英的父親軟化的姿態，用意可能在於對於傳統社會的未來期許。而在惠英決定要突破自我的同時，友人朱映卻也決定結婚與她走向不同的方向，朱映決定結婚也作為她自身的少女自我轉變的開端，

¹⁹⁰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78-80。

¹⁹¹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1。

因此主角評論了朱映的自我意識不如她自身強烈¹⁹²。而在朱映告知決定結婚後發生的兩個段落（以時間線整理）出現了 2-2 說明的少女特徵，分別是充斥「感傷情懷」的「送別旅行」與惠英出現「友愛情誼」表現的「朱映訂婚」，在這兩個段落當中惠英的少女自我有明顯的起伏，最終進而影響決定離職。以下說明。

4-3-2-3 送別旅行

那是一個刮著強風，風砂吹得叫人睜不開眼的日子。我們三人去八里海水浴場玩，也當做是歡送即將要結婚的朱映。幸好還未入夏，所以遊客並不多。我們斜躺在海濱休息所的藤椅上，飽覽眼前一望無邊，海闊天空的景色，那怡人的藍色淡水河，以及海浪沖擊岸邊所激起的白色浪花。或許是因為前來八里的途中，我們所搭乘的公車曾發生故障，以致一路顛簸過來而頗為疲倦吧，那天，我們總覺得心情特別凝重。籠罩於心頭的一片感傷，似乎要比當年踏出校門時更沉重。三個人都只是靜靜地躺著，久久沒有人開口。

在送別旅行的段落中，主角群三人一同到了八里海水浴場遊玩。決定要結婚的朱映為惠英與翠苑的少女自我帶來明顯動搖，段落開端至結尾充斥了「感傷情懷」，主因來自前述，友情與自我鞏固的關連，在這個階段的惠英的自我仍然以友情作為主要構成元素。朱映朝向賢妻良母化前進的決定也使主角感受到她的自我認同的變化，透過不捨與分離的情緒表現在整體的「感傷情懷」之中。雖然朱映由少女轉向朝賢妻良母前進的決定是符合台灣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期許，但這與惠英仍然保有疑慮的女性意識背道而馳。故事中對於少女的存在價值如下提及。

（主）「喂，專程來到這裡了，難道不到海灘走走，看看嗎？」

為了排除沉悶的苦楚，我迅速起身，做著準備，同時也邀她們兩人同行。翠苑卻說她不想去。她這個人，今天來的時候，就已開始有點不太對勁。

（主）「為什麼不去？」

（翠）「浪不是太大了嗎？」

¹⁹²「來商量也似地，她就這樣子說出了這天大的消息。聽她的口氣還十分乾脆的嘛！雖說我們三人都有容易受感動的共同點，但就「自我意識」的強度而言，朱映不像翠苑與我，她總是不常表達出自己的主張。」（P.81-82）

(主)「啊呀！沒關係的啦。只是沙灘上走走而已……難道妳怕會死掉？」

(翠)「如果只是妳和我死了，那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如果是朱映，那就可憐了！」依然是意氣消沉的聲音，沒有一絲而笑意。

(主)「啊，不要鬧彆扭了嘛！我自己現在也還不想死呢。天空那麼清澈，而妳的心境為何這般陰霾？」

朱映一向話就不多，聽著我與翠苑這樣的對答，也一直沒插嘴，只是默默地打開手提籃，開始拿出衣服，作著準備。

(中略)那天的淡水河，風浪洶湧。我倆走過的每步腳印，立即被陣陣強風吹散得了無蹤跡。我們根本停下腳步。不知是因為被強風往前推送著，還是被自己內心不平靜的情感所驅策著。口裡咀嚼著吹入的風砂，心頭回味著消縱即逝、虛無縹緲的少女時代。

不是對那急將要出嫁而離去的友人有所不滿，少女之間的一份友情，必然是抵擋不住結婚浪潮的沖擊，而一下子就動搖，真是脆弱得可憐，令人心裡難過。其實也不全是因為「友情」遭「結婚」所摧敗。聽朋友說要結婚時，大家雖然口頭說著對她祝福的話語，一絲寂寞卻也同時悄悄地潛入心底。坦白說，那就像是被丟下、遺留下來的一份落寞吧。難免會覺得這樣，大概是因為少女看著自己每日過著漫無目的的生活，總是會對那樣的自己感到可悲又可憐的。」

(中略)我好像禁不住非要奮力做點傻事不可，突然間開始一個勁兒踢著腳邊的石子。踢著、踢著，結果變成是用腳的大拇指在沙灘上寫了「友」字，下面又加了個「情」字，並且兩眼也牢牢地盯著這兩字看。但是，這兩個字不一會兒就被強風吹得消失了蹤影。於是，不知不覺中，我們兩人便與風競賽也似地，一遍又一遍地猛在沙地上寫著「友情」這兩字來。¹⁹³

透過以上的分析可見主角群的少女形象的轉變，然而這時的主角因一度的就職自我暫時擁有了歸屬感比翠苑帶點理性，參考翠苑的說詞，她認為未婚的自己和惠英的價值比不過即將要結婚的朱映，而朱映也默認了兩人的情緒轉變，在這段落中三人的友情表現因受到朱映將結婚的影響「友愛情誼」突顯而出。在故事

¹⁹³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8-92。

開端，主角群以莫洛亞的疑問嘗試維持友情的經營，透過莫洛亞的理論，我們得知透過友情可達成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並進一步達到自我的成長，而在女性進入家庭婚姻後易因家事再生產的環境下難以維持這樣的關係，如同莫洛亞提及，婚後的友情除非擁有更強烈的自我意識否則難以維持。因此在朱映的少女自我轉向賢妻良母化時，惠英出現了抵抗的行為，不只以「感傷情懷」反思辯證少女自身的價值，並以海浪作為婚姻的描寫描述代表少女自我的友情已經薄弱不堪¹⁹⁴，在該段落充分表達了少女的生存姿態介於女學生與結婚之間，她們因不屬於任何一方，未有明確的歸屬感而出現了自我的動搖。

4-3-2-4 朱映的婚禮與主角離職

在這段落透露的信息可得知朱映為單親母女家庭¹⁹⁵，朱映母親抱持著女性價值等同婚姻的傳統觀念，這也或許是朱映成為主角群中最先決定邁入婚姻的理由。同時也可對照惠英自身為喪母的立場，仍然能依靠父親支撐的原生家庭。

接受友人即將出嫁的惠英，在進行到朱映的婚禮的片段能見她明顯的「友愛情誼」。惠英觀察著朱映的自我逐漸朝向婚姻，對於女性最終必須依附婚姻感到疑慮，並且對照著傳統婚姻禮俗中買賣化的過程進而感到不滿。

「昨天睡不著覺的關係。」朱映有氣無力地說。她那樣的聲音，像是對這匆匆來臨的婚事所產生的莫大感觸，似乎是認命地喟嘆著「將來所有的一切，從此就這樣被決定了」。我擅自如此忖想。¹⁹⁶

朱映的親戚——大概就是嬸嬸吧，正幫忙著清點聘禮的數量，她那機械性、不帶任何感情的聲音，相當大而刺耳。隨著一層層疊高了的物品，朱映的人也好像是一節節被取走了，我禁不住有這樣的一種錯覺。¹⁹⁷

¹⁹⁴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90-91。「只要妳自己能過得幸福，我想誰也沒理由說什麼閒話的。人生無非是要追求幸福，可不是嗎？幸福或許就像是長著翅膀的青鳥，當她飛近我們身旁時，不及時抓住是不行的呀！」那陣子，我剛開始忙著上班，才能說出這番勉勵的話來，平日的我，是反倒需要別人鼓勵的呢！」

¹⁹⁵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3。「我就只有她這麼一個女兒，為了她，我總想竭盡所能地去做。不過，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要做到讓她能比得上人家，畢竟是不容易。雖說嫁到那裡並不是十分理想，但總算能有個歸宿、安頓下來，我也可放心了。」

¹⁹⁶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2。

¹⁹⁷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3。

朱映她本人，倒是沒什麼特別表情地與我們一起望著一箱箱的禮餅盒漸漸疊積如山。我對這樣的她有些不滿。另外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到不滿。當她在客廳裡被戴上了訂婚戒指之後，回到房裡來，那時我們覺得她的命運就此被決定了，而不禁傷感，卻看到他嘴角掛著微笑，眉宇間掩不住欣悅，確實是一副喜不自今的模樣。為什麼會是那樣的心情？真令人費解！我想有一天該好好問問她。¹⁹⁸

朱映在該段落為少女自我轉化朝向賢妻良母化的階段，並且接受傳統婚姻禮俗的買賣化剝削了作為朱映女性的自我，然而透過主角的觀察，她認為朱映對這些事物背後的女性買賣化本質未有自覺而感到不滿。而朱映在戴上戒指後也說明正式納入夫家，接受傳統的價值觀，感到幸福的模樣代表了朱映的自我選擇了婚姻的歸屬。

筆者在 4-1 藉由今田的探討我們能理解少女的自我追求方式與成功，雖然在〈花開時節〉之中無法確認主角的少女自我是否有追求與想成為的目標，而作為少女雜誌的消費群體的惠英在追求閱讀雜誌媒體中出現的成功者形象，會進而產生憧憬的心理，這樣的憧憬幻想以藝術能力為手段，而為了持續憧憬或在未來可實際追求成為那些成功者的形象，首要必須的就是保持自身的少女自我、並且得到家人與少女友人的支持，而那憧憬的對象也作為理想的自我。藉由這樣的理論能猜測惠英的心理，在友人不斷賢妻良母化的過程中，她或許期許友人能維持在少女自我的狀態，互相鼓勵追求理想的（未知的）自我，因此面對逐漸失去少女自我的友人出現了「友愛情誼」。在朱映的訂婚儀式後主角選擇了辭職時，如此提及。

至於我的工作，當初我決定要開始去上班時，意志是那麼堅定，是懷著滿腔熱血而去的。事實上我也因之得了一些磨練，使我有所長進。但是半年多以來，我又覺得透不過氣來，而把工作辭掉了。這並不是因為年輕姑娘做事不能專一，或態度散漫，其實是因為有種種的情況使然。然而，我就職上班之事，畢竟是如同女性一般的「暫時就業」那樣的結局，而沒成為終身的志業。

「辭職的直接動機為何？」

¹⁹⁸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3-84。

當初我上班已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住在外地的二哥才得知消息的，那時他並沒有特別說什麼。這次當他回來台北，發現不稍久我竟然沒對他說什麼又已經把工作辭掉了，不今感到意外，便找我來問個究竟。

「因為似乎快要迷失了自己。」

「啊！那麼辭掉也好。」

既不是玩笑，也不是太認真，二哥輕淡地說了這句，而沒繼續追問。¹⁹⁹

惠英離職的理由並未在文脈中透露，但參照作者的經歷，在男性主宰的職場存在了性別與民族的差別待遇，且備受男性的眼光看待以及台日同事之間勾心鬥角，在戰時體制下皇民化的滲透逼迫他不得不撰寫違背自我意識的報導因而離職，不過也考慮因戰時體制的言論管制，楊千鶴在這方面的呈現有所保留而未透露而只以迷失自我的理由婉轉提及，而必須注意在這之後二哥詢問主角辭職理由時的反應，雖然尊重主角惠英的自我意識卻採取了默認女性最終必須待家的立場。

4-3-2-5 結局—各少女角色的最終呈現：楊千鶴的創作意圖

在故事結尾，我們可透過惠英的觀察可看出主要少女角色最終的變化與呈現。學院畢業兩年後的某天在謝同學未主動告知自身也要結婚的來訪，惠英成為友人群中被遺落下的立場。在後續到結局的段落惠英並未有像前述的內心浮動與描寫，而在送別旅行曾經否認自身少女價值的翠苑有了明確目標決定學習洋裁，結局在朱映生下男嬰結束，在歡樂氣氛下未婚的惠英與翠苑向著男嬰的未來投以期許。最終，除了惠英以外的三位少女登場角色的自我最終都尋獲了歸屬。而值得注意的是，與惠英要好的兩位友人朱映與翠苑分別朝向了「賢妻良母化」與「追求憧憬」的兩項目標。作中以大部分篇幅描寫了惠英觀察著友人朱映逐漸邁入婚姻的變化，並僅以簡單提及帶過。而關於翠苑追求「研習洋裁」的目標，在該時代學習洋裁在未來出路可成為家政相關領域的教職員或是職業女性，因此翠苑可以追求「研習洋裁」這項目標作為夢想憧憬作為她在故事結局的自我呈現。而唯有通篇故事的情境觀察者惠英的最終呈現停留在不明的狀態，她目睹著友人們的賢妻良母化（醫生太太、朱映、謝同學）與追求夢想憧憬（翠苑）的轉變，依然維持

¹⁹⁹楊千鶴〈花開時節〉，頁 84。

在混淆不清的少女狀態。然而在透過脈絡的觀察發現，惠英在受他者眼光都認定女性價值等同結婚的看法以及友人群的變化過程，她的女性意識由最初的抱持疑慮、排斥與逃避、嘗試理解、進行突破、迷失、最終在默認朱映婚後幸福生活的結尾結束，我們並無從得知惠英的自我在最終階段的抉擇，而這也可能是作者楊千鶴刻意留下的課題。

筆者嘗試對照楊千鶴本人的經歷與他的出身環境，關於〈花開時節〉中的惠英的意識呈現皆與楊千鶴本人的女性意識有極大的關連。透過自傳《人生的三稜鏡》中可判定楊千鶴所受母親的賢妻良母影響與過往的教誨，因此並不否認「結婚即是女人的幸福」這般的女性價值，而針對故事中呈現的婚姻與女性自我價值的相關探討與也可能投射了楊千鶴於幼兒時期歷經的養女風波，以及自身曾被提問聘金與男性絕交的事件，使他對女性的傳統價值抱持了疑慮，曾經的職場經驗受男性眼光注視下所培養出的女性意識也反映於〈花開時節〉之中，全文藉由探討「少女的自我定位」話題探討，楊千鶴也透過書寫並將迷網投射於作品之中。

而在該時代的教育風氣踏入重視女性的個人人格的階段，但仍然是透過家政教育的名義下正當化了將女性局限於家事再生產的勞動力上，在社會背景與教育中賢妻良母至上的風氣推使下，〈花開時節〉的結局呈現默認友人朱映成為賢妻良母幸福與價值，以及在對照楊千鶴母親給予她的賢妻良母的價值觀，使得當我們在觀看故事結局所停留的印象在於惠英的女性意識呈現終究回歸默認女性傳統價值上。以上作為楊千鶴欲投射〈花開時節〉中的意圖，關於惠英的自我建構與少女的呈現，於下節說明。

4-4 惠英的少女自我建構

在以上筆者嘗試彙整惠英的自我意識的脈絡變化，惠英作為觀察者發現了友人由少女自我的明確轉變，如表格中友人朱映、醫生太太、翠苑、謝同學這四位角色皆有明確的目標。

由惠英看到的友人變化	
朱映	結婚，在故事中經歷結婚、生子。逐漸賢妻良母化。
醫生太太	已婚，注重現實層面，電影品味改變。
翠苑	學習洋裁、追求憧憬。

謝同學	結婚，與惠英的話題逐漸跟不上。
-----	-----------------

表：筆者整理

身為少女的惠英觀察著友人的變化，而由友人身上看到的目標可明確分為兩大項，其一為「賢妻良母化」、其二為今田研究所提示的「追求憧憬」。而我們能推測目睹這些變化的惠英，她的出身背景以及所受的環境影響與內化因素，參照這些內外要素，能推測惠英的自我建構。

首先有關於惠英的家庭環境與背景。對照惠英的父親從事監工職責母親早逝，在為家中位於無經濟負擔的么女，在故事脈絡中能得知惠英自身的家庭環境俱備了相當的經濟資本，其家庭的背景給予支持作用，惠英在優渥的環境中能自由的在學校習得學問，並且獲得暫時的少女身分。而少女與賢妻良母互相作用的關係性，就如同賢妻良母的形象造就了被呵護疼愛的少女形象出現。

但是少女獲取學歷主要目的僅侷限在確保婚姻市場，同樣他們的自我發展被侷限於其中，在透過第二章彙整外在環境的自我發展提示與第三章的內化影響的自我意識啟蒙，以及筆者推測的惠英可能選擇的自我發展，筆者嘗試歸類了〈花開時節〉中可能發展出了兩項女性未來出路。然而考量惠英的最終呈現並未詳細透漏，在〈花開時節〉中能分類出三項少女的自我呈現。

<p>〈花開時節〉中提示的自我發展出路</p> <p>透過教育引導出的自我發展出路①成為賢妻良母</p> <p>透過少女雜誌引導出的自我發展出路②追求憧憬（但必須保持少女身分）</p> <p>→惠英的③未知狀態</p>

表：筆者整理

其一，是女子教育與社會期待成為符合傳統社會價值的賢妻良母；其二，則是〈花開時節〉中並未明白透露的部份，也就是受少女雜誌之影響持續追求夢想（憧憬），然而惠英在最終呈現的為其三的未知狀態，而惠英的立場為仍然觀察著①②後，仍然維持在迷失的少女自我。

而筆者在（4-1）曾藉由今田的言論推測少女能以憧憬心理追求理想自我

之理論，其必要的條件為「持續保持自身的少女身分，獲得友人與家人的支持，才可進一步追尋藝術相關的成功者形象」，如同今田提及，「那極為少許一部分少女的成功（出人頭地）給予其他眾多少女們希望，最終造就成一極為少許部分的出人頭地與眾多的逃避現實・補強現實的過程重複發生（再生產）。」而台灣的女子教育致力於培養少女的藝術能力，同時也強調透過藝術涵養意圖將女性塑造為「日本的女性」，而藝術涵養也與興趣培養結合成為了少女的日常生活。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教育如此的塑造意圖仍然局限於輔助男性的角色，舉例如〈花開時節〉中主角群探望的醫生太太已變質的鑑賞電影的興趣，以及翠苑在最終呈現預計學習洋裁的意願，皆能作為美規範與藝術培養的線索，因此在我們能理解藝術能力能取代教育體制中的「學歷」表徵作用，透過藝術能力進一步朝向某種理想形象的憧憬，能作為成為賢妻良母以外的自我發展出路。

而如同惠英在通篇故事中呈現出追求著不明的自我的少女樣貌，在這樣的分析脈絡下筆者發現了第三項《花開時節》的少女特徵，也就是惠英重視的「自我憧憬」特徵。在透過如上推論後，我們能理解惠英的自我認同之構成受各種因素影響而錯亂複雜，具體由「感傷情懷」「友愛情誼」「自我憧憬」這三項少女特徵建構而成，而這三項特徵在呈現上所具備的機能以及背後之涵義筆者以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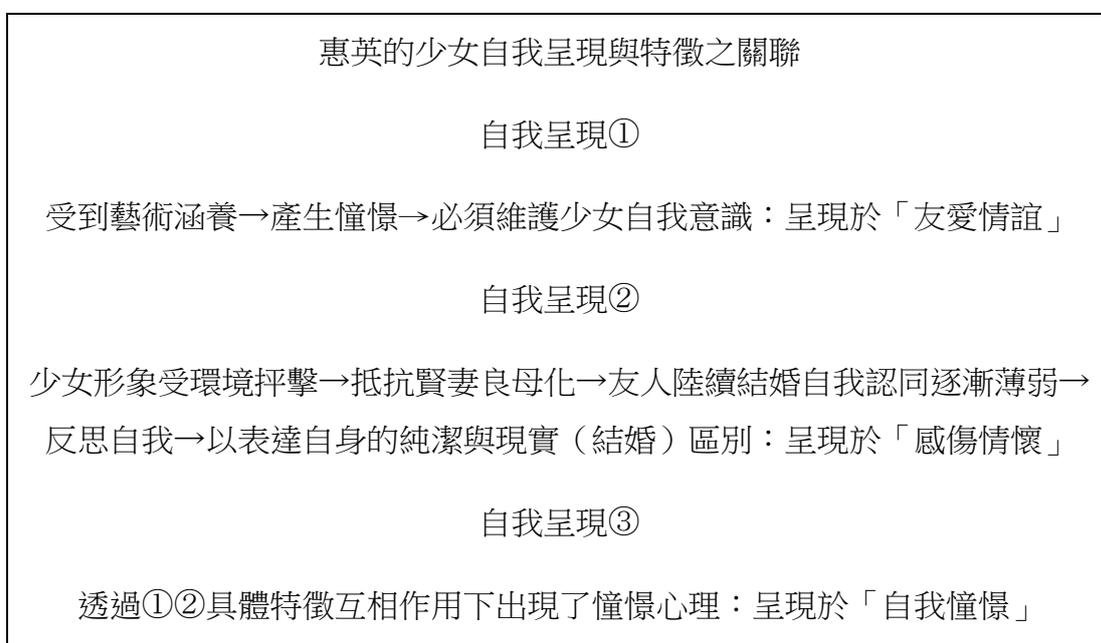
4-5 主角惠英的少女自我呈現－感傷情懷：友愛情誼：自我憧憬

關於主角惠英呈現出最主要的「感傷情懷」與「友愛情誼」特徵的脈絡，筆者曾在 2-2 假設了此兩項少女自我呈現，「感傷情懷」出自用意於反思與辯證自我，並透過「友愛情誼」鞏固自我意識，於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過程探究了少女形象塑造與內化規範的過程，我們理解了影響主角惠英的少女自我的內外因素，

並且，少女的自我建構與傳統社會環境對女性的訴求有極大的關連，透過這些外在環境訴求的名義下正當化了填鴨式的內化教育，如 3-1 渡部的少女規範論提示，少女被塑造為被愛、無償付出的立場，作者楊千鶴歷經了規範教育以及吸收了文化思潮，並且也吸收了深刻影響作品本身的《結婚、友情、幸福》《娘時代》之思維，透過這兩本作品之中的自我概念洗禮，惠英所投射出的自我意識突

顯且別於其他登場的少女角色。楊千鶴所經歷的個人經驗與裏外環境影響，透過半自傳性質的〈花開時節〉中的惠英呈現，能作為楊千鶴在當時代的真實心理投射。

而在故事的結尾，惠英呈現的自我狀態仍然呈現在少女的狀態，我們不得而知他欲追求的自我發展為何，上節提及這可能是楊千鶴欲投射的該時女性處境與期許，但我們必須專注的問題在於惠英受國民化（賢妻良母化）的影響後造成的自我矛盾狀態。而「感傷情懷」與「友愛情誼」這兩項機能與惠英所追求的「自我憧憬」有密切的關係。透過筆者整理以下表格，將「友愛情誼」視為維護少女自我意識之機能、「感傷情懷」視為區隔現實、創造少女的自我世界之機能，最後進一步探討惠英自我追求的可能性。三項自我呈現概要整理自以下圖表。



表：筆者整理

4-5-1 友愛情誼之機能—鞏固自我意識、少女自我的歸屬

在前文的鋪排下可得知，惠英的「友愛情誼」意涵了少女之間的閉鎖特徵，而這樣的閉鎖性也與少女被動，在女學校環境中培養出與結婚現實區隔的純潔性格，而「友愛情誼」的脈絡來自於《結婚、友情、幸福》與《娘時代》這兩本著作中的自我意識影響，整合莫洛亞強調友情與自我意識萌發的重要性，以及《娘時代》主角的強烈且突顯的自我意識，因此，惠英呈現的「友愛情誼」其機能性

在於維護少女自我，嘗試將惠英的自我意識變化過程排序開來，由最初結婚的現實難題出現時並以維護友情的方式探究自我價值，以及如遇朱映決定結婚時質疑他的自我意識強度，因此出現了不解的心態，而一度依靠就職來尋求自我歸屬，以及送別旅行片段提及惠英認為「友情」遭「結婚」所催敗，朱映的自我選擇走向了婚姻，因此「友愛情誼」來自於維護自我的機能運作，「友愛情誼」也作為變動不定的少女，她們暫時性的自我歸屬。

4-5-2 感傷情懷之機能－區隔結婚之現實、創造少女的自我世界

關於「感傷情懷」在故事中主要出現在兩大場景，第一是畢業時刻、第二是告別旅行的場景，這些出自於不完整的自我發展之外在環境所衍伸而成的分離感，而分離感也扣合了少女縹緲消逝的曖昧生存姿態，在畢業時刻中惠英以旁觀者觀察即將結婚的同學，她的理性隨著氛圍感化，並在送別朱映的旅行中以「感傷情懷」懷疑少女的存在價值。若我們將軸心話題的結婚視作現實，「感傷情懷」的機能作用可在於區隔現實，透過「感傷情懷」突顯自身的不黯世事，換言之也是種純潔的表現，就如同音樂老師在畢業時刻提到「能夠沉浸於這般心境的妳們，正處於人生無比幸福之中。」，女子教育要求少女必須保有純潔、自愛，這些因素都可能使少女在接受女子教育過程中維持在「與現實區隔」的想像，因此當結婚的現實話題出現時，便會感懷少女時光的消逝進行告別與不捨等情緒表現。再來參考作者楊千鶴個人的少女相關事例中舉出，「以沉浸文學作品中的感傷」作為忘卻現實的方法，表達懷疑自我，同是表示自身容易受傷而純潔，透過這樣的沉浸在感傷幻想，創造感傷氛圍的同時作為創造少女自我世界的手段，而少女們也可透過感傷的共同受確認彼此的少女特徵，與「友愛情誼」的互相作用下重複建構少女的自我認同。

4-5-3 惠英的自我憧憬－「感傷情懷」與「友愛情誼」特徵之運作目的

惠英在故事中未表明的自我呈現，我們能透過追溯外在環境與內化教育的影響推測出惠英可能的發展路線，也就是對理想自我的憧憬與幻想。首先，必須理解少女的憧憬來自於追求少女雜誌塑造而出的理想女性成功者形象，而這是與教育中要求少女的藝術涵養有密切關聯，而〈花開時節〉故事背景中的台北女子高

等學院，以培養女學生的藝術興趣養成進一步貼進日本女性的精神思想，並且力致女學生學習消費摩登文化給予相當的自我發展空間。而透過作中作《娘時代》中提及的藝術與夢想的追求，少女能透過追求作品（可能是文學、藝術、舞台劇等等的少女文化創作）中的感傷氛圍，體會之中的至高清純與感動，沉浸在少女的幻想、同是得以確認自身的少女自我認同，而惠英所追求的自我，推測可能是其消費作品中所沉浸於之中的理想形象。

但透過藝術能力作為自我發展的途徑幾近無法實現的緣故，使得惠英產生了憧憬的心理，她在單純的憧憬心理作祟下維持著少女的自我意識，亦或是相反，以維持著少女的身分才能持續憧憬著理想的自我，這如同呈現在惠英身上的「感傷情懷」與「友愛情誼」的特徵互相作用下，以「友愛情懷」行為維護少女自我，並且沉浸於少女的感傷世界中，最終以利於逃避婚姻現實的來臨，因此該第三項之「自我憧憬」特徵的呈現，也做為「友愛情誼」與「感傷情懷」特徵重複運作之背後目的。

第五章 結論

5-1 〈花開時節〉作為少女形象研究－賢妻良母化問題探討

以上，本論透過主角惠英在文本中呈現的自我迷失狀態，進行了社會背景及內化影響的追究探討，並且進一步分析理解〈花開時節〉中的少女形象塑造以及主角惠英的自我建構方式以及自我呈現。

透過少女的研究分析視野，能為〈花開時節〉跳脫以往研究中的女性形象探討走向與觀點。當我們在閱讀〈花開時節〉時，其中顯露而出的獨特氛圍「感傷情懷」「友愛情誼」以及「自我憧憬」這些細微的自我呈現，其背後蘊含了傳統社會、女子教育與少女之間的衝突與壓抑。在〈花開時節〉中如父親以及二哥，分別抱持了重視傳統以及重視人格觀念的登場角色，在這夾層之中的惠英所面對的是女性自我價值的考驗。而在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關注了外在環境所提示的自我發展、以及思潮影響下的自我啟蒙，這些外部環境與內化規範與少女的自我認同並行發展，為了理解少女的幽微特徵，必需藉以日本「少女」研究視野才能達成，並且觀看理解〈花開時節〉中少女的心性規範與塑造。

而透過〈花開時節〉文本結合少女研究的心性規範與塑造的相關探討，才可正視了所謂的賢妻良母化之議題。而筆者所指的賢妻良母化之議題在於，傳統觀念中的婚姻壓力、女子教育以家政教育正當化了妻職的再生產機能、雙重的外在環境壓迫下，除了結婚以外阻絕了少女其他可能的自我發展，在如此外界的壓抑下所造成的即是作中其他少女角色自我意識低迷的樣貌呈現，以及惠英的自我抉擇困難的狀況。

本論以〈花開時節〉為例探討少女的自我發展過程，發現了其中的少女特質錯綜且複雜，這與她本身曖昧的生存立場有關。在生理上，主角惠英介於結婚前與女學生畢業後之間的曖昧地帶，而受新式教育的她並未有傳統「在家為女」的絕對閉鎖性，在女學生時期她得以自由發展，因此具有像《娘時代》主角勇於嘗試的好奇心，這也是惠英在故事中提及自身處於「半舊還新」的姿態。而在心理上，如在本論探討心性內化教育與少女雜誌的影響部分，女子教育環境中培養出的「友愛情誼」，其實具有相當的閉鎖性質，透過少女間的情誼使得少女能處於被動的姿態保有自身的純潔，同時與「感傷情懷」的作用下，維持著對「自我憧憬」的精神圖像。

而惠英的「友愛情誼」也順連扣合著少女的自我意識，以及透過「感傷情懷」區別現實的共同特徵，她在維持著縹緲且亦消逝的少女自我認同時，也對理想自我抱持著憧憬。而她所追求的理想自我之幻想，是透過藝術涵養來作為手段進一步追求，那即便是憧憬，但機制而言仍然符合社會與外界的期待。

因此，透過惠英的呈現我們看到的是，在女子教育與社會眼光期許少女成為奉獻符合國策的賢妻良母的環境之中，少女的自我認同顯得短暫且薄弱不易察覺。這樣的現象同時連帶而來的是，女性形象研究領域有忽視女子教育中的內化教育之課題。少女作為台灣社會性別秩序最下階層的群體，她們受家庭、他者與性別眼光的控制並無任何發聲的機會，如此處境的少女能做到的抵抗與嘗試，及是透過「友愛情誼」與「感傷情懷」重複運作下，創造出少女的自我世界並沉浸之中。而如筆者判定，在賢妻良母化的環境壓迫下，惠英處於自我發展抉擇困難的現況之中，而呈現出矛盾的少女自我認同，其背後主因歸究於該時代女子教育與少女雜誌所提示的自我發展仍然處於輔佐於男性的立場，使得她消極的停滯在少女的狀態，並在結局未表露任何的抉擇，以隱喻的方式供讀者想像她自我發展的去向，然而少女這虛實的階段性自我認同也為惠英迴避現實的歸屬長所。以上，本論作為〈花開時節〉的少女研究試論，她極為不起眼的「友愛情誼」以及「感傷情懷」作為在時代壓迫下不顯眼少女自我意識，此結論並為本論研究貢獻的核心價值。

5-2 研究課題與展望

本論以〈花開時節〉為分析對象，針對外到內的環境與教育媒體等影響進行探討。透過本論也發現了賢妻良母與少女的此兩項形象體之關係。少女在女子教育與少女雜誌的內化與塑造下成為被愛的姿態，這與賢淑擁有富裕愛情的賢妻良母看似是對立的關係，其實也是互相作用成長的個體。比方賢妻良母庇佑少女在被愛的環境成長，少女以成為疼愛少女的賢妻良母為目標前進發展，而如果把賢妻良母視作為目標，少女作為過程，這樣的趨勢整體會影響我們在看待整個日治時期女性形象研究、亦或是女子教育研究時，缺失了少女的這個過程。這也是上述提及，研究領域忽視了女子教育中內化規範的相關研究，這也反應了當筆者在搜索台灣部分的少女規範相關研究時，並沒辦法很深入的去理解女子教育中的課綱和詳細的內化規範，而只用試論的方式簡易帶過，這個部分也做為本論的研究

限制。

而日治時期台灣的政治立場錯綜複雜，思潮影響也必須考量少女文化以外的可能性，以局限為受日本「少女」形象影響之探討以外尚有考量之餘。另外〈花開時節〉作為日治時期中少數的女性創作之一，本論作為完全的作品論並未深入探究同時代相似的文學作品，盼望在未來能有機會探討〈花開時節〉作為文學一環的定位，由更多元的立場看待〈花開時節〉。

參考文獻

楊千鶴著作

楊千鶴，張良澤、林智美譯，《人生的三稜鏡》，南天書局，1999。

楊千鶴〈花開時節〉(中文版)《日據以來臺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邱貴芬(編)，女書文化，2001，頁 66-93。

楊千鶴《花開時節》(日文版)，南天書局，2001，頁 4-36。

〈花開時節〉作中作

アンドレ・モロワ《結婚、友情、幸福》，新潮社，1950。

大迫倫子《娘時代》，鉦脈社，1998。

日本少女形象相關研究

今田絵里香《「少女」の社会史》，勁草書房，2007。

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新泉社，2007。

本田和子《女学生の系譜：彩色される明治・増補版》，長弓社，2012 年。

久米依子《「少女小説」の生成・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世紀》，青弓社，2013。

須川亜紀子《少女と魔法—ガールヒーローはいかに受容されたのか》NNT，2013。

日治時期女作家小説之相關評論與碩博士論文（文獻回顧）

沈乃慧〈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的女性議題(上)〉《文學臺灣》第 15-16 期，1995.7，頁 284-304。

丁鳳珍《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南天書局，1997.12，頁 55-56。

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南天書局，1997.12，頁 55-56。

呂明純〈日據時期女性作家之自我呈現—以辜顏碧霞、楊千鶴為主要討論〉《台灣新文學》，2000。

邱雅芳《聖戰與聖女：以皇民化文學作品的女性形象為中心》，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1。

陳怡君《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的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鄭鳳晴《日據時期新女性的再現分析：以媒體記事與小說創作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台灣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13.12。

王婉葶《世界·民俗·帝國：《台灣婦人界》小說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碩士論文，2014。

日治時期女性相關著書

游鑑明《日據時代台灣的女子教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

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1999。頁 157-183。

山本礼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1999。

洪郁如〈日本統治初期士紳階層女性觀之轉變〉《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新自然主義，2000。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湾の家政教育》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専攻修士論文，2000。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勁草書房，2001。

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國立編譯館，2007。

許聖凱《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中文版），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家政學相關研究

細谷等〈逸脱する家事－キャサリン・ビーチャーとエレン・リチャーズの家事

の科学・政治学〉《接続》，2007，頁 126-144。

其他

張文環〈雑誌《台湾文学》の誕生〉、池田敏雄〈張文環「《台湾文学》の誕生」後記〉《台湾近現代史研究》第 2 號，1979.8，頁 180-189、頁 169-179。